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崱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大卫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林兆木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 / John Frisbie
欧伦斯 / 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 / 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 / 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 / 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 / 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 / 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 本刊专论 •

加快建设长江黄金水道 为长江经济带提供强力支撑 杨传堂(005)

建立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郑新立(013)

• 国际经济 •

中国周边外交的形势分析与战略对策 曹文炼 迟洪涛 盛思鑫(019)

全球军品贸易现状及发展趋势 任海平 徐长春(032)

增强与中国实力相称的话语权体系 张茉楠(044)

• 宏观经济 •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白仲尧(054)

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新阶段 陈炳才(062)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 盛朝迅(074)

• 产业发展 •

应对老龄化社会 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 杨玉英 张天悦(087)

选好突破口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李 锋(098)

• 调研报告 •

人民币国际化在澳大利亚发展情况的考察与思考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赴澳调研报告

陆 婷(107)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6)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2)

• 英文摘要(ABSTRACTS) •

(130)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2014年度)评奖公告

(133)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征稿通知

(135)

欢迎订阅《国际贸易》

(封二)

欢迎订阅《红旗文摘》

(封三)



CONTENTS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Golden Waterway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to Strongly Sustain Yangtze Economic Belt	<i>Yang Chuantang</i> (005)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System with Multiple Checks and Balances	<i>Zheng Xinli</i> (013)
Situation Analysis and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	<i>Cao Wenlian, Chi Hongtao and Sheng Sixin</i> (019)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Military Products Trade	<i>Ren Haiping and Xu Changchun</i> (032)
Enhance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Matched with China's Strength	<i>Zhang Monan</i> (044)
Thinking on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Bai Zhongyao</i> (054)
The Estate Market is Slowing Down	<i>Chen Bingcai</i> (062)
Factor Analysis of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Sheng Chaoxun</i> (074)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Service in Aging China	<i>Yang Yuying and Zhang Tianyue</i> (087)
Selecting Good Breakthroughs to Construct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i>Li Feng</i> (098)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ituation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Australia: A Research Report from IWEP	<i>Lu Ting</i> (107)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6)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2)

加快建设长江黄金水道 为长江经济带提供强力支撑

杨传堂

摘要：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交通运输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加快打造长江黄金水道，强化集疏运体系，提升通道运输能力，扩大交通网络规模，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加快建成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为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提供有力保障。

关键词：长江 黄金水道 经济带 交通走廊

作者简介：杨传堂，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调整区域结构、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长江水运发展。2013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调研座谈时提出，要充分发挥内河航运作用，发展江海联运，把长江全流域打造成黄金水道。2014年4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重庆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充分认识长江黄金水道在

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关键作用，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好通江达海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带动沿江地区和整个流域发展，使“黄金水道”发挥“黄金效应”。2014年6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长江经济带建设问题，要求充分发挥长江水运运量大、成本低、节能节地的优势，抓好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建设，打造长江经济带。

交通运输部长期致力于推动长江水运加快发展，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加强规划引导、政策支持、法规建设，基础设施日臻完善，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体制机制逐步健全，有力地推动了长江水运的科学发展。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发展长江水运的部署要求，交通运输部近年把加快推进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摆在交通运输工作的突出位置，积极谋划推动长江水运科学发展的规划思路和工作重点，全力推进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为长江经济带提供强力支撑。

一、长江黄金水道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长江黄金水道发展现状

历来有“黄金水道”之称的长江，全长6300公里，是中国唯一贯穿东、中、西部地区的水路运输大通道，也是中国内河水运最重要、运输规模最大和最为繁忙的通航河流。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交通运输部和沿江省市围绕长江水运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在航道及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运输服务、安全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航道方面，长江流域共有航道总里程8.9万公里，占全国的71%，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目前，已初步形成“一横一纵一网十二线”1.2万公里的高等级航道网络。“一横”，指长江干线，长2838公里；“一纵”，指京杭运河，长1052公里；“一网”，指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约4300公里；“十二线”，指岷江、嘉陵江、乌江、湘江、沅水、汉江、江汉运河、赣江、信江、合裕线、淮河、沙颍河等12条支流高等级航道。

港口方面，11省市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2.6万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800个，分别占全国的80%和40%。长江干线拥有上海、武汉、重庆航运中心等16个主要港口。2013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约30亿吨，集装箱吞吐量4700万TEU。上海、苏州、南通、江阴、泰州、镇江、南京、武汉、岳阳、重庆等10个港口的吞吐量超过亿吨。

运输方面，在长江干线从事跨省客货运输的企业有近3000家，拥有内河船舶10万艘（其中，危化品船舶4050艘，年运量约1亿吨），平均吨位约1000吨。2013年，长江干线完成货运量19.8亿吨，承担了沿江地区85%的煤炭、铁矿石运输和80%以上的外贸物资运输任务，运输能力位居全球内河航运第一位，也是世界上内河运输最为繁忙的通航河流。

安全监管方面，长江干线实施了“电子巡航”系统，初步建成了治安防控体系“四张网”（水上治安巡逻防控网、重点水/区域治安防控网、单位内部治安防控网、船舶治安防控网），监管救助综合基地、溢油防控基地、消防警备码头等项目进展顺利，进一步完善应对大风、大雾等自然灾害的预警、预案，加强对中小型船舶、渡船、游船等集中检查和渡口改造，严厉打击非法载客、超载等违法行为，积极开展消防教育和演练活动，以及长江三峡库区地质灾害、船舶溢油等水上应急处置演习。水上交通事故特别是船舶碰撞事故大幅度减少，水运生产力明显提高。

（二）长江黄金水道存在的问题

长江水运建设和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长江水运的优势得到了较好利用，但与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推动沿江产业布局优化，带动外向型经济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相比，还存在不相适应的一些突出问题，长江“黄金水道”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一是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长江水系高等级航道比重低、不成网，多数航道仍然处于自然状态，技术标准低、通过能力小。主要内河港口结构不合理，规模化、专业化程度不高，与现代物流、综合运输枢纽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航道通过能力不足。2004年—2013年，三峡船闸货运量由3400万吨提高到1亿吨，提前19年达到2030年的设计能力，三峡船闸基本处于饱和运行状态，过闸船舶平均待闸时间近2天，待闸时间过长。三是船型标准化存在差距。目前，在长江上的营运船舶标准化程度低，船型、机型复杂，呈现先进船与落后船、大型船与小型船、高速船与低速船并存的格局。性能良好的干支直达、江海直达新型运输船舶还很少，处于稀缺状态。四是水运安全隐患较多。沿江省市化工产量占全国的46%，长江危化品港口吞吐量已超过1.8亿吨，危化品种类超过250种，面临着航行安全与用水安全的双重压力。

针对长江水运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我们必须立足于国家经济新棋局的战略要求，重新审视长江黄金水道和整个内河运输的优势及潜力，重新定位内河运输在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中的重要位置，以新思路谋求新发展，以新眼光把握新机遇，加快推进综合交通、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建设，逐步破除长江黄金水道的瓶颈制约，推动水运事业有一个质的提升和大的进步，更好地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二、以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为支撑，高起点谋划长江黄金水道建设

在中国经济版图中，长江经济带是重要的一极。沿江七省二市加上流域内的贵州、浙江两省，国土面积203.8万平方公里，人口5.79亿，分别占全国的22%和43%。2013年，九省二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5.95万亿元，占全国的45.6%，人均生产总值44861元，

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李克强总理在重庆调研考察时强调指出，长江经济带是靠长江黄金水道穿起来的一条“珍珠链”，需要率先考虑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对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一）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发展过程中，长江水运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基础和支撑作用

长江水运是长江流域经济快速发展和沿江产业带形成的重要支撑。长江流域横贯东西、连接南北、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产业发达、城镇密集，集聚了全国43%的工业增加值，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发展轴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沿江各省市依托长江，发挥水运的大通道功能，形成了以冶金、电子、机械、汽车、原油、化工等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长江经济带，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可以说，长江水运与长江沿江经济相辅相成，长江沿江经济的发展直接带动了长江水运的发展，而长江水运的快速发展又有力地促进了沿江产业带的形成和沿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长江水运是沿江综合运输大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长江流域已建立了由公路、铁路、水运、管道及航空运输组成的较为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初步形成市场调节、分工协作、相互促进、局部竞争的运输格局，体现了各种运输方式不同的技术经济特征，发挥了各自优势。长江干线航道，南京以下可通航3万~5万吨级船舶，南京至武汉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全线可常年通航千吨级内河驳船组成的船队，长江三角洲水网航道沟通了长江流域的南北地区，形成了天然的水运网络。

长江水运是保障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长江水运具有运能大、能耗小、成本低、占地少、污染轻等比较优势。在资源效益方面，利用天然河道，少占地或不占地，有时还可以通过航道疏浚造地，增加土地面积。在环境效益方面，水运对环境的污染最小。据统计，水运耗能是公路运输的1/8左右，是铁路的1/2左右；整治每千吨公里货运量所造成的污染所需费用，水运、铁路、公路三者之比为1:3.3:14.6。长江水运占全国内河水运总量的80%。

（二）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

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路网规模持续扩大，布局 and 结构不断完善，技术水平明显提升，运输能力大幅增强，初步形成了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水路、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综合交通网络。但是，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新要求相比，综合交通网建设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一是长江航运潜能尚未充分发挥，高等级航道比重低，中上游航道梗阻问题突出，高效集疏运体

系尚未形成；二是东西向铁路、公路运输能力不足，南北向通道能力紧张，向西开放的国际通道薄弱；三是网络结构不完善，覆盖广度不足，通达深度不够，技术等级偏低；四是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之后，各种运输方式之间未实现有效衔接；五是城际铁路建设起步晚，不适应城镇化格局特别是城市群空间布局。

针对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为适应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的战略要求，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我们和有关部委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共同研究制定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总体思路是：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部署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要求，加快打造长江黄金水道，强化集疏运体系，提升通道运输能力，扩大交通网络规模，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率先建成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为建设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提供有力保障。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横贯东西、沟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确定这样的规划思路和发展目标，主要基于以下五点考虑。

一是立足于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作用。长江是中国唯一一条贯通东、中、西部的通航河流。沿海溯河而上，实现梯次开发，是世界各国经济布局的普遍规律。以长江为轴，沿东西延伸，向南北铺开，可以统揽长江经济带交通发展全局，实现国家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三大战略同步推进，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

二是立足于促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统筹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是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发展的重要任务和突出特点。长江经济带11省市，各种运输方式齐全，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省市基础较好，具备综合交通运输一体化先行先试的各方面条件。长江经济带贯通东西、连接南北，在这一区域率先发展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不仅有利于促进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有利于带动全国其他地区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

三是立足于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为实现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滇中和黔中城市群内，中心城市之间、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快速通达，创造了交通运输条件，有利于强化核心增长极和重点经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引导产业布局优化、梯度转移和城市群空间有序拓展、人口合理分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带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四是立足于培育全方位对外开放新优势。规划中提出“开发利用国际河流航运资源，建设孟中印缅通道、中老泰通道和中越通道，实现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的建设思路，分别打通了至南亚和东南亚的两大国际运输通道，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的立体开放新格局，有利于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五是立足于构建高效现代物流体系。按照规划，为实现“零距离换乘、无缝化衔接”

要求，加快建设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和重要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强客运枢纽一体化衔接，尽可能实现同站换乘。完善货运枢纽集疏运功能，统筹货运枢纽与开发区、物流园区的空间布局。这样布局，可以有效降低中西部地区的物流成本，为长江经济带经济转型升级、提高竞争力提供重要保障。

以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为支撑，将充分发挥长江水运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小等优势，加快推进长江干线航道系统治理，浚深下游航道，消除中上游瓶颈，改善支流通航条件，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强集疏运体系建设，打造出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黄金水道。

三、着眼服务长江经济带建设，全力推进长江黄金水道建设

党中央、国务院加快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战略部署，是中国水运业大发展大跨越的难得历史机遇，是加快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难得历史机遇，也是推动中国交通运输业转型升级的难得历史机遇。面对机遇，交通运输系统将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凝心聚力，积极进取，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全力推动长江黄金水道建设。

一是统筹长江黄金水道建设。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涉及多个部委及沿江 11 省市，协调任务繁重复杂。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继续发挥并不断完善长江水运发展协调小组和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强与国务院三峡办、三峡集团总公司及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沟通协调，密切协作、相互支持、形成合力，为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和发展创造良好条件。适应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新要求，统筹航道建设与运输发展，发挥航道最大效益；统筹长江水运与其他运输方式协调发展，建设好集疏运体系，发挥综合运输体系的整体效益；统筹水运发展与沿江产业发展，为沿江经济发展提供更到位、更具针对性的运输服务。

二是大力提升航道综合通过能力。提高船舶通过综合能力是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成效的第一标准。必须把提升航道综合通过能力作为长江黄金水道建设的重中之重，抓好重大建设项目实施，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按照“深下游、畅中游、延上游、通支流”的思路，加快推进《长江干线航道总体规划纲要》的实施，以南京以下 12.5 米深水航道建设工程、荆江航道治理工程建设为重点，全面加快长江干线航道系统治理。针对长江口口门淤积、下游大型海船进江桥梁制约、中游航道水深不足、三峡枢纽通过能力紧张等问题，深入开展长江口深水航道减淤、海船进江合理运输范围、扩大三峡枢纽货运通过能力、提高长江宜宾至重庆段航道标准和宜昌至安庆段航道整治模型试验等专题研究工作，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有序推进相关建设。加大长江干线航道养护资金投入和设施、设备建设，提升航道养护水平

和应急抢通能力。加快岷江、嘉陵江、乌江等主要支流航道建设，加快实施京杭运河升级扩能改造，全面推进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建设。提升三峡航运通过能力，抓紧实施既有船闸挖潜措施，积极组织引导翻坝分流运输，加快水运新通道建设前期工作，尽快理顺三峡通航建筑物管理体制，实现长江航运管理一体化，形成整体合力。

三是统筹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通过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和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发挥长江水运的最大效益。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中，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完善长江黄金水道的集疏运体系，以沿江重要港口为节点和枢纽，统筹推进水运、铁路、公路、航空、油气管网集疏运体系建设，打造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使长江这一大动脉更有力地辐射和带动广阔腹地发展。按照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网规划，加快建成横贯东西、沟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网。大力加强港口集疏运体系建设，实现水运与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运输方式的有机衔接，发展多式联运，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引导大宗货物从公路更多地向水运转移，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

四是着力提高沿江港口管理服务水平。管理也是生产力，提高沿江港口管理服务水平，是建设长江黄金水道的重大任务。目前，沿江港口管理与沿海港口管理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要认真研究沿江港口管理服务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完善港口基础设施，鼓励社会资金、民营资本全方位参与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加快规模化、专业化港区开发，建设一批集装箱、汽车滚装、大宗散货等专业化码头，推进港口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充分发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武汉长江中游和重庆长江上游航运中心的引领作用，形成以三大航运中心为核心的沿江港口体系，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的现代化港区。积极拓展沿江港口物流服务功能，加强港口与临港工业、保税园区、临港物流园区的互动融合，鼓励将内河港口纳入现代物流园区发展示范项目，鼓励其他运输方式的大型运输企业和物流企业采取多种形式进入内河水运领域发展。加强市场监管，规范船代、货代、无船承运、船舶交易等服务业发展，推动航运金融、航运保险、海事仲裁、航运信息咨询等高端航运服务业加快发展。要加快推进长江港口信息化水平，建立完善港口企业物流信息平台，建设长江数字航道，实现物流信息电子数据联网交换，提高口岸通关效率。

五是加快推进安全监管等支持保障系统建设。安全运行是长江黄金水道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前提。长江黄金水道船舶航行密度较大，同时长江危化品运输安全形势严峻，进一步加快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电子巡航全覆盖，形成全方位覆盖、全天候运行、全过程监管的现代化长江水上安全监管体系。重点加强对危化品运输的安全监管，制定出台《内河危险化学品禁运目录》，积极推进长江危险化学品运输动态信息共享和监管信

息平台建设, 加快淘汰单壳危险化学品运输船舶, 加强港口危化品罐区和油气输送管线安全监管及保安工作, 保障长江危险化学品运输和沿江饮水安全。加强长江治安防控体系建设, 完善水上消防布局, 加强长江航运公安技术手段建设, 强化重点区域的反恐能力建设, 不断提升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的能力和水平。

六是高度重视长江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发展绿色交通, 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是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对于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按照打造绿色生态长江经济带的标准要求, 坚持科学发展观, 按照安全、环保、节能、经济的要求, 强化岸线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大力发展绿色港口、生态航道、新能源船舶, 加强船舶污染防控和治理, 完善船舶流动污染源控制和港口污水处理制度, 全面推进运输船舶标准化工作, 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依法依规做好环评、防洪、水资源保护等相关工作, 正确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把长江黄金水道打造成绿色航道、生态航道, 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永续利用。

七是大力加强科技攻关和政策研究。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工程庞大, 对技术和政策的要求都很高, 要确保集疏运体系建设科学合理。首先是加强科技攻关。受水文、泥沙、河势、生态等多种因素影响, 长江干线航道治理难度大, 需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 科学决策、慎重决策, 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效益。要认真梳理和总结长期以来在山区河流整治、高坝通航、大水位差码头建设、长江口航道治理等重大项目中形成的技术成果, 加强长江干线重点河段、重点滩险航道整治等方面的基础研究, 扎实做好前期论证, 为科学决策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是强化政策研究。围绕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大棋局中如何重新认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 邀请工程院及造船、造桥、水运专家, 组织强有力的科研力量, 认真研究在集疏运体系健全的情况下长江航运的潜能到底有多大, 船型标准化改造对中国船舶制造业的贡献有多大, 建设好长江黄金水道还需要哪些政策支持等重大课题, 从全局上谋划好建设长江黄金水道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最后是当好参谋。站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 从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出发, 深入研究黄金水道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梯次开发开放、产业合理布局、城镇化建设等的关系, 为党中央、国务院当好参谋, 使长江黄金水道的建设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八是加快构建航道法规体系。《航道法》已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我们将积极主动配合做好修改工作, 争取早日出台。同时, 提前做好《航道法》出台后相关配套法规的制定出台工作, 加强不同层次法律法规间的衔接, 为长江黄金水道建设提供法制保障。

责任编辑: 李蕊

建立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郑新立

摘要：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金融产品依靠主权国家信用形成毫无节制的供给能力，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以多元储备货币取代单一储备货币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用这种制衡机制，迫使货币发行国政府对本国的币值稳定负责，相当于发挥金本位作用。有了这种机制，就能有效地促进货币发行国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加强对金融的监管，既能满足全球经济活动对货币流动性的需求，又能避免超量发行和金融衍生产品泛滥，以保持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

关键词：多元制衡 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现行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美元脱离金本位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形成的。美元作为一种主权货币，它的发行是根据美国国内经济需要所决定。而美元作为一种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从有利于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其供给量理应既要满足国际经济活动对货币的需求，又要避免过度虚拟化而引发国际金融体系波动。

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功能同其发行决策的国家主权性质，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重回金本位是不可能的，发行一种超主权货币也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建立具有约束机制的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即由美元、欧元、人民币为主，组成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再加上其它若干货币，可能是一种正确选择。本文就此提出一些设想，以期引起讨论。

一、以多元储备货币取代单一储备货币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008 年，由美元引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对各国经济带来沉重打击。总结这次危机产生的原因，找到避免危机再次发生的办法，是当今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要解决的问题。人们可以找出引发危机的许多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美元金融衍生产品过度泛滥导致经济过度虚拟化，是引发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滥用国家信用，推行经常项目和财政预算双赤字政策，维持国内居民的过度消费和政府的超额支出，不断积聚了金融海啸的巨大能量。2010 年，美联邦政府财政赤字达 1.4 万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9.4%；公共债务 9.02 万亿美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62.1%。美国的高赤字率和高债务率以及连续几年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利率水平较低，得益于其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吸引了外国资金和廉价商品流入。

美国成为 2008 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策源地，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依托国家信用制造的金融产品，必须与实体经济的需求和规模相适应。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使美国经济犹如一个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倒金字塔。金融危机前，美国作为底部的次贷约 2 万亿美元，普通房贷余额 12 万亿美元，包括资产抵押债券（CDO）和信用违约掉期合同（CDS）在内的企业债约 62 万亿美元，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美国各大金融机构持有的金融衍生品达 300 万亿美元左右。这样一个头重脚轻的金融大厦，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在顷刻之间崩塌。如果说，历史上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是由物质产品的生产过剩带来的，那么，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今天，金融产品依靠主权国家信用形成毫无节制的供给能力，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

总结这次危机的教训，只有找到美元金融衍生产品泛滥的制衡机制，才能建立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重回金本位是不可能的，因为黄金产量的增长不可能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年尼克松总统之所以决定美元与黄金脱钩，就是考虑到这一因素。建立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是一种选项，但具体操作起来，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作为一种特别提款权（SDR），如何满足全球日常经济活动对货币结算的需要？如何确定各国在统一

的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权重？如何适应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等等，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取代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可能是制约国际金融过度虚拟化的正确选择。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足够大的经济规模；二是在国际贸易中占有较高的比重；三是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或行政组织。纵观当今世界，只有美国、欧盟、中国具备这些条件。不足之处是，目前，欧盟和中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过低。特别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正在进行之中，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2012年，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仅占0.2%，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三种货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中各占一定比重，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哪种货币处于贬值趋势，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就争相抛售之；哪种货币处于升值趋势，各国政府、企业和民众就争相购买之。用这种制衡机制，迫使货币发行国政府对本国的币值稳定负责，相当于发挥金本位作用。有了这种机制，就能有效促进货币发行国政府从本国利益出发，加强对金融的监管，避免滥发货币和放任金融衍生产品泛滥。从几何学和力学的观点来看，三点可以形成一个平面，三角架构是一个任意放置都能保持稳定的架构。由三种货币作为主要储备货币，才可能满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

会不会出现一个国家为了增强出口竞争力而压低本国货币汇率呢？应当说，汇率是一把双刃剑，压低汇率将降低进口能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汇率下降，意味着本国居民财富缩水，购买力下降，这将降低居民持有本国货币的意愿。当一个国家的居民不愿意持有本国货币而争相持有其他国家货币时，意味着国家将灾难临头。

二、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有利于处理好特里芬难题

如何使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既能满足全球经济活动对货币流动性的需求，又能避免超量发行，以保持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即特里芬难题。建立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用铸币税形成激励机制，使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增加供给，满足国际货币流动性需要；同时，用各国追求储备货币安全的避险机制，约束主权货币发行国政府适度控制货币发行量，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大体稳定。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与超主权货币即SDR相结合，可能是破解特里芬难题，建立稳定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正确选择。

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可以大大增强其国际支付能力，从而放大其经济实力，而且需要通过贸易逆差和资本项目逆差输出货币，让渡部分国内市场。显然这件事有利有弊，但总体衡量利大于弊，特别是当一个国家正处于经济赶超阶段或

出现偿债困难的时候，借助于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通过赤字融资缓解甚至消除债务危机。这对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将鼓励储备货币发行国政府增加本国货币在海外的流通量。而且，由多种储备货币取代单一核心储备货币，有助于分担输出货币的压力，分散风险。

多元制衡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有助于建立货币发行的约束机制，从而避免一种储备货币及其衍生产品泛滥成灾。因为，接受储备货币的国家出于货币安全保值的需要，必然优先选择处于升值趋势或币值稳定的货币。如果某一种货币被世界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看做烫手山芋，这种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必然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迫使该国政府采取措施保持币值稳定。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长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向美元注水，成功地向国外转移危机影响，等于由国外美元持有者为美元危机承担了大部分损失。当美国经济走出低谷之后，最近，美联储又从国内经济需要出发，宣布减缓或停止由美联储购买美国国债的政策，美元利率回升，吸引了国外美元回流，由此引起部分发展中国家外汇支付能力降低，出现金融波动的潜在风险。美元发行从国内经济需要出发，不考虑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这无可厚非。因为美国政府、国会和美联储是由美国选民推选出来或由美国政府任命的，它代表着美国人民的利益。而美国人民的利益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往往是矛盾的。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靠建立多元制衡的货币发行机制，让各国政府、企业和居民拥有可以替代的储备货币的选择权利，这样才能建立货币供给的约束机制，以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下，扩大 SDR 的规模，按照各国国际贸易和经济总量在全球中的比重调整其权重，有利于更好地发挥 SDR 在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SDR 犹如各国国际储备货币的蓄水池，它与多元制衡的国际货币体系相互配合，将对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

三、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将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创造条件

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中国金融体制正在进行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这次改革不仅决定和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也将产生重大影响。与现行体制相比，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将实现四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由于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垄断经营局面，导致资金流动性差，金融资源错配，银行贷款集中投向大企业、重点项目、城市和沿海地区，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获得贷款比较困难，贷款利率比欧美发达国家高一倍以上，金融业的净

资产利润率比实体经济高出一倍。这次改革的重大突破，就是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强化竞争，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使金融行业过高的利润率降到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的合理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放宽准入、增加金融市场竞争主体是其前提条件。只有通过充分竞争，人民币利率即资金价格才能降到与欧美发达国家大体一致的水平。人民币利率下降，不仅有利于支持国内实体经济发展，而且将鼓励资金流出，为扩大人民币海外流通量创造有利条件。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的改革，不仅将强化国内金融市场竞争，而且有利于增强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推行利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实现市场决定金融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目前，中国已放开贷款利率的下限，下一步将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存贷款利率放开之后，短期内可能出现利率上升，但当充分竞争局面形成之后，利率必然下降到正常水平，这是由供求规律决定的。全面放开利率，对现有商业银行将带来一定冲击。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商业银行已经习惯于在固定利率下过着无风险的日子，缺乏市场竞争力，改革将把他们推到国际竞争的前沿。如何过好市场竞争这一关，是国内商业银行必须面对的最大考验。顺利跨过这一关，中国商业银行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国际货币的供求和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三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中国传统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这导致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企业资本金筹集困难，过高的负债率加大了企业运营成本，降低了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改革，将为企业增加股本融资创造条件。中国的资本市场虽然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但远不是一个成熟的开放市场。国内 30 多年改革的经验证明，开放是改革的催化剂和推动力，中国资本市场也必须在开放中逐步发展起来。最近出台的上海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可以异地购买、互联互通的改革，就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下一步，还应鼓励实现与台北股票市场互联互通，允许海外企业到内地上市，就像内地企业早已在海外上市一样。中国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融合，不仅有利于完善自身的监管制度，强化企业评价、资金筹集和利润分配功能，而且将为全球股市增加新的活力，成为新的稳定因素。

四是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人民币双边互换规模不断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中作为结算工具的比重不断提高，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已接近水到渠成。现在，影响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主要担心，是国外短期游资的冲击。根据国外的成功经验，可通过征收托宾税来防止短期资金的大规模流入流出。随着人民币在国外流通量的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将不断提高。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货

币行列，将对建立新型、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做出重要贡献。

四、欧元在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中的地位、作用与战略选择

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欧元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欧元问世时间不长，但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已占 24%，最高时达 26%。从欧洲的国际贸易、经济总量和面积、人口占全球比重来看，欧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还有提高的潜力，欧洲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应当做出更大贡献。

如果将国际金融体系的治理比作一个公司，那就要形成一个内部制衡机制。两个小股东的股权之和必须大于大股东的比重，才能形成有效制衡，避免大股东为所欲为，侵犯小股东利益。这是一个股份公司能够办好的成功之道。欧元和人民币加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必然要求美元让出一些空间，适度降低一些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比重。2012 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 62.2%，居于绝对优势。多元储备货币的形成过程，应当是一个和平与平等的市场竞争过程，是一个由用户自主选择的过程，这将促进各国金融机构改善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发挥重要的协调功能。当欧元和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所占比重之和超过美元比重时，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才可能形成。

欧元和人民币要进入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都要做好“家庭作业”，练好“内功”。欧元作为目前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理应尽快解决好债务问题，加强货币政策的统一协调，增强抗御风险和外部冲击的能力。

欧元要增强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地位 and 作用，应当与人民币结为伙伴，加大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力度，开展同人民币的双边互换。否则，单靠欧元的力量与美元相抗衡，必然招致失败。欧元与人民币相互扶持，与美元兼容，是建立长期稳定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客观需要，是维护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根本利益的需要。经济学家应探寻和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而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固守已经过时的思维定式。

责任编辑：李 蕊

中国周边外交的形势分析与战略对策

曹文炼 迟洪涛 盛思鑫

摘要：周边关系在中国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近年来，周边局势渐趋错综复杂，热点问题时有发生，海权摩擦增加，少数国家源于领土争端对中国疑惧加深。但是，大多数周边国家仍然对中国友好，与中国深化合作的意愿明显。当前中国经略周边的总体策略应该为：与邻为善，勇于担当；经济优先，互利共赢；管控分歧，统筹全局；强文备武，永不称霸。中长期目标，应该倡导构筑以亚洲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为宗旨的“亚洲联盟”组织。

关键词：周边关系 地缘政治 经济外交 国际战略

作者简介：曹文炼，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
迟洪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
盛思鑫，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学术秘书、博士。

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边境漫长的大国，妥善处理与周边诸多邻国的关系，在外交全局中处于首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尤其是亚洲和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周边关系进入了一个矛盾凸显期。我们应该认真对周边形势进行全面分析研判，精心谋划总体策略和国别对策。

一、中国周边现状分析与趋势研判

按照地缘政治和经济联系，可以将中国周边划分为东南亚、东北亚、中亚、南亚四大板块，包括与中国陆海毗邻的 29 个国家。^①



图 1 中国周边板块划分

（一）区域现状分析

1. 东南亚板块。第一，目前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最为紧密，交往日益深化。中国—东盟自贸区在中国周边最早建立，相互投资和人员往来也较为频繁，并且开始加强防务与安全等对话。第二，少数东盟国家与我关系的摩擦和变数，成为区域不稳定的热点。菲律宾、越南等国陆续掀起南海所谓的“维权行动”，地区紧张局势有所升级；缅甸国内政局变化以及西方国家积极介入，影响中国在缅合作项目的顺利开展。第三，东盟积极推动与美国、印度等外部大国改善关系，谋求新的“大国平衡”。美国“重返”亚洲、印度，加大“东进”步伐，使东南亚地缘政治博弈竞争加剧。

2. 东北亚板块。第一，朝鲜半岛未来走势是东北亚最大不确定性因素，朝核危机的处置凸显中国大国作用。中国对朝韩关系应该全面权衡，半岛统分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应做好应对预案；中国与朝鲜的陆界划分以及与朝韩的海权协议应该及早磋商，延时对中国不利，甚至遗留后患。第二，日本右翼回潮和钓鱼岛问题，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

^①本研究所指周边的范围，是与中国边境相邻和相近的以下 29 个国家：东南亚板块包括东盟十国和东帝汶，东北亚板块包括俄罗斯、日本、蒙古国、朝鲜和韩国，中亚板块包括中亚五国，南亚板块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不丹、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阿富汗。



图 2 东南亚板块



图 3 东北亚板块

长时间内中日矛盾的焦点。日本右翼重新执政具有国内外经济政治背景，是其国内各种矛盾折冲的结果，也是美国容忍甚至纵容的结果，尤其是对中国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大大增加等仍未能正视。但是，这改变不了日本国势衰弱，不可能再现 20 年前的繁荣和影响力的局面。日本在中长期都将是中国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我们应认真研判对日策略。第三，蒙古国对中俄存在戒心，积极推行“第三邻国”外交战略，中俄战略互信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俄罗斯担心其远东地区受到威胁，以及中国插手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损害俄罗斯的全球战略体系。蒙古国土不大但资源丰富，而且地处中俄两国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中俄要通过增进战略互

信联手应对，防止其投入欧美怀抱。第四，东北亚地区还存在着一系列相互的领土领海争端，矛盾错综复杂而又十分棘手。中国与日本的钓鱼岛之争，中国与日本、韩国东海领域划界纠纷，日本与韩国的独岛、鹿岛及其与俄国的北方四岛主权归属争端，都对本地区双边和多边关系带来复杂因素。东北亚安全困境既有地缘政治、大国角力的因素，更主要还是争夺经济资源的矛盾。未来各国都将加快发展自己的国防力量，争相提高军备水平。

3. 中亚板块。第一，中亚国家与中国边境划定，是中国安全腹地。俄、美、中对中亚地区都有较大影响，欧盟、日本等影响相对较小。美国已经提出以“新丝绸之路愿景”、“北方分配网络”和“中亚禁毒倡议”三位一体的新中亚政策。俄罗斯形成了军事安全层面依托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经济层面依托欧亚联盟，政治层面借助上合组织的基本策略。中国正在积极谋划的中亚战略即向西开放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已经明确，相比美国的“新丝绸之路愿景”更具实质性内容，且地缘优势明显。第二，中亚国家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奉行大国平衡外交策略，但在外交优先选择上有所不同。哈萨克斯坦仍将俄罗斯视为最重要的伙伴，但与中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较强，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推进；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虽然也持亲俄立场，但与俄关系存在嫌隙；乌兹别克斯坦对由俄主导的中亚一体化进程缺乏兴趣，其主要领导人长期以来与美国发展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土库曼斯坦则奉行中立政策，尽量避免“选边站”。第三，中亚各国与中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但与此同时，各国也担心沦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附庸和资源被中国掠夺。我们应加强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管理教育，加快推进旨在安邻、睦邻、富邻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巩固与中亚国家的政治互信和深化全面合作，并加快新疆沿边开发开放，大力推进向西开放战略。



图 4 中亚板块

4. 南亚板块。第一，南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明显，对外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与南盟合作领域广泛。随着印度主动改善与其他南盟成员国的经贸关系，中国、日本、美国、欧盟、韩国等域外力量相继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南盟，南盟与国际社会的关联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与南盟国家商贸往来日益密切，2013年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南盟博览会”。第二，印度在南亚实力占优，中印边界争议和安全戒心仍将长期存在，但经贸合作空间广阔。由于中印之间存在领土争端，以及印度对中国与缅甸、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等国携手的“珍珠链战略”持有强烈戒心，印度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越南等国的防务合作日益升温。与此同时，中印贸易迅猛增长，近十年总贸易额增长约20倍，中国现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同属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的重大问题上存在较多共识，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处理好两国关系对于双方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中国与其他南亚国家传统上亲善友好、合作密切，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离间是主要挑战因素。中国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国传统友谊深厚。随着美印积极推进“两洋战略”，日本、澳大利亚等积极介入南亚事务，未来如何规划和落实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等，进一步深化与南亚诸国的合作，改变过去印巴“一边亲”的策略，有效地整合各类利益，将是中国南亚战略的重要议题。第四，南亚地区安全局势存在隐患，印巴克什米尔问题尚未解决，恐怖主义持续活跃。作为核武国家的印、巴，冲突频发的克什米尔地区，以及恐怖主义最为严重的阿富汗均与中国接壤，引发的乱局很可能对中国产生“外溢效应”，带来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难民潮等严重挑战，对边境地区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造成冲击。



图5 南亚板块

（二）总体特点与趋势研判

概括起来，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呈现如下四大特点。一是周边形势错综复杂，热点问题时有发生。这主要是由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宗教等问题上存在传统差异，加上近年来发展差距的扩大而导致的。二是陆境相对稳定，海权摩擦增加。陆地边境除了与印度等个别国家有不稳定因素之外，总体较为平稳。海权摩擦增加，除了争端国自身利益考量之外，明显具有大国影响的背景，主要与美国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有较大关系。三是少数国家源于领土争端对中国疑惧加深。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权力结构变化以及各国政府与民众互动关系变化，导致个别周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激发了周边少数与中国具有海权和领土争端的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四是大多数周边国家对华友好，采取平衡战略态势明显。绝大多数周边国家与中国并无领土领海争端，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无虞安全必然重视经济。例如，在 TPP 与 RCEP 之间选择的平衡战略体现的就是这种理念。总体上看，中国地缘经济环境比地缘政治、安全环境更为有利。

综上所述，中国的周边形势和周边环境、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中国周边总体态势仍属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是周边国家对华关系的主流。虽然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但是凸显的是中国周边的“变局”而非“危局”。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我们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把周边外交工作做得更好。既要努力缓解现存矛盾和摩擦，更要考虑应对中长期变化影响，加强战略思维创新，积极主动地“谋势”与“造势”，增强对事态发展的主导和管控能力，塑造有利于中国稳定发展的周边环境。

二、经略周边的总体策略与区域重点

精心谋划经略周边的总体策略，是确定经略周边的区域重点与国别对策的前提和依据。

（一）经略周边的总体策略

根据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方针，经略周边的总体策略可以概括为：与邻为善，勇于担当；经济优先，互利共赢；管控分歧，统筹全局；强文备武，永不称霸。

1. “与邻为善，勇于担当”是中国经略周边的基本方略。一方面，通过建立、巩固和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睦邻友好条约与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坚持和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基本方针，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继续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使中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

中获得裨益和助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周边环境。另一方面，坚定承担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历史责任，积极保护中国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公民、侨民、财产与合法权益，同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各项周边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主动应对地区性挑战。

2. “经济优先，互利共赢”是中国经略周边的主要手段。全面总结和利用中国在经济外交方面的经验与成果，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资源，利用比较优势，找准同周边国家深化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贸易、投资的合作空间，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不断深化区域金融合作，积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完善区域金融安全网络。加快沿边地区开放，深化沿边省区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打造周边利益共同体。

3. “管控分歧，统筹全局”是中国经略周边的应变之道。积极采取建立双边合作机制、提高战略对话层级与战略互信、扩大共同利益与共识、充分利用国际规则等手段，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对各种分歧的共同管控，防止事态恶化。坚持主要依靠当事国之间的双边谈判及平等协商，和平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与冲突，反对任何第三国的主动介入和强制干预。统筹考虑双边关系的全局、周边关系的全局以及全球关系的全局，认真研究和巧妙利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与有关国家加强沟通、协调立场，争取周边其他国家与国际社会的支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减缓和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与冲突。从低敏感领域合作入手，循序渐进、积极探索和稳妥推进中国与周边国家在政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共同努力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区域性集体安全机制。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

4. “强文备武，永不称霸”是中国经略周边的长期方针。注重积累和加强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和宣传优势，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联系，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努力将中国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政治、安全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提升和增强国家软实力。贯彻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发展和善用准军事手段及非军事手段维护

中国周边海洋、太空和网络安全，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信息化与科技化，与时俱进地建设能够应付周边突发状况，以及有效保护中国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加强战略思维，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以中国和平发展推进周边国家和平发展，永远不争霸，永远不称霸。

（二）经略周边的区域重点

依据经略周边的总体策略，结合中国周边的历史与现实情况，抓准与紧扣当前周边各个区域板块的重点并制定好区别化的对策，是中国经略周边成功与否的关键。

1. 东南亚板块应以打造“海上丝绸之路”为抓手，加强中国与东南亚进一步的经济融合，扩大和升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使东盟国家更多地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破解南海问题，首先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基本立场不动摇，要避免多边化与复杂化，要抓住中越关系这个“牛鼻子”，通过缩小和管控分歧以及海上共同开发，从低敏感度领域经济合作入手，逐步推进在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共同开发，同时用好中国—东盟的外交平台，努力将南海转化为友谊之海、合作之海、安全之海。通过中国金融国际化与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大力开展金融外交与基础设施建设外交，积极参与泰国高铁和吉隆坡及新加坡之间的高铁建设项目，尽快考虑泰国至老挝高铁项目和中老铁路建设，加快打造泛亚铁路网与能源运输通道。

2. 东北亚板块应以继续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及加快实施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为依托，共同维护区域安全，积极利用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面对钓鱼岛问题，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坚持常态化巡航占据有利位置，同时也要继续深化中日经济合作，以经促政；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互信和安全合作，并利用紧密的中俄关系制约美日关系，防止美国纵容日本单方面采取使钓鱼岛问题升级的行动。我们还应和俄罗斯、韩国一起维护二战历史结论的严肃性。在朝鲜问题上，应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主动与各方斡旋沟通，避免事态持续恶化，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中国对蒙“第三邻国”外交政策应保持戒备，同时积极加强与蒙古的经济贸易关系。

3. 中亚板块应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支撑，将上海合作组织建设成一个推动成员国政治经济合作的有效平台，务实推进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欧盟的深度合作，积极打造欧亚大陆版多边贸易协定，促进古丝绸之路经济带复兴。尽快完善包括贸易结算体系、边贸配套基础建设、公平市场体系、贸易仲裁体系等在内的一系列体系建设。尽快签署《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辟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中亚到印度洋和波斯湾的交通运输走廊，商谈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协定。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专门账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俱乐部，建立

稳定供求关系，确保能源安全。建立粮食安全合作机制，在农业生产、农产品贸易、食品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进一步扩大上合组织框架内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努力拓展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4. 南亚板块应以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为两大支点，以基础设施建设外交为突破口，加强中国与南亚在交通、能源、海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中印关系是这一区域的重点，一方面中国应尽快与印方就《边境防卫合作协定》达成协议，加强安全合作，努力维护和平稳定的中印边界，与此同时也应强文备武，扩大对印度影响力，并对印度的“向东看”外交、联合美日韩以及利用达赖集团等战略保持充分戒备。另一方面，继续寻求通过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等方式扩大中印双边贸易额，加强中国与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软件信息和服务外包产业等方面的对接。积极响应印度有关建立“中国商务园”的提议，稳妥推进中国企业对印投资，逐步平衡中印经贸关系。

（三） 经略周边的中长期目标

经略周边的中长期目标，是逐步推进亚洲一体化，积极构筑以亚洲安全稳定和经济繁荣为宗旨的“亚洲联盟”或“亚洲共同体”组织。纵观当今世界，各大洲都已经形成紧密程度不同的国家联盟，唯独亚洲尚缺。亚洲，特别是东亚，已经成为大国势力争夺的焦点，这是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局势的新特点。建立“亚洲共同体”将是非常长远的目标，但是，中国应该积极组织研究有关战略构想，并适时提出，争取主动。

组建“亚洲联盟”的必要性体现在：首先，建立一个亚洲统一的经济金融政策协调机制，可以减少世界其他市场波动对本地区的影响，加强区内国家互助合作，确保亚洲地区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其次，在多边框架下实现全球各主要国家贸易自由化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多边机制的一种替代方案，往往更容易达成自由贸易及经济一体化的协议，在消除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方面的进展更快；最后，通过组建亚洲联盟，有助于增强区内国家政治互信，排除或减少区外大国影响，对存在较大分歧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可采取联盟立法的形式解决，有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

组建“亚洲联盟”的具体实施步骤应从经济领域合作开始，然后逐步拓展到文化、政治和安全等领域。例如，可以从建立亚洲各国货币合作和汇率稳定协调机制入手，同时加快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洲货币基金，全面支撑亚洲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相互融资；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积极推进 RCEP，推进组建区域关税同盟并建成共同市场；探讨在未来成立亚洲中央银行，发行亚洲共同货币“亚元”，建立亚洲金融一体化监管体系；逐步由经济一体化渗透到文化、政治、安全等高敏感领域一体

化，重构亚洲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逐步在亚洲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具有强大黏合性的政治新联盟，发挥稳定地区局势及保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作用。

三、经略周边的主要国别对策

（一）增强中俄战略互信，加速扩展双边贸易和投资，深化中俄经济军事合作

中俄是本地区两个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对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中俄应该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和军事互助，打消俄罗斯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防范心态。针对蒙古国“第三邻国”外交战略，中国应趋利避害，顺势提升中俄“不结盟的联盟”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经济合作领域，应继续积极推动双方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对接，以加强落实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与俄远东地区及东西伯利亚之间的区域合作为突破口，以谋划实施中俄工业合作园区开发与自由贸易区建设为战略重点，切实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不断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与合作增长点。抓住俄罗斯加入 WTO 的契机，充分利用两国在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互补优势，不断提高两国在经贸领域务实合作的规模、层次和水平。运用中国的资本优势，重点推动若干大项目合作，优先考虑物流通道建设、跨境基础设施和边境口岸建设、能源开发与深加工以及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在安全事务领域，中俄除了在反恐、缉毒、跨国犯罪和打击三股势力方面继续加强合作之外，还应在遵循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努力在亚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架构。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也关系到俄罗斯进军亚太和远东开发战略的成败。针对目前美日军事同盟强化的趋势，中国应积极响应俄罗斯关于建立东北亚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东北亚安全，并就建立新型东北亚安全机制的重要性、迫切性尽快形成共识。中俄是二战同盟国和战胜国，还应共同维护二战历史结论的严肃性，通过双边合作与国际社会制止或延缓美日部署反导系统的进程；协调立场缓和朝鲜半岛南北对立及实现半岛无核化，减缓美韩军事同盟化倾向。如果必要，应进一步强化中俄军事合作，以中俄“非结盟的联盟”反制美日军事同盟。

（二）对美国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对日本坚持开展有理有节维权，积极寻求中日经济合作新途径

美国是影响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发展变化的关键性因素。必须在战略上高度重视与美国斡旋，积极应对其周边角逐，审慎对待中日关系背后的中美博弈，加强中日之间的经济政治联系，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中国对美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加强沟通、求同存异、深化合作、力避对抗，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前提。

中日是亚洲两个最重要的经济大国，和则两利，战则两伤。目前，双方在钓鱼岛争端中各有得失，难以退到争议的起点。从长远来看，时间的推移和钓鱼岛交叉管控的现状对中国有利。过去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政治和经济问题似乎捆绑得太紧，以致造成了“政冷经凉”、无牌可打的被动局面。今后，可以考虑继续申明主权，搁置争议，将政治和经济问题适当分离，积极寻求深化两国经贸互惠合作，推动中日和谐发展，突破亚洲经济一体化和实现互联互通的现实瓶颈。第一，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危机升级，为经济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双边环境。可积极通过双边或多边外交途径理喻斡旋，尽可能防止擦枪走火。第二，积极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的搁置主权争议办法。例如，宣布钓鱼岛及其水域为海洋自然保护区等，推动资源共享开发。第三，加快推进中日韩 FTA 谈判进程，以深化经济合作转移消解矛盾争端。第四，军事上做到有备无患，必要时，要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五，多讲相互依存，少谈民族豪情，以免刺激日本由来已久的岛国情绪和国内狭隘民粹主义观念；努力增强双方国民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谋划中日关系的长远健康发展。

（三）携手印巴孟缅，构建南亚中国经济新走廊

在中国与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印关系是决定性主导因素。中印之间现实利益摩擦激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相对落后，民间交往和经济互补有待进一步加强，维护和发展中印关系是南亚战略的核心关注点。中巴传统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中孟双边关系没有任何障碍。缅甸处在一个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影响大国博弈的地缘政治节点，中缅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情势。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础，树立新型大国形象，居间协调印巴关系，积极发挥亲善作用，改变过去“一边亲”的传统策略，制定明确行动计划和双边或多边机制，深化与南亚各国的经贸文化合作，努力寻求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加以巩固深化。

首先，应从战略层面加大重视力度，加快落实中印缅孟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战略构想。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需求甚大，中国应以基础设施合作为重要支点和突破口，弱化中印两国之间的现实利益摩擦，开启更大的经济合作空间。对于缅甸，中国应致力于把两国关系通过制度化框架固定下来，进一步扩大中缅经贸和产业投资合作，加快推动中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打通印度洋出海口。此外，借助云南的区位优势与辐射功能，加快构建南北方向的印度洋国际大通道，包括泛亚铁路和泛亚公路，打通从深圳到广州、南宁、昆明，再到缅甸、孟加拉、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亚洲大陆桥，加快建设外接东南亚、南亚、西亚，内连西南及东中部腹地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能源管网、物流通道和通信设施。其次，逐步加强在农业、科教、文化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

的全面合作。考虑建立“中国—南盟基金”，主要资助各种文化、教育和学术交流研究，以及资助各种推动两国民间加强沟通互助的试点项目。最后，利用现有多边机制，组建南盟自贸区。要重视发挥南盟的平台作用，推动建立“8+1”互动合作机制；重点发展“中国—南盟自贸区”，激活中国与南盟经济合作能量；定期举办“中国—南亚博览会”并形成长效机制；考虑设立补偿机制，通过特惠待遇等政策，防止自由贸易形势下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失衡。

（四）继续主导推动朝鲜半岛和平进程，尊重国际意愿，促进多方合作

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安全的主要热点，中国宜积极居中斡旋，避免矛盾激化，继续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重视发展同韩国的双边关系，把中韩经济日益相互依存转化为更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朝鲜通过内部改革参与东北亚经济合作，增强中国在朝对外合作中的影响作用，进而影响和带动东北亚国家进一步深化交往和合作，形成多国参与、共同开发的良好地缘政治经济合作新局面。

首先，客观看待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妥善斡旋争取主导权。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支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范围更广、力度更强的制裁案。帮助朝鲜认识到改善其外部环境的可能性，认识到重回“六方会谈”的必要性，以及赢得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在重启“六方会谈”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积极促成中朝美韩四方对话或中美朝三方对话，只要往前推进就是进步。继续加强对朝人道主义援助，加快对朝非敏感领域的投资和产业转移，避免危机升级。其次，利用地缘和区位优势，积极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要全面分析先期达成中韩自由贸易区协议的利弊，谨慎考虑中韩、中日、中日韩之间自贸区的优先次序问题。同时，加强与朝鲜在图们江流域和“长图吉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方面进行合作，逐渐引导朝鲜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将中朝经贸合作率先纳入规范化、法律化轨道，再逐步扩大东北亚各国在对朝文化、科技交流工作中的合作，最终促成各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互信水平的提高。最后，加紧着手中国与朝韩的陆海边界划分，对朝鲜半岛的统一要有预案。越早着手划定边界于中国越有利，可以免留后患。对于朝鲜半岛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框架下实现统一，必须提前准备各种预案。

（五）妥善处理南海争端，深化中国和东盟的全面合作

处理南海争端应以“维稳”为主，争取大多数东盟国家的理解，孤立个别挑衅国家。坚决反对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坚持主要以双边谈判和协商的方式缩小、管控分歧，深化中国与有关国家的海洋合作与共同开发。

第一，深化合作的关键是聚焦经济发展。双方应把握机遇，积极落实“2+7合作框架”设想，加快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尽快建成一个没有障碍的区域

大市场，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东盟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全方位合作。第二，存量增量并重推动互联互通。推动中国和东盟的合作从量的扩张走向质、量并重，加快推进贸易与投资便利化，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和金融等领域互联互通。争取尽快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东盟及本地区互联互通提供融资平台。积极参与东南亚各国高铁建设，提速中国和东盟在公路、铁路、航运、油气管道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从而将彼此在地缘上更加紧密地联接在一起。第三，抓住契机力推金融一体化。维护地区整体经济稳定离不开金融稳定，要继续扩大双边本币互换的规模和范围，扩大跨境贸易本币结算试点，发挥好中国—东盟银联体作用，有效降低区内贸易和投资的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促进双边贸易额持续扩大。第四，打破坚冰铺开海上丝绸之路。成立中越海上共同开发磋商工作组，与越南沿着海上、陆上、金融三条主线统筹推进合作，相互促进，实现互利共赢。稳步推进中国和东盟海上合作，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合作，构建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第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 TPP 挑战。中国与东盟国家应携手继续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为和平解决争议创造良好环境。力争与各相关国家于 2015 年底前全面完成 RCEP 谈判。促进 RCEP 与 TPP 交流互动。第六，积极发挥政府和民间“智库”的作用，加强对九段线的论证和研究。应该尽快确定一种符合客观真实和国际海洋法要求的“九段线”主张和解释，使之既能更好地维护中国南海权益，又便于顺利解决南海争端且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第七，坚持以“黄岩岛模式”应对菲律宾对中国南海部分岛屿主权的声索和挑衅。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维权的同时兼顾维稳，坚决捍卫南海和平稳定大局。不以武力为解决争端的主要手段；强调多样化手段的配合运用，不再单纯以外交手段为主；强调中国在处理争端中的积极态势，不仅要平息争端，而且要努力将事态向有利于中方转变。

（六）深化与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实施向西开放与新疆沿边开发开放战略

中国与中亚各国不存在领土争端，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要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为纽带，全面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能源合作、农业合作、金融合作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协作。继续积极探索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加快新疆沿边经济带的开发开放步伐，充分发挥新疆对中亚开放的先发优势，以进一步推动中哈合作为基础，全面加强与中国中亚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增加中国与沿线各国民众的人文交往和相互了解。切实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在涉及主权、安全、领土完整、政治制度、社会稳定、发展道路和模式等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应对威胁和挑战，维护成员国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

责任编辑：李 蕊

全球军品贸易现状及发展趋势

任海平 徐长春

摘要：近年来，全球军品大宗交易层出不穷，总体规模在全球经济低迷中逆势增长，实际成交量也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峰。全球军品贸易在呈现军工强国垄断供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国家主导需求，更加注重经济效应，高新技术武器交易越来越多，交易方式更加灵活多样等趋势外，也开启了制度化、有序化、透明化和无害化的窗口。

关键词：军品贸易 现状 趋势

作者简介：任海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徐长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在全球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极力重振实体经济，全力增加国际贸易份额，发展中经济体则力图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更多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民品贸易呈现低迷景象。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贸易，军品贸易近年来却大宗交易层出不穷，总体规模逆势增长，成为全球经济低迷大背景下的“亮点”。

一、美俄两大巨头的军品贸易现状及趋势

全球军品贸易竞争主要集中在两大军工强国——美国和俄罗斯。两国都具有军品技

术和生产优势，占据全球军品贸易的主要地位。但两国军品贸易也各具特色，存在很大差别。

（一）美国军品贸易现状及趋势

当前，美国军品出口稳居全球第一。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2012年美国占据全球军品市场的42%。而据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网的数据，2012年美国武器出口合同额达到600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沙特采购的总额294亿美元的84架F-15战斗机和改进70架飞机的合同，以及日本采购的总额100亿美元的42架F-35战斗机。2013年，美国军品出口规模总量约为241.14亿美元，占全球市场的40.05%。尽管统计口径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稳居世界军品贸易市场霸主地位。

出于国际战略的需要，美国对兼具民用和军用性质的商品实施管制，但难以阻挡军品贸易规模扩大的趋势。其主要有两套管制清单，分别是商务部的“商业管制清单”与国务院的“美国军品清单”，国防部和其他机构有时也会提出管制项目。由于事权复杂，获得出口许可申请困难重重，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军品贸易的发展。但军品贸易是最赚钱的买卖之一，是美国获取经济利益，赚取外汇，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且，军事技术的发展对民用科技与经济的推动作用相当明显。这既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又符合利益集团的需要，也有利于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特别是由于经济萎靡，美国企业强烈抱怨政府冷战时期制定的出口管制法规已过时，使自己每年损失数十亿美元生意。美国盟邦也不满美国军品出口管制政策的严苛，抱怨难以获得美国武器系统的备用零件。在军品商和盟邦的联合压力下，也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美国不得不放宽军品出口管制政策。据有关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曾花一年时间检讨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奥巴马总统提出，修改美国军品及高科技产品出口法规，放宽对国防、科技、航天产品的出口限制，促进贸易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奥巴马总统重点推进军品贸易制度改革，加强高敏感度商品保护，放宽低敏感度商品出口限制。主要做法包括，对需取得出口许可的商品有更明确定义、划分管制等级、设立单一主管机构。这可使军品管制清单上32%的商品解除管制，从波音飞机公司、大型国防用品制造商汉威和联合技术，到软件开发商微软，都可因此受惠。

近年来，美国在实施战略东移，军品贸易重心也向亚太地区转移。美国不仅加大向亚太地区增派先进装备的力度，还大幅增加对该地区出口武器的力度。冷战期间，美国一直利用苏联威胁来倾销武器，今天则通过炒作中国威胁挑起争端，刺激军品需求，抬高军品价格，促进军品销售。美国航天工业协会的报告称：“无独有偶，增长的中国国防预算已经导致美国大幅增加对南亚和东亚的武器销售。这些销售也必然导致大规模的

武器交付。”美国航天工业协会的副会长强调，重心转移“将为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为友好国家提供军事装备的机遇”。路透社报道称，为应对地区安全形势，美国显著增加了中国和朝鲜周边盟国战机、反导系统和其他价格高昂武器出售的力度。美国五角大楼国防安全合作局向路透社表示，2012 财年，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辖区内国家签订的军售合同总额达到了 137 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5.4%。日本在打造针对不同射程弹道导弹的分层拦截网方面，越来越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东京打算为其两艘导弹驱逐舰进行宙斯盾系统升级，还选择了 F-35 以替代老旧机型作为下一代主力战斗机，首笔合同价值就超过 50 亿美元。新加坡和韩国也在考虑 F-35，韩国的项目是价值超过 70 亿美元的 60 架飞机。美国对印军售也从 2008 年的几乎为零增加到大约 80 亿美元。2013 年在对印军售方面，美国全面超过俄罗斯，成为对印最大军品出口国。韩联社称，美国大幅增加对韩国和日本等位于中国与朝鲜周边、“备受安全问题折磨”的国家和地区销售高价武器，对亚太地区的武器输出前景非常光明。在美国努力缩减财政赤字的情况下，美国军工企业有望在战略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克服危机。俄罗斯 RT 网站则称，这可能会使亚太局势变得更糟，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美国军工企业。

展望未来，美国军品贸易规模还将继续扩大。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军品不仅可带来高额利润，还可成为美国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内政的重要砝码及工具。因此，预计今后很长时期内，在各种利益机制推动下，美国军品贸易不会削弱，规模还会大幅扩大。奥巴马已成立“出口执行协调中心”，将两份出口管制清单合并成一份，依军事和情报重要性不同划分为三类。新制度下，军品清单上的 12000 项管制商品有 74% 改为低管制商业清单，部分甚至解除管制，有 26% 维持在军品清单上，但不会列入最高管制等级。这为美国军品贸易规模扩张打开了更大的口子。另外，从订单看，美国军品贸易规模已出现不断扩大趋势。根据美国长期订单和采购意向初步统计，美国军品市场 2014 年将达到 326.53 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 51.57%；2015 年将达到 322.38 亿美元，占全球的 41.6%。2008 年—2011 年，美国军品出口额为 834.36 亿美元，占全球的 38.36%；2012 年—2015 年美国出口额将不少于 1145.22 亿美元，占全球的 42.28%。

（二）俄罗斯军品贸易现状及趋势

根据普京在俄国防部军事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宣布的数据，俄罗斯 2012 年武器出口总额已达 140 亿美元，超过了原计划的 135 亿美元。军品已成为在资源、能源之外，俄罗斯最重要的出口商品。在俄罗斯出口武器名单中，占据首位的是军用飞机，随后依次为海军舰艇、陆军装备和防空武器。虽然俄罗斯武器出口已步入良性循环，但尚存不少挑战。一是军品贸易变数较大。许多军售合同能否正常履行还有问号。二是全球武器出口竞争加剧。近年来，美国等西方经济体经济不景气，不断加大武器出口力度，调整

武器出口策略，这加剧了俄军品出口的竞争。三是俄罗斯军工企业产能不足。由于俄国国防工业投入长期不足，基础设施和工艺设备老化，运营效率低，管理水平不高，人员流失严重，产能不足问题凸显，订单往往不能按期完成。四是传统市场渐趋饱和。未雨绸缪，俄军工行业开始加大国际推介力度，拓展新市场，深挖潜力。

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军品贸易实现了止跌回升。在苏联解体后的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俄罗斯武器出口总额始终在低位徘徊，一直没有超过 20 亿美元，俄罗斯丧失了原苏联在国际军贸市场中的领先地位。1999 年普京就任总理后，将武器出口提升到战略高度，把武器出口看作是振兴国防工业、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大国地位、推行国家战略的重要手段。他任期内的一大目标就是振兴俄罗斯军事工业、增加武器出口，借此恢复国家经济，使俄罗斯重返世界经济强国行列。2006 年，俄罗斯军品出口额达到 64 亿美元，2007 年为 74 亿美元，2011 年达到 132 亿美元，稳居全球军品贸易第二名。2008 年—2011 年，俄罗斯军品出口总额为 297.98 亿美元，占全球的 13.7%。俄罗斯武器出口在国际市场得到明显好转，得益于其大力推进国防工业体系改革。2000 年 11 月，俄罗斯整合了境内所有实力雄厚、享有盛誉的军工企业和研发机构，成立了国防出口公司，并且是俄目前唯一的国家军品进出口商。2012 年，超过 80% 的俄制武器由该公司出口。

俄罗斯将出口武器作为参与全球事务、发挥影响力的最直接、最有效手段之一。如，积极推进与印度的多方面军事技术合作，与美欧争夺在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影响力；通过向越南出售基洛级潜艇、苏-30MKK 战斗机、堡垒岸防反舰导弹等武器，直接介入南海问题。同时，或明或暗向叙利亚、伊朗等国输送武器，增大在国际热点地区和问题上的话语权。重视对委内瑞拉、阿尔及利亚等与俄罗斯传统友好国家的武器出口，保持在拉美地区和非洲对西方的战略牵制，甚至还向作为美国军事盟国的韩国推销 T-50 第五代战斗机。

俄罗斯军品出口目的地主要是发展中经济体，并以亚太经济体为主。据美国蒂尔国际预测公司研究报告，全球有 140 多个国家装备了俄制武器。这些国家大部分是第三世界国家，约 90 个国家以俄制武器为主。亚太是俄制武器出口的主要市场，所占份额超过 60%，中东和北非所占份额超过 20%，拉美约占 10%。中国和印度近年来成为俄制武器的主要买主。近年来，中国向俄罗斯购买了战斗机、直升机、非核动力潜艇和防空导弹等武器，并从购买成系统的武器装备向购买设备和部件为主转变。自 2006 年开始，中国在俄罗斯军品出口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

目前，印度成了俄罗斯最大的武器客户，所占份额超过 30%。自 2008 年—2011 年，俄罗斯一直占据印度军品市场的头把交椅，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武器装备价值达 71.6 亿美元，占印武器进口总额的 51.6%。2012 年，印军品进口贸易有 80% 来自俄罗斯，总额达

73.4亿美元,但部分项目的实施有所拖延。据世界军品贸易分析中心预测,未来四年,俄出口至印度的武器装备总额将翻倍,但占印军品进口总额的份额将减少1/3。目前,俄印两国最大的武器交易合同是“维卡拉马迪亚”号航母,最终交易额高达23.4亿美元。俄印第二大武器交易合同是两艘11356型护卫舰,价值10亿美元。第三大合同则是2012年1月租赁给印海军的9711型“海豹”号核潜艇,租金高达9.2亿美元。根据2000年和2007年签订的合同,俄还将向印度交付40架米-17V5直升机、9架米格-29K/KUB舰载型战斗机和33架苏-30MKI战斗机,继续为印升级改造米格-29战斗机、图-142反潜飞机、米-17直升机和模拟器,同时交付卡-31雷达巡逻直升机、飞机和火箭发动机。此外,将继续为印维修877EKM型常规潜艇,许可生产T-90S主战坦克,并交付Club-S反舰导弹等。

展望未来,俄罗斯军品出口还会稳步增长,但难与美国匹敌。2012年,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签订了1309份军品出口合同,合同总额为2011年的2.5倍。目前,该公司与65个国家签订的出口订单总额超过了373亿美元。与2011年相比,2012年该公司各主要武器装备种类的新签合同金额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空军装备增长90%,陆军装备增长110%,海军装备增长6倍。2012年—2015年俄罗斯军品出口总额预计达325亿美元,占全球的12%。根据签署的出口意向协议统计,在未来几年内,俄武器出口年度总额有望达到300亿美元。但因长期合同的数量在大幅减少,俄罗斯难与美国匹敌。从现有长期合同角度看,俄罗斯2013年出口约94.38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5.68%;2014年为49.5亿美元,占全球的7.41%;2015年为50.77亿美元,占全球的6.55%。从出口空间分布上看,亚太在俄出口中所占比重会稳中有降,拉美、中东和北非市场增长迅速。其中,越南、阿尔及利亚和委内瑞拉所占份额上升较快。

二、全球军品贸易市场总体状况

经过多年的演化,全球军品贸易市场已经初具规模,并呈现出市场格局相对稳定的态势。全球军品贸易市场的状况主要表现在总体规模及供需双方整体态势上。

(一) 全球军品贸易规模迅速扩张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3年度报告,在2008年—2012年的五年间,世界军品贸易交易量同比上升了17%,2012年全球军品贸易总额约为700亿美元。另据英国《简氏防务周刊》的报告,2008年—2012年,全球军品贸易增加了735亿美元,增长了30%,2012年全球军品贸易总额约为735亿美元,到2020年,这一数字还将增加一倍以上,军品贸易规模将呈现“爆炸式”增长特征。

（二）军品供给市场呈现美俄主导局面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13 年度报告，世界前五大武器供应国分别是美国（30%）、俄罗斯（26%）、德国（7%）、法国（6%）和中国（5%）。2012 年，名列前三位的美国、俄罗斯和法国分别占 42%、19%和 9%，美俄两国所占份额之和超过了全球军品贸易总额的 60%。总之，美俄占据军品出口头两把交椅，德、法紧随其后。2013 年数据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中国取代英国跻身世界第五大常规武器出口国，这也是这一排名 20 年来第一次发生变化。

俄罗斯世界军品贸易分析中心的统计，也大致印证了军品供给市场基本格局。按军品出口合同额计算，2009 年—2012 年，美国军品出口合同额与实际出口额分别是 1184.25 亿美元和 880.13 亿美元（前者比后者高 34.55%），这是所有军品出口国中最高的指标。2012 年，美国军品出口合同额达 189.28 亿美元，占全球军品出口合同总额的 28.08%，位居世界第一。俄罗斯 2009 年—2012 年签订的军品出口合同总额大约为 404.12 亿美元，占全球的 15.76%。俄罗斯 2012 年军品出口合同额名列全球第二，为 181.3 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 26.9%。创下俄罗斯近四年来的记录，扭转了新签合同额与实际出口额比值下降的趋势。目前，俄罗斯订单总额稳定在 350 亿~400 亿美元的水平上。英国 2009 年—2012 年军品出口合同总额为 114.68 亿美元，占全球总额的 4.47%，名列全球第四。英国 2012 年军品出口合同额位居全球第三，为 64.37 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 9.55%，这是其近四年来的最高指标。2012 年，军品出口额位居第四到第十的国家依次是：德国（2009 年—2012 年位居第六）、以色列（2009 年—2012 年位居第五）、意大利（2009 年—2012 年位居第七）、法国（2009 年—2012 年位居第三）、瑞士（2009 年—2012 年位居第十二）、瑞典（2009 年—2012 年位居第九）、西班牙（2009 年—2012 年位居第八）。另外，中国 2012 年军品出口合同额名列全球第十三（2009 年—2012 年位居第十）。十大军品出口国 2009 年—2012 年合同总额为 2300.98 亿美元，占全球的 89.74%。十大军品出口国 2012 年签订军品出口合同总额为 608.7 亿美元，占全球的 90.31%。

（三）军品需求市场呈现亚洲主导态势

当前，美国从阿富汗抽身，国际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导致亚洲地区潜在冲突增加，也促使该地区成为军品需求主导市场。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13 年度报告，世界五大主要常规武器进口国分别是印度、中国、巴基斯坦、韩国和新加坡，分别占国际军购市场的 12%、6%、5%、5%、4%，全部都来自亚洲。其中，在 2012 年全球 20 大项军品交易中，印度就占了 6 项。据有关统计，近十年来，世界十大武器进口国（地区）也主要集中在亚洲，共进口了 1500 亿美元军品，占同期全球军品贸易总额的 65%。

其中，又以中东为亚洲军购之最，十年共购进 700 多亿美元军品，占同期世界军品贸易总额的 30% 左右，占同期亚洲军品购入总额的近 47%。东亚仅次于中东，为亚洲第二大军品进口市场。东亚地区在世界大型常规武器进口总额中的比例，已由上世纪 80 年代的 11% 上升到目前的 25%，最高年份甚至超过 35%。其中，台湾地区和日本、韩国是东亚地区进口大户。台湾十年共购进 230 多亿美元武器，约占同期全球军贸总额 10%。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武器进口也十分抢眼，其中，印度跻身全球十大武器进口国。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为建立自主国防、加强自身安全、维护经济利益，在处理与邻国的纠纷和地区事务中增强话语权，也购置了大量武器装备，包括潜艇、水面舰艇、战斗机、坦克和导弹系统等。此外，泰国还装备了东亚地区第一艘小型航空母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称，亚太地区在过去五年一直居全球武器进口之首，并包揽了前五名进口国。

北约和西欧国家是仅次于亚洲的第二大武器市场，年军购额占世界军贸总额的 30% 左右。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世界七大国防工业强国武器进口（特别是子系统、零配件和原料）也占全球总额的 1/4~1/2。美国某些武器零配件进口额一般占其防务支出的 2%~3%，主要供应商是英国。同时，英国也一直是北约欧洲成员国中美国军事装备的最大买主。其他工业基础较为薄弱的北约和欧盟国家，军品进口额都超过自制份额。

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拉美、中东欧和北非国家也开始拨巨款装备军队，并逐步上升为世界军贸热点。例如，秘鲁投资 8 亿美元用于“主权防御”；委内瑞拉十年内也花费了 12 亿美元更新军备；哥伦比亚、智利、巴西也都制定了改善军备的长期计划。过去十年中，中东欧国家也花费了数百亿美元用北约武器改装自己的军备，其中，仅更换战斗机一项就花费了 100 多亿美元。非洲国家每年也花费约 10 亿美元购买武器，成为东西方军品商争夺对象。

三、全球军品贸易未来发展的五大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以及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全球军品贸易也呈现出一些与冷战时期完全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全球军品贸易未来发展主要呈现以下五大趋势。

（一）军工强国垄断全球军品供给，主导全球军事及战略格局

首先，全球军工强国继续垄断全球军品供给市场。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每年发布的国际军工“百强榜”中，约 80% 的上榜公司是美国或西欧公司，年销售额约占军售总额的 90% 以上。其中，美国公司占到一半，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芬兰、挪威、西班牙、瑞典、瑞士等西欧国家的公司约占 30%，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以色列、土耳其

其等亚洲国家的公司约占 20%，总部设在拉丁美洲或非洲的企业目前还没有出现在百强榜中。从近年销售额看，排名前十的军品供应商有，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门、通用动力、雷神、L-3 通信和联合技术公司，绝大多数是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近年来，前十大军品供应商的年度销售额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 60%。

总体来看，美俄两个超级军品出口大国独霸、争霸的局面近期内不会改变，并主导全球军事战略格局。美国是世界军工、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其武器装备先进性在近几次战争中得到了检验和证明，世人皆知，在世界军品贸易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一时难以撼动。冷战后，俄罗斯军事科技、生产水平虽有所下降，但随着经济发展，其军事生产和科技能力有所回升，加之其在军品出口方面更多考虑经济因素，俄罗斯军品出口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保持世界领先态势，可与美国一争高下。西欧诸军工强国加强了军工生产、科研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在战术导弹、地面武器、飞机、舰船、卫星运载火箭等方面，建立了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的军工集团，以抱团的方式加强了在世界军品贸易市场上的争夺，但短期内难以撼动美俄在国际军贸市场上的地位。近年来，发展中国家购买的军品占到全球年交易额的 70% 左右，其中约九成购自美国、俄罗斯和法国。这些军工强国通过垄断全球军品供给市场，不仅从进口国赚取了丰厚利润，还对进口国内政、外交，甚至经济、科技产生重大影响，左右地区和国际军事战略形势发展进程。

（二）发展中国家是军品主要买家，亚太是军品主要需求市场

存在冲突或潜在冲突风险的地区积极购买武器，这一规律注定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太国家是世界武器装备进口最多的地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具有购买武器的经济能力。中东产油国凭借石油天然气出口赚取了大量石油美元，具有购买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经济能力。二是美国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太。这意味着，欧洲关联地区和亚太地区将出现更多的冲突甚至战争。在中亚，半月形冲突带因安全力量真空而爆发冲突。而亚太地区则会因地缘政治板块重组而爆发冲突，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印巴问题、南海归属争端等问题的凸显，验证了这一点。对于热点问题相关国家来说，进口先进武器装备来加强国防、提升军力是现实选择。这就可能引发新一轮区域性军备竞赛。

近年来，正是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触发了亚太地区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而且还将延续。据俄罗斯世界军贸分析中心统计，2012 年，新加坡接收了其在数年前从瑞典购买的两艘二手瓦斯特哥特兰级潜艇中的第二艘；印度尼西亚海军则向韩国订购了三艘 1400 吨级潜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计划购买额外潜艇；泰国和菲律宾把潜艇入役纳入计划之中；印度武器进口总额达 94 亿美元。越南耗资数十亿美元购买基洛级潜艇、苏-30MK2 战斗机、猎豹级护卫舰、宝石超音速反舰导弹、斯托克-E 型防空雷达等先进武器。随着

军备竞赛的加剧，亚太军购还将加码。印度计划 2012 年—2016 年军购额将达到 514 亿美元，并将长期高居亚太各国榜首。日本宣布全球鹰无人机采购计划，随后韩国推出爱国者-3 导弹防御系统采购计划。日本耗资超过 70 亿美元购买了 42 架 F-35 战斗机，韩国则抛出了 72 亿美元的下一代战斗机投标计划。菲律宾继引进汉密尔顿级巡逻舰后，又提出了新的购买巡逻舰、战斗机计划。澳大利亚除了正在购买中的大型水面舰艇和战斗机之外，还计划购买 12 艘先进的大型常规潜艇。

（三）军贸更加注重经济效应，军事和政治效应重要性降低

与一般贸易不同，军贸是把多刃剑，是影响国际格局的有力杠杆，在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具有特殊地位。在战略上，军品贸易在调整多边关系、改善战略态势、平衡战略力量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它能造成一个地区或一个国际体系内战略力量格局变化，迫使一些国家调整战略，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局势变化，寻求新的均势。在政治上，国家政治决定着军品贸易动机，是国家间政治的直接反映，并反作用于国家间政治。一国通过军品贸易能对他国政治保持一定程度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可对他国政治进行干预和控制。在军事上，交战国通过向其他国家购买先进武器，能够迅速提高战斗力，改变战场态势，有时甚至直接决定胜负。在外交上，军品贸易能对交易双方甚至与此相关的多边外交关系及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如，美对台军售历来是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每次美向台军售，中美关系都要受到冲击。在经济上，军品贸易是世界上最赚钱的买卖之一，利润惊人，是军事大国获取经济利益，保证本国军事工业生存与发展，构造国防工业基础的重要途径。这不仅能刺激武器出口国军工产业，还能带动其他相关民品产业发展。

当前，军贸更加注重其经济效应。冷战时期，由于东西方激烈的对峙，国际军品贸易作为军事斗争的一种手段，带有强烈的集团对抗性。作为各自阵营的主要军品供应者，美苏两国在向自己的盟友或准盟友提供武器装备时，主要考虑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与军事利益。冷战后，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军事经济活动的对外延伸与拓展，军贸的角色定位开始悄然发生变化，在重视其军事和政治效应的同时，更加突出其经济效应。俄罗斯军品出口主要按商业原则进行，不论国别、地区和武器种类，只要支付硬通货，就连竞争对手美、英、法等国也可从俄购买命中率比爱国者导弹还高的 S-300W 反导弹系统。不仅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国也更加着眼于经济利益而输出军品，美国在突出政治、军事利益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经济利益，关注国内就业。美国一些高级官员认为，光靠裁军节支，不仅数额少而且伤元气，而节支与对外军售“创收”并举，不仅得利丰厚，而且有助于缓解国内军工企业所受到的冲击。有资料统计，美国每签订 1 亿美元的军贸合同，就会增加 15000 人的就业机会。

（四）高新技术武器交易越来越多，交易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迫使高新技术武器交易越来越多。在过去，主要武器输出国恪守只卖本国过时、淘汰武器的原则，世界军品市场上多是二、三流武器装备。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军品贸易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军贸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先进武器装备和高新军事技术的交易越来越多。冷战时期内那种以陆军武器等传统的常规武器为代表的“二流军品”，在军品市场上渐被冷落，代之而起的是尖端海空军武器。如，战斗机和舰艇在亚洲地区成为畅销武器，海军武器在一向以陆空军武器为主的中东市场也成为抢手货。据有关统计，近十年间，国际军贸市场上尖端武器与高新技术的交易额，在世界军品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 50%，未来也将成为世界军品贸易的重要增长点。

为确保在世界一些重要地区的影响力，并继续垄断军贸市场，世界各军工强国纷纷加大武器推销力度。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降低了销售技术门槛，向中东地区和东亚地区，出售了价值 500 多亿美元的可用于发动突然袭击和进行大规模进攻行动的先进武器，包括先进的作战飞机、攻击直升机、预警机、爱国者导弹、先进的舰艇以及主战坦克等。为推动先进武器出口，美国取消了向巴基斯坦、捷克、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和拉美出售尖端武器的禁令。俄罗斯为了摆脱在军贸市场上的被动局面，也大打“尖端武器牌”。近年来，法国武器出口总额中 90%以上是最新式的武器系统。为了扩大军品出口，占领新市场，有的军品供应国甚至还根据购买国的具体需求，专门研制设计出口型新式武器。如，法国国防研制费的 70%用于研制出口型武器；达索公司专门为出口研制的幻影 2000-5 型战斗机，投入了 3.5 亿美元。总体来看，世界军贸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还没有改变，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还将延续。

为适应军贸市场的激烈竞争环境，开拓市场，主要军品供应国纷纷采取灵活多样的贸易形式。目前，低价倾销、租赁贸易、易货贸易、联合研制、联合生产、债务抵押、出口信贷、分期付款、设备改进、技术培训、转让武器生产技术以及其它长期合作方式等都出现在市场上。据有关统计，为促进军品对外销售，美国政府近年来每财年都要拨款几十亿美元，用于提供军品销售信贷担保。冷战后的十年中，补偿贸易占到了世界军品贸易总额的 60%左右；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一数据已上升到 2/3 以上，美国更是高达 90%以上。同时，武器装备输入国在签订进口合同时纷纷提出联合生产、转让技术或其他补偿要求，特别是发达国家在进口武器装备时更是如此。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在进口武器装备时，往往要求得到百分之百的贸易补偿。波兰曾与美国公司签订一份价值为 35 亿美元的飞机进口合同，所要求的贸易补偿达 55 亿美元。因此，补偿贸易、提供政府信贷担保、合作生产和技术转让等形式，成了世界军品贸易市场的主要交易方式，被世界

许多国家广泛采用。

（五）军品贸易制度化、有序化、透明化和无害化的窗口开启

军品贸易的无限扩张给国际社会治理带来了巨大冲击。一是加剧了热点地区的冲突。如，中东、非洲、东亚及南亚等世界热点地区的冲突。进一步扩张军品市场的需求，也带来了军品的无规则扩散；反过来，军品贸易也加剧了这些地区流血冲突的升级，黑市军品泛滥也使潜在的冲突向世界各地扩散，使恐怖主义更容易发生，更容易造成巨大损失。更重要的是，使建立地区安全互信机制的努力更加艰难。二是军民高技术边界的模糊，使军控标准逐渐丧失原来分明的界限，增加了军控难度。军品贸易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安全治理极为重要的负面因素，成为影响全球安全的不可忽视的源头。

鉴于全球军品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社会呼吁加强对军品贸易的监管和治理。要求国家必须对军贸进行严格管理，不断完善和加强管控机制，并使之制度化、有序化、透明化，防止任何危及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的情况出现；要求对军品出口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要求坚持遵循三项原则，即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自卫能力，不损害有关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不干涉接受国内政；要在恪守安理会决议等国际法义务前提下，根据本国法规实行严格管理，不能违反国际公约和联合国决议，不能危及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

联合国《武器贸易条约》草案的通过，标志着全球军品贸易治理进入新阶段。在经历七年的艰难谈判后，联合国在 2013 年 4 月 2 日以 54 票赞成的结果，终于通过了《武器贸易条约》草案，有史以来全球第一个，监管年交易额 700 亿美元常规武器和预防数十亿美元非法武器交易的全球性条约，横空出世。

该条约要求，缔约国要建立常规武器出口管制机制和管制清单，并实施统一的出口审查标准，包括武器出口是否损害国际及地区和平与安全、是否违反国际义务、是否会流入非法市场等。条约规定了相应的履约机制，要求缔约国保留武器出口记录，并提交年度武器出口情况报告。这既可推动缔约国忠实履行条约义务，也有助于增进国家间的互信。此外，条约还兼顾武器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利益，要求出口国和进口国合作防止已出口的武器被非法转让。该条约的出现，对保护合法武器贸易，打击全球非法武器贸易，促进和平与发展有重要意义，标志着国际武器贸易“无法可依”的时代结束。

虽然，《武器贸易条约》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对其也有批评之声，但毕竟标志着人类军贸治理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有专家指出，条约有关出口审查标准缺乏客观性，如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和人权等，能否有效落实全凭各国“自觉自愿”。再如，条约未明确规定“禁止向非国家行为体转让武器”，为一些国家借售武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向特

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留了口子。还有人认为，条约赋予出口国的权利过大，在出现出口国因故不能按期履行军贸合同等情况时，出口国可能援引条约内容为自己开脱。然而，纵然在内容和程序上都有缺陷，《武器贸易条约》的积极意义仍不可否认，这标志着全球军贸市场无序化、不可控的时代结束了。

虽然条约没有给出标准的军品贸易模式，但是国际组织已经为合格的、负责任的军品贸易国际“公民”修炼指明了努力方向。在条约谈判期间，一些非政府组织对主要武器出口国的军贸政策进行了审查和对比，他们对中国的军品贸易政策和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根据中国现行法规，中国的军品出口遵循三项原则，由获得授权的指定公司经营，所有出口均需申请许可证，申请材料需包括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等有效证明文件。这些非政府组织认为，中国的做法符合《武器贸易条约》的规定，在有些方面甚至做得更好、更好。通过审查和评比，国际组织实际上代表国际社会指明了未来国际军贸主体行为模式发展方向，预示着未来全球军贸制度化、有序化、透明化和无害化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种对国际安全、国际关系、国际格局都有着重大影响的特殊贸易，军贸有序化、透明化和无害化的窗口已经开启。

参考文献：

1. 黄如安、罗革伪：《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军事工业与贸易》，国防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2. 那勇、王云峰：《美重返亚太引发地区军备竞赛，军品商大发横财》，《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9日。
3. 郭绘：《美国军工复合体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4. 刘薇、于冬：《“枭龙”跨国生意链》，《南方周末》2013年5月16日。
5. 李大鹏：《2012全球军品贸易达700亿美元，为冷战以来最高》，《中国青年报》2013年4月12日。
6.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SIPRI Yearbook*, 2012.
7.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he SIPRI Yearbook*, 2013.
8. 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2012.
9. U.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s and Arms Transfers*, 2013.
10.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 2012.
11.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Conventional Arms Transfers to Developing Nations*, 2013.
12. Jurgen Brauer and J. Paul Dunne, Arms Trade Offsets: What do We Know? *Paper for 8th Annual Defence Economics and Security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2013.

责任编辑：李蕊

增强与中国实力相称的话语权体系

张茉楠

摘要：“话语权”是一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加快建立与实力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体系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核心。然而，“中国声音”目前还严重滞后于内容丰富的“中国实践”，还未形成与“中国实力”相匹配的多层次话语权体系。因此，中国需要清醒地分析现状，深刻地剖析问题，有效地制订对策，应从国家战略、公共外交、国际交流平台、制度建设、理论创新等方面，加快实施中国话语权体系战略。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 软实力 智库 传播中国

作者简介：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博士后、副研究员。

当前，中国正在从一个地区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从小舞台走向大舞台。掌握话语权是所有大国崛起的目标，也是大国成为强国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并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给世界带来了巨大机遇。应当承认，“中国声音”还严重滞后于内容丰富的“中国实践”，目前我们还未形成与“中国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体系。尽快扭转中国话语权弱势地位，实现从国际话语权体系中的“被动—响应”向“主动—影响”转变，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一、增强国家话语权体系是一国根本利益

要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化被动为主动，中国首先要深刻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意义。

（一）建立与实力相匹配话语权，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

“话语权”是一国软实力的集中体现。在国际政治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掌握与自身地位相称的话语权是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核心所在。

改革开放和深入参与全球化，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年均 9.9% 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全球 1/5 人口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模式，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变革方式，中国的角色与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35 年前的中国是一个低收入国家，1980 年中国 GDP 总量占全球总量的 1.9%，位居第七位；而今天的中国 GDP 总量已升至全球 10.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工业品制造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08 年—2012 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 9.3%。5 年间，中国经济净增量占全球经济净增量的 29.8%。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 7.8%，GDP 折合美元比上年净增 9050 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净增量的 60.9%。2013 年底，中国经济总量达 9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名义国民经济总值的一半，相当于金砖国家其他成员的经济总量之和的 1.5 倍还多。中国是世界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2000 年—2012 年，中国对世界出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 15%（美国为 6.63%），对世界进口额增量的贡献率为 11.86%（美国为 8.53%）。2000 年—2013 年，中国累计进口总额近 13 万亿美元，为世界各国直接创造了至少上亿个就业岗位。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经济发展，重视增强国家实力，但忽视了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即如何盘活这些实力资源，实现既定的对外经济和外交目标。经济实力并不等于影响力，也不等于话语权。中国 GDP 世界第二的身份，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就是第二，中国的经济话语权有限。事实上，美国的话语权比中国大，欧盟的话语权比中国大，七国集团的话语权比中国大。世界上主要的经济规则话语权、主要的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主要的知识产权话语权、主要的证券市场话语权、主要的期货市场话语权、主要的金融机构话语权、主要的货币话语权、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话语权，基本都是西方国家在主导。在当今世界上，国际经济话语权，仍然主要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掌控。

中国话语权仍然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中国话语权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比差距较大；二是中国话语权与西方国家的话语权不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有较大差距。中国虽在努

力发声，但迄今中国仍处于国际话语体系的边缘地带，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面临着话语权不足的困境。例如，从西方意识形态研究中得出的中国，与从中国本土国情出发研究看到的中国，存在很大认知偏差；中国发展为世界做出的巨大贡献往往被遮蔽，而中国发展对世界造成的冲击往往被放大；中美经济实力的对比明显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但中国并未获得因美国经济实力相对下降而带来的优势，中国经济实力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并转化为国际体系中的实际影响力。因此，中国必须有效盘活实力资源，发出强有力的“中国声音”，把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

（二）积极塑造“国家形象”，事关国家发展前途

冷战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不断“创新”有关中国形象的话语，利用其舆论霸权随意解读甚至误导国际舆论。从“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到“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妖魔化”，使中国陷入国际舆论的被动应对之中。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国实力“此消彼长”和利益重新分配。在“中国威胁论”之后，西方国家又批评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不合作，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让步，在钓鱼岛和黄岩岛问题上态度“日趋强硬”，认为中国“过分自信”，表现得“咄咄逼人”，并开始提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不确定论”“中国必胜论”等新话语。美国外交学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Elizabeth Economy 认为，中国“更不愿意妥协了”“更不愿意与邻国合作，并更倾向于在发生政策分歧时选择与它们进行对抗”。法国人埃里克·伊斯哈勒维奇还出版了《中国的傲慢》一书，批评中国已经从自信到了“傲慢”。这些无疑都反映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严重不足。或者说，面对美国和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自身的国际话语权尚不能在国际舆论中掌握主动，尚不足以引导国际舆论走上公正地评价中国和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发展方向。因此，如何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寻求中国和平崛起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事关和平崛起的成败。

（三）国际对中国期待发生新变化，须凸显“中国立场”

从全球背景来看，话语权的问题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是新国际秩序建构的内在需要。“一超多强”的时代已经开始动摇，国际秩序面对革故鼎新，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工业国家异军突起等等，一系列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预示着国际秩序即将重组。特别是一些原本被动服从既定国际话语体系的国家，强烈要求参与国际新话语体系建构，联合国气候大会越来越成为这些国家争取自己话语权的“场域”，在 WTO 框架下诞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也是如此。

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地位也发

生巨大变化，各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更加关注“中国立场”，更加注重对中国的借重与合作。同时，中国被加速推向国际事务前台，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等方面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如何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减少外部对中国崛起的误解和误判？如何在全球经济、社会、生态及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承担大国责任，并增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这些都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迫切需要发出“中国声音”，凸显“中国作用”。

（四）阐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对世界的指向意义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大国崛起都需要以自己的话语体系提出新方案，解决新问题。中国在历史经验、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上同美国有显著区别，不可能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无缝对接”，这与英国、美国之间的权力接替和战后日本融入国际体系完全不同。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都在反思西方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缺陷，特别是全球经济正处于大调整、大变革之中，无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还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都处于自身结构性改革的十字路口，全球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呼唤新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增长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并不拘泥于固有的理论框架，相反，很多理论基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形成，这种模式远远超越西方学者的理解。在西方国家看来，理论在历史中形成，应该用现有理论，通过理论指导实践。相比之下，中国更常在改革的实践中推动理论的形成和深化。中国的改革模式和改革路径体现了大国经济的特征，改革经历了从局部到总体，从控制到放开的渐进式转变。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历过特殊的发展历史，具有特殊的国情和社会特征，中国经济改革理应坚持循序渐进的路线，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进。中国经济在改革中成长，中国经济的发展动力也来自于改革。中国当前经历的改革路径明显区别于以往改革的主要模式，体现了大国经济的“自生”思维。

作为超大型发展经济体，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和自成一体的中国道路，不仅给中国自身发展提供动力机制，为中国系统化难题和结构性矛盾寻求解决方案，也可以为诸多发展中国家突破自身体制困境、实现发展目标提供参照系；更可以给处于危机和资本主义衰落过程中的西方国家提供很好的改革借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将是中国经验、中国思想做出世界贡献的机遇期，也是中国融入并改变世界秩序的机遇期。如何有效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发挥中国作用，这也是作为负责任大国，谋求中国利益与全球利益最大交集的具体体现。

二、中国话语权发展现状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应该客观冷静分析认识当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现状。当今世界“西强我弱”

的国际话语权格局，特别是西方在各重要国际问题领域和国际政治价值观上拥有的话语霸权，使得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存在结构性障碍。

（一）中国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严重滞后于中国社会实践

“中国声音”严重滞后于内容丰富的“中国社会实践”，目前我们还未形成与“中国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体系。然而，中国取得的实践成就远远大于理论、思想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思想界主要是学习、借鉴西方，而忽视了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理论总结。国内经济政治等领域的主流话语大都来自西方，中国原创的核心概念不多。学术界一些人存在着一种把中国当成病灶、把西方理论当成药铺的心理，从而把西方学术神圣化、把中国问题简单化，在现实中常常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此外，在国际谈判以及重大国际问题上，我们也缺乏自己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并没有真正形成自己有力量的话语体系，这使得我们在关键问题上显得很被动，甚至吃亏。

在全球化的今天，学术话语权越来越成为一切话语权的核心。学术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知识和文明的结晶，是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阶梯。自古以来，尤其是西方世界兴起以来，学术一直是国家实力强盛的重要指标，其对精英阶层的重大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谁掌握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学术话语权，谁就能控制该时代、该社会的思维框架和价值取向。美国通过对学术话语权的控制，从而掌握了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一个令中国学术界尴尬的事实是，如今中国的学术从学术框架到学术规范，从学术理论到学术话语，几乎都以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标准。为了化解中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的不利局面，中国学术界可以通过打破美国对学术话语权的垄断，来改变美国控制国际话语权的局面。为此，中国学术界必须以中华民族的复兴为己任，养成必要的学术自信、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构建深具中国文化底蕴的学术话语体系。

（二）发声渠道单一，中国话语权质量和水平较低

以提出“软实力”理论而闻名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约瑟夫·奈曾指出，大多数被认为是美国软实力代表的作品都不是由政府的传播机构完成的，而是来源于非政府机构，从好莱坞到哈佛都是如此。当前，中国发声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是党委、政府主导的舆论宣传，缺乏非政府组织、企业、智库、大学科研机构等民间力量的参与互动，也缺乏机制化的对话平台，以及多层次的话语体系。欧美等发达国家智库主导着国际社会事务的话语权，而发展中国家智库在世界舞台上处于一种集体“失语”的状态。

此外，中国国际话语权水平较低，主要体现在国际议题设置方面。国际议题设置既是国际话语权强弱的直观表现，也是国际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途径。冷战后，中国加快了

“与国际接轨”和“融入世界”的步伐，同时，经济全球化问题的涌现让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利害相关，和平发展的诉求也让中国优先关注某些国际问题，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设置具有引导性的国际性议题准备了基本条件。

然而，冷战后以来的主导性国际议题，却少有中国主动设置并引导他国讨论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智库尚少有鲜明的、突出的全球研究视野，很多的全球性战略议题都是国外智库研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后，国内的智库才开始研究，总体而言，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落后于国外。特别是近些年来，各国战略力量的争夺焦点在于规则制定权，包括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能源资源供应、全球贸易规则创新、软实力竞争、价值观外交等在内的战略博弈领域不断拓宽并加快向纵深拓展，这些方面我们的话语权体系质量和水平仍较低。因此，中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为国家决策和重大战略进行长期和提前谋划，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 中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仍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

实践证明，只有掌握更多的国际话语权，才能占领制高点、掌握主动权，进而赢得国内事件和国际事务的参与和决定权。在当今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状况是极不平衡的。整体上看，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着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这似乎反映了作为一种“软实力”的话语权与硬实力的权力分配状况的一致性。中国话语权与中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相比差距较大，中国话语权与西方国家的话语权无论从规模还是从质量上差距都较大。目前，国际舆论的话语主导权依然掌控在美英等少数发达国家手中，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 80%~90%的新闻资讯，几乎都由西方主流通讯社所垄断。从美国这一窗口观之，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数的 5%，却控制了世界 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别国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 30 万小时。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垄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有 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而在美国自己的电视中，外国节目的占有率只有 1.2%。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使用华语者占到世界人口总数的 1/4 左右，但国际上以华语为传播符号的信息量却只占总量的 5%左右，国际话语权处于明显的弱势。

三、美国等发达国家塑造国际话语权的成功经验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且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美国掌控国际话语权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美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全球眼光、独立思想，具有全球舆论领导欲望和领导力的话语权策略家。这些人才分布在智库、大学、媒体、政府、公司等部门。二是各个行业分工明确，各司其位，各有所专，一条龙服务。如政府提供宏

观战略，引导和协调；智库研究；公司提供研究基金；媒体和政府实施国际话语权策略时遥相呼应。三是话语权策略概念尽量做到界定清晰，层次分明，操作起来易于上手，步步为营。四是话语权策略尽量做到概念新颖，朗朗上口，易于传播。五是话语权策略尽量做到针对性强，解决问题实效性强。六是话语权策略尽量做到具有前瞻意识和普世关怀。七是没有产生时效的话语权策略毫不犹豫地放弃，代之以备用的新话语权。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智库在塑造国际话语权中的独特地位。如今，在美国已逐步形成这样的决策流程：每逢重大政策决断，一般先由智库提建议，然后在媒体上讨论，再经过国会听证，最后由政府决定采纳与否。智库市场的蓬勃发展最终形成一种“滚锅效应”，即大量的建议与思想从数量众多的智库中迸发出来，它们彼此影响并进一步创造出更多的想法，这几乎成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左膀右臂。

2014年1月，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的《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2013年全球共有智库6826个，其中美国智库总量为1828个，超过排名第二的中国（426个）4倍之多。从综合影响力角度看，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6个，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第20位，为中国区最好名次，而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10中的6席。当前，美国各大智库已将目光和脚步放至全球，不仅注重国际问题的研究，而且将其分支扩张到全球。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不仅在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建立了研究分支机构，还雇佣当地本土研究人员，强化对当地的本土化研究。兰德则设置了中文官网，将与中国和东亚相关的研究报告翻译成中文发布在网络上，试图影响中国的公众和决策者。这些举措都无形中使得美国智库掌握了强大的舆论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成为美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美国之外，西方发达国家也纷纷把塑造国际话语权作为重要的实践。国际话语权既包含设置国际议程的能力、组织操作的能力，也包括对舆论的掌控和对价值理念的贡献等方面的能力。西方国家一些著名智库为了确立自身对全球国际问题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大都采取开放政策，坚持国际化经营、国际化研究、国际化交流的理念。如美国的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每年接受国际方面的个别委托研究与咨询约2000余件，与世界65个国家800多家公司保持联系；法国的欧罗普基咨询公司平均每年要和580个企业签订咨询服务合同，其中60%是国外企业；巴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2/3的业务是对外的，每年大约签订包括30个国家在内的300多个合同。国际智库经常利用举办各种国际性的讨论会、讲演会、研讨会来加强与外国学者间的交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相互交换情报和观点，选派研究人员到国外留学进修、客座研究、考察学习，聘请国外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课题研究或作为顾问。如美国兰德公司每月组织150名调研咨询人员参观访问外界的、民间的军事科研机构，同时也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约400名同行和政治家的访问。

四、将增强中国话语权上升为国家战略

中国仍然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必须制定一个总体性的国际话语权战略。一方面，要不断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把提升国家实力特别是软实力放在优先位置，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为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要综合运用并发挥多种机制平台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全面提升中国话语权。

（一）寻求中国与全球利益交集，构建中国话语权体系

把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转化为对外交往的具体政策主张，以争取更多的国际理解与认同。在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舞台上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的斗争不仅没有减弱，而且日益突出。世界格局多极化并非只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力量提升，更意味着新兴大国的发展路径多样化。没有发展路径的多样化，也不可能出现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其发展道路和模式越来越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青睐。在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中，应善用中国因素，特别是要善用中国理念，努力将其转化为中国国际形象创新的着眼点和重要工具。在诸如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生态保护、网络安全等国际经济、政治、外交以及安全等公共领域，明确提出解决全球共同困境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普惠共赢”。要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宣传和谐世界理念，不断推进构建和谐世界进程中，鲜明地提出反映时代前进方向的新的世界观和国际治理理念，并将其凝聚为有感召力的时代话语，用以提升中国软实力，重塑中国话语权。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话语体系，让非政府组织多发声

借用国际平台，发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声音，真实展现、介绍中国的情况。根据2011年民政部发布的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共有国际及其涉外组织类的社会组织582个，占2011年度462万个社会组织总数的0.13%。根据中国基金会网显示，截止到2012年8月，中国拥有国际及其涉外组织类基金会51个，占2744个基金会总数的1.9%。从规模和数量上，显得比较小，影响不大，但个别环保、人权等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很多发展程度较高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把走向国际化作为组织发展的目标之一。以北京市为例，根据2010年开展的调查统计显示，北京非政府组织中有经常性国际交往的占25%，每年1~5次的占45%，偶尔开展的占12%，基本没有的占18%，这表明NGO的国际交流已成为新趋势。

以环境保护领域为例，2005 年以来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一直在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工作。2010 年 12 月坎昆会议上，中国非政府组织更显成熟，联合美国非政府组织共同起草了《中美公民社会组织长期合作协议》，来自两国的 30 家非政府组织签署了这份协议，向参与气候谈判的各位代表展示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推动低碳发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尝试，发出了中国非政府组织自己的声音，在应对国际环保压力的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搭建非政府组织国际交流的平台，鼓励其与国际组织的合作，提高其国际交往能力就成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国际化道路中的必要选择。在舆论传播上要加强媒体的国际传播，形成政府、民间、媒体“三方联动”的国际传播机制，形成强大的话语权合力。

（三）建立机制化交流平台，扩大峰会外交国际影响力

在全球化加速发展、全球性挑战日益紧迫的背景下，峰会外交不仅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被推到了台前。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各类全球性、地区性、双边论坛，通过参与国际经济组织和论坛，发出中国声音，力图在国际经济制度设计中发挥重要作用，增强峰会外交的全球影响力。比如，G20、APEC、上海合作组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金砖五国峰会、东盟 10+3、区域经济伙伴关系（RECP）等机制，以及博鳌亚洲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用好这些机制平台，扩大国家利益在全球利益框架内的权重，以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参与国际规则的调整设置。应加深对区域性国际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以前瞻的眼光推进制度化合作，建立全方位、立体化的对话和外交轨道，推动中国自身的公民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走出去”，成为中外公民社会交往的建设性桥梁和有力智力支撑。

（四）发挥智库等独特作用，推进思想和重大理论创新

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占据对中国话语权的优势，是因为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各智库和大学的重点研究领域。比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威尔逊中心、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特中心、保尔森基金会等主流智库都相继建立专门的中国研究中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美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就是美国的国际话语权。

要认真研究和借鉴美国智库的运作方式，依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建设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智库。中国智库要加大国际交流合作力度，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来”，大力开展各种长期或短期的国际课题合作，创建国际访问学者资助平台，举办各类国际公共政策讲座和论坛，加大对公共政策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度等。特别是要加强国际热点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大胆创新中国话语体系，增强在国际领域中的主流理论和学术话语权，增强国家软实力、巧实力。

（五）推动跨国交流合作，促进中外学界融合互动

鉴于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可建立一个中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西方学界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科研项目。几百年来，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资助学术研究的基金会种类繁多，几乎全是以民间和私人出资的方式成立的。相比之下，至今还没有看到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基金会。近年来，日本和南韩都在美国建立了相应的基金会，面向美国的大学及各学术研究机构，提供科研经费，支持美国学界在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特别是有关日本和韩国的研究，如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Japan Foundation）和韩国基金会（Korea Foundation）等。这些基金会是由政府建立并支持的，但以独立法人的形式来运作，淡化了政府干预的形象。

总而言之，建立中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也必须尊重西方学界的运作规则，以民间资金为主，淡化政府行政干预色彩，以中立而无政治色彩的独立法人的形式，引领国际上重大的研究议题，并促进中西学界的交流。资金来源可从外国人申请入境的签证费中提取，或由民间企业及个人捐款，由政府部门和学界选派代表共同成立托管董事会来管理，透明运作；同时在北美、欧洲和亚洲等地区设立办事机构，使其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推手和沟通平台。

（六）打造社会化、多元化传播渠道，讲好中国故事

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角度看，要扩大中国影响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经验就是走市场化道路，必须“去行政化”，发展社会化、多元化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平台，实施“传播中国”的战略。所谓“传播中国”，就是从“宣传中国”到“说明中国”，要善于利用西方大国国家的话语体系和市场体系，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的影响力。事实上，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都在这么做了，而且比较成功。“传播中国”需要我们对新闻传播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和创新，要引入市场竞争，发展战略市场。

半岛电视台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半岛电视台如今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也是全球收视率最高的新闻电视台。它以阿拉伯语作24小时不间断播出，被称为“中东的CNN”。它目前在全球范围已拥有6500多万观众，阿拉伯世界的观众达4500万。面积只有1.1万平方公里、人口仅为62万的中东小国卡塔尔，也因为“半岛电视台”而成了外交大国。从2001年底开始，半岛电视台通过默多克控股的天空广播公司向英国和欧洲地区播出，并坚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全面、独立的报道原则，坚持在任何事件中都要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可以与西方主流媒体叫板。因此，中国应该借鉴半岛电视台及其他西方媒体的市场化、国际化运作经验，并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

责任编辑：刘英奎

· 宏观经济 ·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白仲尧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其根本特点是以人为核心、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缩小差别、生态友好，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建设新型城镇化应当抓住经济服务化、文化大众化、环境生态化、城乡一体化等主要问题。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经济服务化 文化大众化 生态环境 城乡一体化

作者简介：白仲尧，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新型城镇化是与旧型城镇化相对立的。旧型城镇化，一是资本主义的城镇化，二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资本主义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是剥夺农民，制造失业大军。我国的城镇化是社会主义城镇化。但由于我们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靠农业积累实现工业化，物资供应短缺，从而限制“农转非”，这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城镇化的一大障碍。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为进一步城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我们推进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镇化，其根本特点是以人为核心，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缩小差别，生态友好，促进经济

社会全面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①

我国城镇居民已超过人口总数的 53%，表明城镇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阶段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应当抓住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服务化、文化大众化、环境生态化、城乡一体化。

一、经济服务化

当今世界正处于服务经济时代。经济服务化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如美、英、德、法等，国民经济均已实现经济服务化，即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服务业产值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60%。在国内，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国民经济也实现了经济服务化。我国服务业产值虽已达到 GDP 的 44.6%，但仍需大力发展服务业，争取尽快实现经济服务化。在这种形势下，新型城镇化必然要求经济服务化。

产业是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工业、服务业都要发展。我国在以工业化为主的城镇化过程中，曾强调工业“一马当先”，造成商业、服务业严重滞后，以致发生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这样的经验教训是应记取的。在服务经济时代，服务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我国无论新型工业化还是新型城镇化，都要求服务业超前发展。

首先，服务业是城镇经济——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基础产业。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产业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工农业和服务业，就没有新型城镇化。然而，产业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快捷的信息传递，便利的资金融通，活跃的商业物流，发达的交通运输，浓郁的文化氛围，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些条件的状况如何，决定着城镇的经济发展，从而决定着城镇化的进程。创造这些条件的就是服务业。服务业的服务产品用于生产即为生产服务，成为生产资料；用于消费则为居民生活服务，即为生活资料。生产服务的科学技术水平及其对各行各业生产服务需求的满足程度越高，对工农业以及服务业的带动能力越强，社会经济的质量也越高。生产服务对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强化，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巨大动力。因此，服务业越是发展，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越高，城镇经济越发展，城镇化的进程就越快。

其次，服务业是城镇居民的生活基础产业。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要让原住民

^①《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11 月版第 20～21 页。

和新迁入的人口（大量是农民工）有良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他们的饮食起居、子女入学、文娱生活、医疗保健……方方面面都需服务业来提供。居民生活得便利和舒适，居民生活放心、宽心、舒心，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及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源泉。

服务业的根本特点是围绕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需要提供服务。在服务过程中，服务业既有适应社会需要的一面，又有引导社会消费的一面。又相适应，又需引导，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标志。互联网服务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和引导消费的生动事例。城镇服务经济发展过程中，着重推进工业服务体系、农业服务体系、居民生活服务体系的建设和，才能提高城镇经济质量，加快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当然，不同的城镇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差异和自然环境差异。这就要求服务体系必须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把握当地特质，积极推进现代服务业建设。

二、文化大众化

文化大众化是指城镇文化服务需面向广大群众。文化是人的本质。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文化、运用文化、享受文化。“以人为本”，不仅是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更要提高人的素质。所以，新型城镇建设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亦即城镇的灵魂。“千城一面”的根本教训就是忽略、甚至舍弃自身的文化传统。有多少文物古迹在推土机的碾轧下灰飞烟灭！所以，新型城镇建设千万不要忘记自身文化的根，不要成为没有灵魂、没有生命的死城、鬼城。城镇的特色，说到底，就是文化特色。只有对文化特征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建成特色鲜明的新型城镇。

任何城镇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既有历史传承的文化传统，又有现代的文化诉求。在历史和现实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本城镇的文化特征。它们是客观的，是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归纳总结。一般地说，城镇所在地域的文化，是城镇文化的根。风土民情、风俗习惯是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发展史。历史是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记录，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写照。可以说，读懂了城镇的历史，也就认识了城镇的文化。城镇发展过程中的祠堂、庙宇、宫殿、院落、牌坊、碑刻等等文化遗存，以及各行各业特别是当地特有的艺术与工艺，都是城镇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各地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曲艺戏剧等等，均有各自的特色。当地不同时期的人物在文化上也会有程度不同的贡献。任何文化都是在交流、融合中发展的，这也是文化特色形成的重要因素。总之，把握城镇的历史文脉，认知城镇的文化特色，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办得到的。

在经济与文化深度融合的今天，任何产业都有其特有的产业文化。一是科学技术基础，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二是产品文化内涵，主要是对产品服务对

象——消费者的人文关怀。三是产业的发展战略，它是建立在对产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这一切都需一定文化作为基础。没有文化，也就没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是维系交换关系的基础性制度；诚信则是信用制度的文化基因。诚信缺失，就是市场文化缺失，甚至会导致市场经济危机的发生。所以，城镇文化建设同时也是产业发展和城镇经济建设，文化引导经济，经济滋润文化。

尊重城镇的文化传统，保护和发扬城镇的文化特色，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尊重当地的人民大众，使新型城镇真正成为当地人民大众的家园。我们知道，人们的故乡情结是很浓重的。人们对故乡的魂牵梦绕，情愫萦回，不仅仅是绿水青山、小桥流水，更多的是对故乡特有文化的眷恋。如果城镇建设中舍弃了固有的文化，无异于脱离人民大众，失去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文化从人人都参与的社会活动分化为大众文化活动与专业文化服务活动之后，便产生了文化服务劳动者。文化服务劳动者的文化活动，就是文化服务，就是生产文化服务产品。由于文化对社会的引导性，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任何社会的统治阶级都要以文化服务的方式引导大众文化活动的方向，以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发展。但社会或国家不能包揽所有的文化服务，只能承担部分服务，其余部分由市场去解决。这样，文化服务又分化为公共文化服务与市场文化服务两部分。

公共文化服务与市场文化服务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公共文化服务（现称文化事业），是由国家或社会提供物质资料，招募专业文化服务劳动者，建立文化服务机构，生产文化服务产品，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共性文化需要。市场文化服务（现称文化产业），是由文化服务劳动者或文化服务劳动者组成的机构（企业），生产文化服务产品，经过市场以商品的形式提供给消费者，以满足他们的个性需要。国家或社会的财力雄厚，可以多办文化事业，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若财力拮据，则可能减少公共文化服务。市场文化服务是以居民购买力为转移。居民购买力高，购买文化服务商品的能力强，文化产业经营兴旺；反之，居民购买力低，文化商品需求弱，文化产业经营也随之惨淡。当然，当公共文化服务供应不足时，市场文化服务可起补充作用；若市场文化服务供应不足，则要求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

新型城镇化必须高度重视公共文化服务，大力发展文化事业。首先，是教育事业。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限于财力，无可非议。如有条件，中、小学均实行义务教育，那就更好了。这是国民素质的基础，也是国家盛衰的基础，应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中之重。其他如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以及终身教育等等，当然是量力而行，竭尽所能。其次，是科学技术研究事业。发展科学技术研究事业虽然是全中国的事，但任何城镇都应有自己的科研机构。它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需要，开展针对性的科学技术

研究, 实效巨大。再次, 建设群众文化活动平台。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是群众学文化、长见识的必备机构, 也是养成文化自觉的重要途径。文化、体育场馆既是群众文化、体育活动的场所, 也是组织和指导群众文化、体育活动沿着正确方向运行的机构。

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是商品, 是为市场服务的, 首先是为本地市场服务。文化商品得到本地群众喜欢, 且经久不衰, 市场繁荣兴旺, 自然培养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文化服务商品才有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牢固基础。某些一门心思想在世界拿奖的产品, 却拿不到奖, 其原因就在于没有群众基础。发展文化产业的另一个问题是, 传承和创新。文化本身就是传承和创新的交替过程中发展的。文化产品既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又要有鲜明的时代感与创新性。只有在历史的、民族的文化基础上的创新, 才有朝气, 才有特色, 才有活力。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建立文化企业。一般地说, 大、中、小文化企业都需要。这要看文化产品的生产规模和市场范围, 不能好大喜空。大企业及通常说的“航空母舰”, 有巨大的发展生产、开拓市场、组织营销能力。但不是每一个城镇都可能、都需要建立自己的“航空母舰”, 一切从实际出发,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新型城镇的文化建设必须立足当地, 在本地做好文化服务, 然后才是走出去, 创造更高的价值。

三、环境生态化

城镇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发展既受生态系统的制约, 又会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城镇本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分支, 同生态系统互相依存、互相制约。考察城镇化问题, 必须也必然要同生态系统相联系, 对生态系统是有益还是有害, 这是城镇化新与旧的分水岭。过去在城镇化过程中片面强调工业化, 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 造成资源枯竭, 污染严重, 可持续发展困难。新型城镇化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重要地位。

习近平同志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 2013 年年会的贺信》中指出, “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建设美丽中国,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 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中国将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这精辟的论述, 既是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 也是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具体要求。我们应当坚决地、认真

地贯彻执行。

生态环境保护，首先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须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以爱护生态环境为荣，以危害生态环境为耻。今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的表现。有了法，就要宣传法，让广大群众知法守法。有了法，就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否则也会变成一纸空文。鉴于渎职、腐败行为存在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对执法部门的监督与检查也十分必要。积极引导与严格监管相结合，法律与法令才能认真贯彻执行。

城镇化中的任何产业都要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依托。土地、森林、河流、矿藏，以至风雨雷电，都是必要条件。每一项产业同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友好还是交恶？这是必须回答的根本问题。我国生态系统脆弱，生态承载力低。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必须发展环境友好的、有利于提高生态承载力的产业。这一要求，对工农业和服务业都一样。以往，工业污染是大户。现在要求他们先治理、后生产，否则，以违法论处。农业中化肥、农药、薄膜的广泛以至超量使用，养殖业的过度放养，甘草、虫草、川贝、发菜等野生植物的乱挖乱采，同样形成污染与破坏，亟待治理。服务业中也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业，如“大树移栽”就是以一地的生态破坏去装扮另一地的“绿皮”。旅游业的“建设性破坏”（如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旅游开发）与垃圾污染，也到了突破警戒线的程度。一个地区、一个城镇，任何产业都必须把自己视为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一员，不能置之度外。“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总之，新型城镇化应当发展生态产业、环境友好产业，产业与生态环境同发展、共繁荣。

产业是企业的集群。企业的经营理念与产品内涵，同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从企业的经营理念讲，企业是所在地区生态环境中的一员，是自己安身立命之根本。与环境友好，互利互存，践行以义取利之道，企业就会得到自然的庇护、人群的关爱，其前景就不可限量。例如，贵州的茅台酒厂紧紧依靠当地“小气候”所繁衍的特有生物链，从而保持产品的特殊品质。这是国酒茅台品牌的根基，是他人不能抄袭、无法搬走的特有资源。他们爱护环境，保护水源，使企业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我们从这里看到，产品质量不仅取决于科技含量高低、人文关怀轻重，而且还取决于生态含量的状况——增强正含量，摈斥负含量。企业高度重视产品的生态正含量，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时时关注保护生态环境、关爱消费者和职工的身心健康，才有真正的绿色产品，才有真正的社会责任担当。

人们的消费方式也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大力提倡绿色消费、低碳消费。人们的消费方式，首先取决于生产。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生态含量高，人们的消费方式自然进入绿色、低碳范畴；反之，其产品是破坏生态的结果，人们的消费行为也成为制造生态灾难的因素，如鱼翅、熊掌、发菜等等。其次是国家或社会的引导。

如发展公共交通、提倡绿色出行，人们的交通消费方式是与环境友好的；如果无节制地发展小汽车，道路扩张、空气污染、噪音充斥也会降低环境质量。再次是人们的生态文化素养和生态文明的状态。文化素养和文明行为是紧密联系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态文化素养，才能形成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

新型城镇化要求建立良好的社会生态关系。人类社会的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也是一种生态关系。在社会中，和谐与抗争是经常存在的。但和谐是社会生态关系的主要方面。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既要求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要求建立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只有这样，新型城镇化的过程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城镇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在高度生态文明基础上的统一，才能达到新型城镇化的新境界。

四、城乡一体化

十八大报告指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①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工农结合、城乡互助，始终是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新型城镇化就是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的途径。

规划一体化。今年3月公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2020年）》。《规划》“按照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明确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规划》强调“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这是非常好的《规划》，具有鲜明的城乡一体化的指导思想。《规划》同时把加快农业现代化放在重要地位，要把弱势农业变成强势农业，成为可同高新技术产业媲美的新型农业。与此相适应，农业生产和经营组织要向企业化方向发展，使农民也成为同工业、服务业从业人员一样的企业职工。城镇周围的农村应视为“城市郊区”。农村是城镇丰富的食品、洁净的水源、清新的空气，以及所有生态承载力的来源。可以说，农村是城镇的“衣食父母”。城镇的文化交流频繁，外来文化强势进入，甚至湮没本地文化特色。而在农村，传统文化保持较好，特色鲜明，光彩照人。它们往往是构成城镇特色的主要部分。所以，新型

^①《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23页。

城镇化不是孤立地造城，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规划》把新城镇和新农村建设放在同等重要地位，形成统一的、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是完全正确和十分必要的。

产业一体化。新型城镇化的一、二、三产业，都应打破城乡界线，努力营造产、供、销一体化的企业组织。这样才能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的牢固基础。例如，以当地的某些农产品为龙头，组成生产、加工、收购和销售一条龙，组建农工商联合企业。或者，以某些工业品为龙头，或以农产品为原料，或以对农业生产服务为主，组成供、产、销的联合企业。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天地，无论是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科学技术服务，还是农副产品收购，都需考虑农业生产全过程的需要，把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贯穿始终。服务业必须充分发挥其中介性质，切切实实把城乡经济、文化和居民生活融为一体，在产业链上下功夫，大力促进农业现代化，就会形成合理的新型城镇产业结构。

公共服务一体化。新型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如交通、信息、教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等等公共服务设施，要一碗水端平，不能厚此薄彼。鉴于农村交通、信息、教育、医疗、文化服务等方面落后于城镇的现实，需要特别重视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在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上，除国家投资不足外，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农村公共服务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低于城镇职工。例如，农村小学教师工作辛苦，待遇微薄，这种状况是需要改变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无论进城的农民，还是仍居村庄的农民以及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职工，都应同城镇职工和居民一样获得平等的待遇和公共服务。

户口管理一体化。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分别对待，是我国城乡差别以及“二元结构”的重要表现。新型城镇化如果不能突破这一框架，“新”就无从说起。户口问题的实质是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划分问题。工业、服务业的从业人员是职工，农业的从业人员就不是职工，是农民。这样的户口政策是新型城镇化的障碍，不利于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与农业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化是分不开的。农业企业的从业人员应同城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一样，都应具有职工身份，享有城镇职工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户口管理一体化势在必行。

总之，城乡一体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表现。只有这样，新型城镇化才能在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中发挥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刘英奎

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阶段

陈炳才

摘要：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争议很大，但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下行阶段，刚性需求正在消失，常住人口的住房已经解决。房地产价格下跌，银行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有利于结构调整。政府应主持公平正义，提升治理能力，完善法治，降低利率。

关键词：房地产 市场价格 下行

作者简介：陈炳才，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研究员。

一、引言

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是普通百姓关注的热点，也是房地产商关心的问题。一些房地产开发商预言，2014 年房地产价格依然上涨，更有甚者炮轰楼市崩盘说，认为要么别有用心，要么弱智。^①也有些开发商比较客观地认为，房地产价格太高，存在着泡沫，担心房地产的冬天出现；甚至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是泰坦尼克号，就要撞到冰山了。^①而媒

^①王健林：《房价下降？那只能靠想》，人民网财经频道 2013 年 5 月 28 日；任志强：《楼市没有泡沫 问题就在于需求被遏制》，《北京商报》2014 年 5 月 15 日。

体很多专家认为，房地产将崩盘或泡沫破灭。^② 未来的房价趋势如何？

政府对房地产是什么态度？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市场化的房地产既无放松限制、加大调控、捅破泡沫之说，也无鼓励、托底、保稳之词。而保障房尤其是棚户区改造、房地产税工作等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居者有其屋是政策的目标，分类指导也是针对保障住房来说的，不是商品房。虽然中央政府没有就市场化的房地产出台新政策，也未取消以前的政策，随着房价下跌，各地政府却在采取各种“救市”措施，尤其是放松购买限制。政府对房地产市场到底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政策呢？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阶段

2014年2月以来各地房价和交易量的下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房地产的投资、销售面积和价格等增长速度逐步下行，以及不少城市出现的滞销、降价销售现象，改变了社会尤其是媒体、舆论对房地产市场前景的判断。当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腐败的惩治执行力大大提高，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和房地产税的立法等，也是改变民众对房地产价格预期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房地产价格的社会预期发生了重大转变，坚持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预言可能成为妄言。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部门对很多产能的预测和市场判断几乎都是有误的，钢铁在1.5亿吨、煤炭在13亿吨时就说产能过剩，电视机、洗衣机、电风扇、冰箱、空调等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都被认为产能过剩，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比之那个时代，这些产能都翻了数倍。2010年曾认为光伏太阳能产能过剩，而当年出口增长150%，2012年的光伏产能是2009年底的7倍。一次又一次的政府预言和产能过剩调控流产，增加了企业的自信。一些地方和企业甚至说，只要是宏观说过剩的，我们就是要上。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所以，有人预言，只要政府调控，价格就会上涨。过去10年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确实与政府的控制和要求相反。

但是，也应该看到，政府对市场预测和判断错了，是因为市场本不是政府该预测的。但在价格变化问题上，政府没有做过什么预言。多少年来，很多产品的价格变化反反复

①王石：《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轻》，新浪财经2013年6月6日；陆剑伟：《开发商一线城市频抢地王 地产大佬王石再发泡沫预警》，《深圳商报》2013年9月6日；刘辰瑶：《中国楼市泡沫或将于三五年内消化》，中国新闻网2013年4月6日；潘石屹：《中国的房地产是泰坦尼克号，就要撞到冰山了》，《第一财经日报》2014年5月26日。

②张庭宾：《房地产泡沫势必会破》，《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7月1日；吕谏：《楼市崩盘不是耸人听闻》，新浪博客2013年9月23日；崩盘帝国世平：《110个城市房价即将崩盘》，《钱江晚报》2013年9月22日。

复，常常被打回原形，钢铁工业最典型。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我们对市场的认识、了解和把握很差，更别说驾驭市场了。因此，预言的失利不奇怪。但当市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对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的预言就要当心，狂热的市场预期会导致供给过剩和价格暴跌。

影响当前房地产价格预期变化的因素众多，以下因素值得关注。

（一）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1. 经济速度下行

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 7.4%，比 2013 年下降 0.3%，预计全年在 7.2%~7.4% 之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本世纪以来早期的年增长 10% 以上逐渐下降到 9%。自 2011 年第四季度经济速度下行到 8.5% 以后，年内增长速度再也没有超过 8.5%，速度下行是一个长期态势，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数大，增长一个百分点的含义与过去的差别很大。如果说速度规律在过去的 30 年不起作用，未来 5~10 年则一定发生作用。7% 的速度相对国际和历史的绝对额来说，已经很高，不容易实现。而中高速度下，意味着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在转变，房地产的转变首当其冲。速度下行情况下，房地产的评估价值也将下降，而不是上升。由于过去的房价上涨是所有物价中上涨最高的，影响消费也是最突出的，未来的价格下行中，房价的下降也将最明显。

2. 对外贸易和汇率的变化也影响房地产的发展

2012 年以来，我国贸易出口增长 10% 以上很不容易。从绝对额来说，出口基数已经很大，出口总额已经是世界第一，每年出口增加 1600~1700 亿美元很艰难。而年增加 1600~1700 亿美元，增长大体在 7% 以下，期望出口再现井喷难。

外贸的下降，意味着我国通过国际市场化解产能过剩压力的作用逐渐弱化。过去的 10 多年，出口高增长确实化解了国内产能过剩，但也带来产能扩张，而且带动了全球产能扩张。目前产能过剩已经不是相对过剩了，而是走向了绝对过剩。在这个背景下，房地产建设所需要的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玻璃等价格稳定乃至下降，难以推高房价。贸易增长下降，外贸企业对土地的需求也不会扩张，而这部分企业对土地的需求在过去很大。

2014 年 3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从 1% 扩大到上下 2%，人民币汇率出现了贬值性趋势，4 月底与去年底比较已经贬值 3% 左右，房地产企业海外融资产生成本压力。以前海外企业融资利率 5%~6%，在汇率升值背景下，企业资金成本很低，而今贬值偿还，利率负担加重。

当然，2013 年以来，我国名义投资和消费增长速度与过去比，增长速度也趋向下行，

2014年更为突出。由此也可预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到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可能是一个长期态势。

（二）经济周期进入下行

1. 房地产繁荣周期结束

经济和房地产繁荣都具有周期性、阶段性，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周期基本结束，到了重要转折点。周期规律表明，10年内会发生一次经济或金融危机，30年是社会思潮的转变。就房地产来说，国外周期一般是5~7年，如美国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灭以后，小布什政府以住房和住房信贷等资产证券化推动经济和金融发展，2008年就出现了次债危机。日本1984年—1985年汇率升值，土地价格暴涨，1989年—1990年出现了股市、房地产价格暴跌。欧洲瑞典、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繁荣也没超过7年。我国房地产繁荣从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算起，按照7年周期来计算，已经有了两个周期。按照10年（包括12）周期计算，2013年—2014年也是重要转折年。经济周期实际是集体行为规律的时间传递过程反映，从诸多现象看，目前已经进入周期尾期。

2. 我国宏观经济周期处于转折阶段

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的调整也将影响住房价格。过去我国经济基本逢3的年份开始加速增长，逢8年的年份下跌。但2008年这个周期，不仅没有下跌，反而加快增长，带来了许多后遗症。2013年我国经济速度开始下行，而不是加速上行，这是大周期的调整。未来的速度难以超过8%，经济增长将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和就业增加，城镇化的发展同样注重质量、生态和文化、历史，不会再搞大拆大建，也不会急于求成。这决定了原先开发商主导的城镇化模式已经结束，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大布局、生态文明、历史和文化底蕴，以后的城镇化不再是千篇一律、无特色的城镇化。国际经验表明，房价持续上涨不是规律，没有只涨不跌的。我国的投机品市场这种经验教训很多。政策调控达不到预期效果，当市场规律发生作用的时候，政策同样无奈。2014年将是房地产价格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

（三）房地产需求进入下行

1. 刚性需求的供给不足已经不存在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我国住房刚性需求很大。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样。据报道，长沙2014年3月底有24万套库存，若加上4个县城，库存量更大；杭州2013年新增供应量首次突破了1000万平方米，而2009年后的杭州一年最多就能消化700多万平方米。天津有七座新城缺乏人气，其住房的出清周期（目前可售套数/往前推6个月的平均销售套数）在20个月。

2013 年—2009 年我国每年分别销售商品住宅 115723、98468、97030、93051、85294 亿平方米，合计 489566 亿平方米，按照 100 平方米一套计算，有 4896 万套住房；按照每套可以入住 3 人计算，可以解决 14687 万人口进入城市，而同期增加的城镇人口不到 10000 万。同期，住宅新开工面积比当年销售面积多 154940 亿平方米，即 1549 万套住房。这意味着最近 5 年新开工面积合计可以解决 19334 万人口的居住，比实际城镇化的人口多出 9334 万。

表 1 2009 年—2013 年住宅施工和销售面积（单位：万平方米）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新开工面积	92463	129468	146035	130695	145845
销售面积	85294	93051	97030	98468	115723
差额	7169	36417	49005	32227	30122

2. 人口城镇化率不是房地产增长的数据

2013 年末，我国大陆总人口为 136072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 73111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 53.73%。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为 28900 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 24500 万人。据此计算，我国城镇化人口只有 35.72%（城镇常住人口—流动人口）。

应该清楚，常住人口是指在城市居住 6 个月以上的人口。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差别在于养老、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待遇的差别，而不是住房的差别。以北京为例，很多人在北京上班，或家在北京，人到河北上班，或者睡在河北，或者家属随军进入北京等，他们都没有户籍，但住房已经解决。绝大部分常住人口要么租房，要么拥有自己的住房，只是没有本地城市户籍。

1997 年—2013 年我国住宅新开工面积合计 1134601 万平方米，按照改善型住房标准 100 平方米一套计算，合计住房 11346 万套，可解决 34038 万人口住房，而 2013 年我国城镇人口比 1996 年增加 35807 万，未解决住房的只有 1769 万，如果把保障房、自住房、集资房等算上，1997 年—2013 年人口增加需要的住房完全解决了。如果不是按照 100 平方米计算，而是按照 85 平方米计算，可以有 13348 万套住房，解决 40045 万人口居住，超过同期人口城镇化的总量。因此，总体来说，城镇化人口的居住供求总量解决了。但就改善和投资来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就是当前的状况；也正因为如此，住房主要体现为结构性矛盾，不是供求总量矛盾。

今后每年只需要销售 800 万套住房，即 8000 万平方米（比 2013 年下降 30%）就足够了，而且可以解决 2400 万人口入城，而实际每年入城不到 2200 万人口。城镇化率指

标如何用，事关决策的正误。

（四）影响房地产的地方政府行为和利率发生了变化

1. 地方政府融资行为受到约束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2013年底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城镇化提出了新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地方政府债务控制作为今年工作的一个重点。中央也不再以GDP论英雄，而是更多注重环境、债务指标的考核和责任追究。这些制度和政策调整，将改变地方的政绩观和经济行为。大肆举债不顾未来的做法将面临审计责任和终身的责任追究，这一切将改变地方政府的行为。

2. 利率市场化可能增加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负担

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存款利率上浮将推高房地产的信托资金筹集成本，目前房地产企业10%~15%年利率成本不可持续，一般持续2~3年将面临资金链条崩溃危险，持续的时间越长，风险越大；2014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供求的变化，各地各大银行快速上调房贷利率以及停止房贷的消息再次使房地产市场神经绷紧，不少银行已经取消了8.5折的贷款利率优惠，这都将影响住房购买。随着银行表内业务的市场化，全部定期存款资金都趋向理财和投资，利率放开之时就是利率下降之时，房地产企业前期高利率融资面临沉重的利率负担和债务偿还压力。今年以来，一些地方信托产品的兑付危机也引起了市场的警惕。从国际环境来说，美国、英国等正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可能导致美元、英镑提高利率，吸引部分资金离开我国，也会加大房地产企业的美元融资成本。

国际上，房地产的价格危机都是持续高利率或者利率持续走高所导致，我国高利率持续了比较长时间，而且超过了物价上涨幅度，房地产的风险已经累积到了顶点。

三、如何看待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一）高房价不具有可持续性

1. 高房价会把实体经济逼向绝路

房地产价格被炒高的经济，是没有前途的经济。房价地价高，道路成本高，物流成本高，电子商务模式和产能过剩背景下，企业价低利薄，承受不起高成本。房地产集中社会资金，抬高利率，会把实体经济逼向绝路。

2. 高房价将使中心城市失去引力和优势

房地产本身不具多少技术含量，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和实体经济竞争

的时代，其地位很不稳定。高房价的连锁效应抑制房价继续高涨。一是企业生产成本提高。随着土地、住房成本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将大大提高，未来的物价上涨，为了弥补住房成本，将出现物价循环轮番上涨，带动生活成本提高。这反过来抬高企业生产、科研成本，很多企业将不堪租金成本和工资成本上升，放弃在大城市设置企业，转而到郊区或地价低廉的地方创业。很多微利行业以及因互联网销售导致利润下降的企业，因高房价、地价将丧失产业发展、就业和利润等优势，这些企业也将远离大城市。二是出口成本提高。房价带动物价上涨，人民币汇率贬值将导致出口成本提高。环境和污染治理成本的提高，将增加企业成本，尤其是出口企业的成本，影响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三是城市和农村生活成本提高，工资成本上升。农村城市化虽然给农民带来了住宅的改善，但也带来生活成本提高，蔬菜价格上涨已经很明显，其他产品价格更是如此，未来农民的其他购买力难以大幅度提高，这将制约城市经济的市场需求。四是进城的农业人口及其子女也买不起价格高昂的住房，大学生就业回到农村现象已经很突出，城镇化速度将因此相对稳定乃至下降，对城镇住宅供求也会产生很大影响。事实上，过去的 10 多年，大量住宅被用于投机和投资，很多企业感到大城市的各种成本太高，难以可持续发展。

（二）房价下跌有利而无害

1. 泡沫破灭不会带来经济崩溃

房价下跌是回归理性。2007 年初我国就提出让房价回归理性。2008 年我国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正要压缩产能、调整经济结构，但同年 9 月的美国金融危机打乱了我国的部署，政策逆转，房价也由下跌突然转变为大幅度上涨。2013 年绝大多数地方的房价是 2008 年底的 2~3 倍。因此，房价下跌不会带来经济的崩溃，不过是房价回归理性。认为房价大跌、经济崩溃的观念，实乃恐吓政府去救楼市。

房价下跌有利于启动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房价下跌了，生活成本就会降低，企业负担降低，社会利润均衡，人们有更多的收入去消费，消费拉动增长才能实现。过高的房价，使得一家三代的全部积蓄用于购买住房，从而大大抑制了其他消费，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家政、旅游等消费。而价格下跌，中低收入家庭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和改善生活质量。这会真正鼓励企业产品创新，鼓励企业在消费品和服务业创新，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因此，那种认为房价下跌会带来经济崩溃的说法不符合实际。

2. 房价下跌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房地产利润再多，企业再强大，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水平也不会因此强大、提高。而房价下跌，有利于抑制炒作房地产，企业愿意把资金增加研发与投入，有

利于我国转型，真正提高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2013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支出才11209亿元，与房地产资金比较太可怜了，但研发投入产生的效果却是房地产无法比拟的。

住房价格下跌带来产业结构调整，这正是社会的期望。以钢铁工业为例，因为住房的过度发展，小钢铁很红火，而大钢企产品结构调整后没有了市场。城市的大拆大建，也给未来发展带来很多安全、质量隐患和系统缺陷。房价下跌，将抑制和杜绝地方政府过度炒作土地价格行为，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使城镇化建设更多地注重以人为本，注重生态、文化和历史、民族、地域特色，也有利于我国企业真心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二氧化碳的排放，减轻目前严重的城市雾霾。只有住房价格大幅度下降，价格回归理性，才能降低生活成本，降低企业房地产和资金成本，让其他产业有高利润，才能鼓励资金向其他行业投资，为转型升级提供资金和利润支持。否则，房地产的过度发展，将阻碍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因此，房地产价格下降是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抉择要求。

房地产市场下行有利于全社会资金重新配置。房地产再强大也不能让我国经济强大，只有楼价大跌，我国经济才能真正转型。过去5年多的房地产价格上涨，全社会资金集中到房地产行业，使得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缓慢，使产能过剩从相对走向绝对。2008年以来，社会资金持续向房地产集中，2013年房地产企业集中的资金达到153504亿元，占全部信贷718961亿元的比重达到21.35%，比2008年的15.38%高出6个百分点。一个行业集中全社会如此高比例的资金，实属罕见。如此资金结构，也导致社会其他实体经济资金短缺，经济结构调整缺乏资金支持。房价地价下跌，企业才会改变投资方向，资金配置结构才能进行调整，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才有资金来源和投资动力。

（三）我国商业银行对房价下跌的承受能力很强

房地产价格下跌的金融风险，是社会比较关注的。说到底还是银行的承受力问题。^①就银行来说，早在2011年银监会就认为银行能够承受房价下跌50%。^②

1. 住房信贷没有资金链条，下跌风险可控

我国没有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住房价格下跌，只影响贷款回收，没有其它资产价格下跌损失。银行实行住房抵押贷款时，只给予住房价格的50%进行抵押，最高不超过70%，即使有违规的，也不普遍。2011年以来房价上涨达到了50%~80%，甚至一倍多，下跌50%对银行没有压力。

^①李迅雷：《房地产泡沫必破灭 同时引爆金融危机》，中财网2013年10月23日。

^②马文婷：《刘明康称银行可承受房价跌五成》，《京华时报》2011年7月30日。

2. 从经验看，市场至少可以承受房价下跌 50%

一些看法认为，我国经济承受不了 50% 的价格下跌。经验表明，超过 50% 的情况都有，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多大伤害。房价跌到 2007 年的价格，天也不会塌下来，利益集团受损是真的。我国的股价（上海证券综合指数）下跌吓怕了多少人，最高跌幅达 68%，之后长期在 2000 点左右徘徊，国民经济照样发展。住房价格下跌的时候，土地价格也将下跌，各种成本都跟随变化，哪里有固定的盈亏临界点呢！上涨能够承受，下降何以不能承受？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和大幅度下跌企业都经历了、适应了。住房价格下跌，是社会收入重新分配，更有利于中低收入阶层，其购买力大大提高，将会促进其他消费。

3. 从住房购买结构看，社会可承受房价下跌

分情况看，已经购买了住房的消费者，房价无论涨跌，其住房的价值就是住。100 万的住房上涨到 1000 万，也不能卖掉住马路，下跌到 50 万也不会没住处。房地产价格涨跌与自用购房者的居住权无关，也不影响使用价值。自用购买是住房消费购买的主体，其比重高，总体上房价大幅度下跌，不影响社会安定。所以，住房价格下跌，社会有承受力。

房价大幅度下跌，预期的价格上涨没有实现，用租赁来偿还月供的投资人压力就大了，囤积商更害怕。因此，住房价格下跌有压力的是投机客和囤积商，这是少部分人，但他们的承受力超越普通民众，只是盈利少了。

4. 从信贷看，银行可承受房价下跌，普通购买者不会失去住房

房价下跌 50%，到底谁受损失呢？第一，目前已经出售的房屋，开发商不受损失，但对开发商新房源或未出售完的住房利润有影响。第二，已经购买的消费者住房账面价值损失了，但他们已经支出首付，以后按期交纳月供可以获得住房所有权，不会丧失住房所有权。偿还贷款有压力的是投资人或投机人，不能全部偿还。但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是有出租收入的，一是无出租收入的。有出租收入的，也付出了首付，且可以有月供，即使偿还不够，银行收回抵押住房，损失有限。无出租收入的，也付出了首付，将来月供有压力，银行收回抵押出售，即使按照目前的 1/3 价格出售，银行也无大的亏损。其实，目前住房价格下跌 50% 左右，房价只是回到了 2011 年—2012 年的水平，下跌幅度不大。

四、房地产调控：政府应准确站位

（一）充分认识地方债务风险，加大控制债务力度

对房价下跌最敏感的是消费者，紧跟着的是地方政府，尤其是地市级政府。地方政府为什么对房地产价格下跌如此焦虑和着急？我们看看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情况就清楚了。

1. 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

到 2013 年 6 月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约 18 万亿，其中市和县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 88009 亿，承担担保责任的 10912 万亿，救助责任 24402 亿，合计 123322 亿。地市债务的利率一般在 12% 以上，高的达到 20% 以上。即使按照 12% 计算，就偿还部分来说，年利息就达到 1 万亿，要地方从财政收入偿还，压力很大。如果遇到担保和救助责任的债务出问题，地方政府的负担压力更大。

2. 土地财政是政府偿还来源的主要依靠

2012 年全国地方公共财政收入 6.1 万亿元，支出 10.7 万亿元。2013 年地方财政收入 6.9 万亿元，支出 11.93 万亿元，地方财政支出超过收入 4 万亿~5 万亿；市、县公共财政收入一年估计在 3 万亿~4 万亿左右，支出规模更大。要拿出 1 万亿偿还利息很困难，更不用说支付本金了，地方政府只能指望土地出让收入来偿还债务。

2012 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28517 亿元，2013 年 41250 亿元，这些收入不足以弥补收支差。今年第一季度土地出让收入 1.08 万亿，预计全年 4 万亿左右，也不足以弥补收支差。房地产价格下跌，意味着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偿还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担心是必然的。

3.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债务偿还压力加大

按照 2013 年底地方政府债务 193255 亿元计算，比 2010 年增长 80.32%，年均增长 21.7%。2002 年—2012 年，国家全部财政收入年均增长 20%，其中地方增长 21.8%，2008

表 2 2010 年-2013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单位：亿元）

	2013 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占比 (%)		2010 地方政府债务及其占比 (%)	
	债务总额	占比 (%)	债务总额	占比 (%)
地方债务总额	178909		107175	
偿还债务	88009	80.84	54410	81.08
市	48435	44.49	32460	48.37
县	39574	36.35	21950	32.71
担保债务	10912	40.94	10943	48.75
市	7424	27.85	7668	32.81
县	3488	13.09	3275	15.94
救助责任	24402	56.24	9260	55.46
市	17044	39.28	6504	38.96
县	7358	16.96	2756	16.50

注：占比%是指占同类地方债务的比重。

年—2012 年地方财政增长 21%，与地方债务增长率基本相同，但是 2012 年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只有 16.2%，2013 年 12.9%，2014 年第一季度 11.8%，3 月—4 月增长分别为 9.5% 和 9.8%。很显然，随着经济速度的下行，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在下降。政策应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

4. 部分地方政府面临债务违约风险

随着财政收入下降，未来 1~2 年内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可能面临违约风险，借新债还旧债的利率依然很高。目前，人们期待允许发行地方债来替代政府债务，减轻政府的利息负担压力。应该说，这是化解地方政府债风险的一个有效途径，但这个措施只能解决部分地方债务问题。

互联网金融影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1 万亿人民币不到，就使银行面临流动短缺的困难。地方政府偿还责任债务 10 万亿，哪怕是发行 2 万亿也会带来市场流动性的短缺，抬高银行利率，发行 3 万亿~5 万亿更难。目前，短期利率已经高达 5%~7%，长期利率更高，期望通过债务置换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思路行不通。即使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各地的信用不同，利率成本不同。欧洲国家政府的垃圾债券利率 2012 年达到 12%，我国地、市政府债券利率降低到 10% 以下不容易，除非中央政府担保或承担责任来发行债券，但这带来的道德风险很严重。

（二）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应准确定位

1. 适应市场转变，加强市场管理

过去的 10 多年地方政府是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主导者和推波助澜者，未来数年地方政府将自食其播种的苦果。未来的房价，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环境、供求、制度在变，更重要的是改革将改变政府的行为，转变政府的职能，市场不会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下去了。因此，对于房地产价格下跌，不能因为要缓解财政负担就去救助，那样会酝酿更大的危机和坏账。已经市场化了的房地产，应该由市场调节，而不需要政府救市，但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是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不是没有法律和制度监管的经济，更不是为所欲为的经济，房地产市场同样如此。因此，目前高房价下，限购政策不应调整，而且应该细化，学习新加坡和韩国做法，不是户籍居民或者没有居住证的居民，不得在本地城市买房和租房。

2. 坚持公平正义，完善制度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指出，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房地产市场的制度和机制如何建设，应该按照公平正义来设计。政府是法律和公平正义的主持者，因此，管理者和政策应更多地关注房地产市场的交易、行为、价格决

定机制是否符合公平、正义、秩序和规范，是否符合法律和法规，而不是过多地关心市场价格和市场交易行为本身，更不是只关心政府的利益而忽略民众和社会利益，只看短期利益，不考虑长远风险。

目前，地方政府关心房价是因为房价也关系到地方政府的债务和财政利益，因此，其行为必然是异化的。也正因为如此，期望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上保持公平正义不那么容易实现，这更多需要中央政府出台法律、法规和详细的可操作政策，否则，对企业适用的“法无禁止皆可为”，对政府适用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就会成为空话，房地产市场的乱局将延缓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3. 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以城市规划和房地产立法引导市场发展

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房地产的调控同样要实行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不仅要管好市场，也要对权力运行本身进行监督和管理，而且要体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改革的目标也在于建立法治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管理同样需要法律和法规。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法律法规严重不足，管理过于粗放，缺乏可操作性，随意性太大。可学习新加坡的经验，对城镇规划立法，对城市功能区如生活区、生态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坚持 50~100 年不变，防止一任市长一任规划。同时，要明确禁止开发区占比不超过 50%，按照城镇等级，明确设置城镇的规模，超过规模在生产力配置上要布局到周边或者卫星城市；城镇内里的楼房之间要保持足够的空间，便利未来 50~100 年后的拆迁，要在新地上先建立楼房，再搬迁，避免拆迁矛盾。城市要做好生活小区设计，让各种服务业有栖身之地。楼层不应太高；楼层越高，间隔应越大。对车位、社区活动和老年活动场所、青少年活动场所和公园、教育、医疗、养老等都需要有配套设施，最低也要空出地方。生活小区内，蔬菜、日用品和餐饮、一般消费品等，在直径 500~700 平方米的范围内应购买到，不需要进行长途购买。楼层高度及就业人员要与生活区的人口安排规模相适应，减少工作地点和住宿点的来回奔波。法律制订细致了，城市的矛盾和城市病就少了。

（三）多种措施并举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1.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不能寄望于政策宽松

目前，部分地方出现的土地出让价格超过住房销售价格的现象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规模有限，只会加速房地产市场的资金链条断裂。寄望于限购政策的松动带来房地产价格高涨也不可能。目前，无论是从收入和房价比，还是库存与销售比，乃至从住宅供求总量来说，地、市的住房基本过剩或价格过高，在省会城市也出现了同（下转第 86 页）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因素分析与 政策建议*

盛朝迅

摘要：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是由工业化发展阶段、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市场需求、创新生态等五个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应适应我国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时期产业升级的要求，加大创新要素投入，促进创新成果涌现，重视市场需求培育，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水平。

关键词：创新驱动 产业升级 因素分析 政策建议

作者简介：盛朝迅，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也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期。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阶段的调整，更多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动力机制、产业结构等内涵和质量的升级。需要在经济、社会、体制、科技等方面都做好“闯关”的思想和准

* 国家发改委重大课题“重大技术经济政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大型零售商主导产业链的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12CJY068)和中央基本业务费课题“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国际经验与思路研究”课题成果。

备。对此，本文结合我们对创新驱动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解，提出推动我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

产业发展驱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分析，我们认为，创新驱动主要由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

一是工业化发展阶段。波特（Porter，1980s）最早提出创新驱动概念，并把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其中，产业升级的驱动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始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延续，并在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后期正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因此，创新驱动是工业化由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变的必然要求。

二是创新要素投入情况。要素禀赋理论最早由赫克歇尔和俄林（Heckscher & Ohlin，1919，1933）提出，在他们看来，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如今，要素禀赋的内容得到大大拓展，如 Mark Knell（2007）将要素禀赋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技术要素，主要体现在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等指标；二是能力要素，反映在教育水平、有效的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治理的有效性等方面；三是成本要素，主要反映在劳动力价格上；四是需求要素，主要反映在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大量的研发投入、创新基础设施、平台等创新要素投入是形成创新驱动的基础。

三是创新成果。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是衡量创新驱动与否的重要标志。虽然熊彼特（Schumpeter，1912）提出包括产品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开辟新的市场、新的供应来源、组织创新等方面的改进都属于创新，但从现实来看，专利申请授权数、发表论文数等科技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仍是衡量创新最直接的指标。

四是市场需求。自施穆克勒（Schmookler，1972）的“需求引致创新”理论提出以来，市场需求因素在创新驱动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莫威里和罗森堡（Moverly and Rosenberg，1979）进一步提出“技术创新与需求互动”等理论，学者们大都认为科技只有与市场结合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产业的发展。主要发达国家也把鼓励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包括示范应用、军事采购、政府采购、支持出口等在内的市场支持措施作为促进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五是创新生态。以苹果的成功为标志，创新的范式开始新一轮进化升级，即由封闭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向共生性创新升级，市场竞争逐渐步入到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这就要求政府更加重视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环境。发达国家也积极迈向新一轮创新政策，构建更有利于创新成果涌现的创新生态系统，如美国 2005 年全面启

动“科技政策学”的研究，明确为新的创新政策提供方法工具支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创新驱动是由工业化发展阶段、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市场需求和创新生态等五个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虽然这些因素不能涵盖影响创新驱动的全部因素，但却是最重要的因素，可以称之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五个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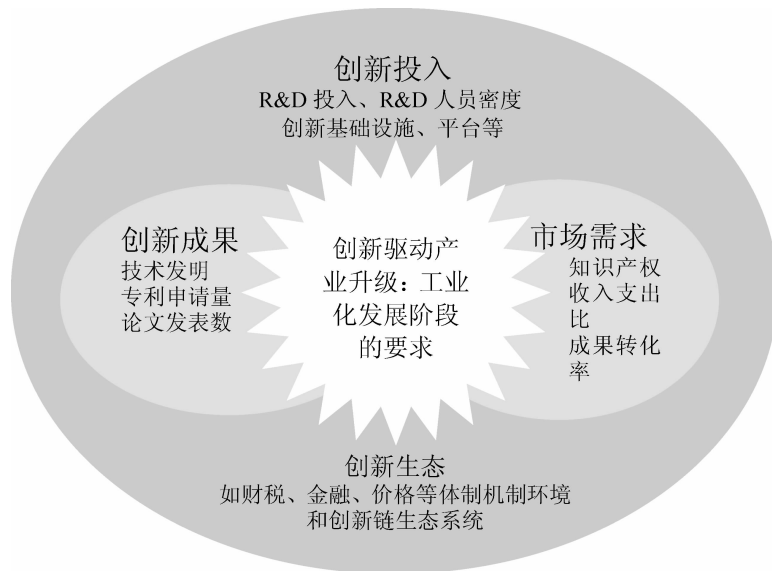


图 1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二、从影响因素看我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现状与阶段特征

(一) 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的关键期，产业发展驱动力逐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已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国家的工业化历程看，创新驱动与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产业升级的驱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始于工业化中期（人均 GDP 6000~7000 美元），向工业化后期（人均 GDP 10000 美元左右）延续，并在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后期（人均 GDP 超过 17000 美元）正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当前，我国人均 GDP 已经突破 6800 美元，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的关键期。随着人均 GDP 上升，制造业比重在达到一个峰值后将会下降，工业化率、投资率和经济增速也在达到峰值后回落，创新驱动因素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产业结构、产业主体、技术能力等都将呈现重大变化。

(二) 从创新要素看，我国创新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但研发投入与先行国家仍有一定差距，研发人员比重低于发达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水平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投入，科技和创新基础设施规模持续增长，覆盖领域不断拓

表 1 典型工业化国家工业化率的峰值水平

国别		工业化率		
		峰值水平(%)	年份	当时人均 GDP(国际元)
领先国家	美国	39	1952	10414
	英国	48	1957	8003
早期追赶国	德国	53	1960	7693
	法国	48	1960	7449
后期追赶国	日本	46	1970	9662
	韩国	43	1991	9404
均值		46		8771
我国		48	2011	7371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数据库。人均 GDP 采用基于购买力平价口径核算的人均 GDP，单位为 1990 年 G-K 国际元。

展，技术水平明显提升，为重大科技领域攻关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特别是超级计算机、信息、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从 R&D 投入强度看，2013 年我国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为 11906 亿元，占当年 GDP 的比重达到 2.09%，高于新兴经济体，但无论从总量看还是占比看，与先行国家仍有一定差距。2011 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的 29.6%，欧洲占 24.6%，二者合计超过 50%，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从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看，我国目前 R&D 占 GDP 比重与美国 20 世纪 80 年代水平大致相当，与目前日韩等国的 3%、美国的 2.7%、以色列的 4%等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从研发人员密度看，我国研发人员比重约为 1300 人 / 百万人，低于多数发达国家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水平，仅为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研发人员比重的 1/4~1/3。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巨大。

表 2 目前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研发人员比重比较

国家	研发人员比重(人 / 百万人)	我国 / 其他国家
中国	1300	—
美国	4000~5000	约 1/4~1/3
德国	3700	约 1/3
日本	5000	约 1/4
韩国	4000~5000	约 1/4~1/3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WDI) 数据库，经整理。

（三）从创新成果看，我国科技产出总量国际领先，专利申请数跃居全球第一，论文发表数量全球第二，已进入领先国家行列，但成果质量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

1960年以来，大多数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保持在相对稳定水平。只有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分别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开始，保持了专利申请量的高速增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2011年开始我国国内专利申请数跃居全球第一。2013年，我国PCT专利申请量21516件，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国际专利申请量与发达国家差距也明显缩小，总体已进入专利总量领先国家行列。中兴公司曾两度成为申请全球专利最多的企业，2013年仅次于日本索尼公司位居全球第二，华为公司位居全球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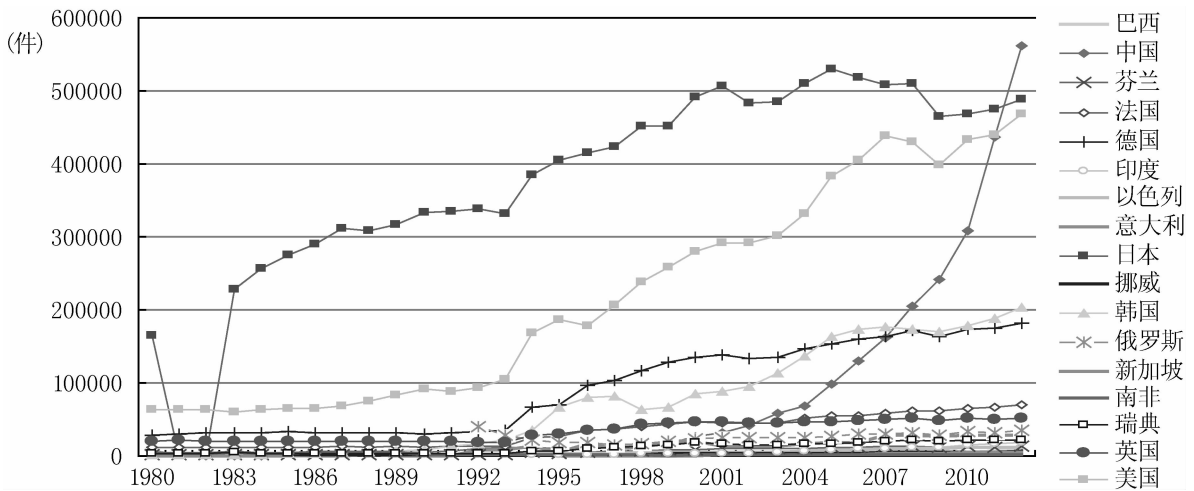


图2 主要国家专利申请量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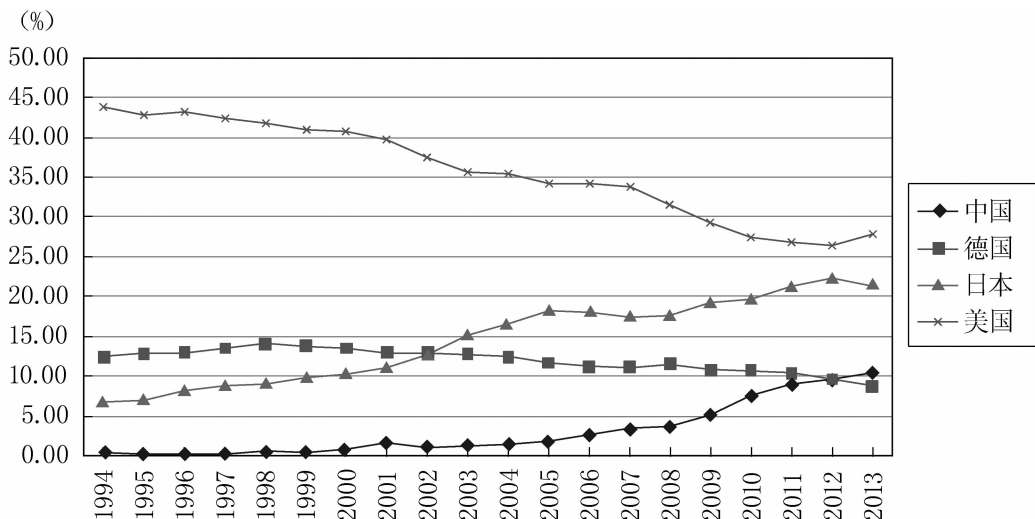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的全球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

从反映科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数量看，我国论文发表数量自 2000 年以来迅速增长，2008 年达到 7.4 万篇，跃居第二位，远高于其他国家。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科学论文数量上的差距已明显缩小。目前，在材料科学、化学两个领域，我国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而在另外 20 个领域，美国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仍然具有优势，但差距已明显缩小。其中，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我国论文数量增长相对较慢，仍难以取得重大理论突破。此外，从考察论文质量的论文被引用指标看，2011 年我国仅排在全球第七位，与论文数量的排位还有较大差距。

表 3 美国和我国在 22 个学科领域所发表的论文数之比

	2003- 2007	2004- 2008	2005- 2009	2006- 2010	2007- 2011	2008- 2012	2009- 2013
材料科学	0.83	0.76	0.70	0.66	0.62	0.58	0.54
地质	3.99	3.44	3.10	2.77	2.52	2.26	2.03
动植物学	6.04	5.22	4.51	3.94	3.49	3.05	2.73
分子生物与遗传学	12.61	9.97	8.01	6.49	5.36	4.24	3.56
工程	2.73	2.34	1.98	1.70	1.49	1.28	1.14
化学	1.29	1.13	1.03	0.95	0.88	0.82	0.77
环境 / 生态学	5.47	4.77	4.06	3.53	3.04	2.72	2.40
计算机科学	2.83	2.55	2.34	2.27	2.13	1.81	1.58
交叉学科	2.37	2.30	2.21	2.04	1.65	1.76	2.06
经济学和商学	16.83	14.43	12.57	10.75	9.61	8.17	7.31
精神病学 / 心理学	42.10	38.01	33.76	28.93	25.15	21.89	19.59
空间科学	9.19	7.97	7.05	6.20	5.58	5.09	4.81
临床医学	14.54	12.29	10.19	8.48	7.03	5.73	4.84
免疫学	16.71	12.88	10.34	8.31	7.16	6.14	5.43
农学	5.92	4.41	3.60	2.80	2.29	1.93	1.66
社会科学	32.57	28.31	24.31	20.26	17.36	15.00	13.27
神经科学与行为	17.72	13.86	11.39	9.34	7.84	6.66	5.97
生物学与生物化学	7.07	5.96	5.03	4.33	3.80	3.26	2.89
数学	2.43	2.15	1.93	1.71	1.57	1.46	1.32
微生物学	8.98	7.18	5.68	4.65	3.83	3.14	2.78
物理学	1.90	1.65	1.46	1.33	1.23	1.16	1.10
药理学和毒理学	4.70	4.00	3.44	2.99	2.65	2.31	2.06
合计	4.19	3.66	3.24	2.92	2.64	2.38	2.16

资料来源：根据 ESI 数据库计算。

主要的不足是发明专利占全部专利比重偏低，有效专利数量偏少，在事关未来研发走向的先进材料、集成电路、生物科技、节能环保等关键领域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质量不高。

表 4 我国与全球 PCT 专利申请最多的领域比较（2012 年）

我国			世界		
排序	技术领域	占比(%)	排序	技术领域	占比(%)
1	电动机械, 仪器, 能源	7.53	1	数字通信	31.38
2	数字通信	7.09	2	计算机技术	8.04
3	计算机技术	6.99	3	电动机械, 仪器, 能源	6.85
4	医疗技术	6.38	4	电信	6.83
5	制药	4.40	5	视听技术	3.87
6	运输	4.16	6	半导体技术	3.64
7	测量科学与技术	4.10	7	制药	2.68
8	半导体技术	3.87	8	医疗技术	2.55
9	视听技术	3.58	9	光学	2.43
10	有机精细化学	3.15	10	测量科学与技术	2.21
11	发动机, 泵, 涡轮机	3.13	11	土木工程	2.16
12	土木工程	2.99	12	家具, 游戏	2.00
13	生物技术	2.99	13	有机精细化学	1.94
14	光学	2.87	14	运输	1.76
15	电信	2.81	15	生物技术	1.73
16	基础材料化学	2.80	16	发动机, 泵, 涡轮机	1.72
17	机械元件	2.69	17	机械元件	1.57
18	其他专用机械	2.62	18	化工	1.51
19	化工	2.38	19	机床	1.42
20	处理技术	2.26	20	材料, 冶金	1.37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经整理。

（四）从市场需求和成果转化来看，我国知识产权收入支出比和成果转化率偏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有市场需求的创新成果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促进产业的发展。但市场需求本身并不像创新投入和产出那样易于定量测度，据此，我们用知识产权收入支出比和成果转化率来近似反映创新驱动的市场需求状况。从知识产权收入支出比看，虽然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收入大幅增长，但由于与知识产权支出的增幅基本相当，导致许可收入支出比基本没有变化，目前仍小于1，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知识产权收入支出比一度高达10，目前为3左右，日本、英国和德国也大致在2~3之间。从科技成果转化情况来看，尽管不同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差异较大，我国大致在10%~25%之间，但与发达国家45%~80%的转化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围绕激励企业创新来完善金融、税收、价格、财政、知识产权管理等政策，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

（五）从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环境看，当前我国相关体制机制和环境对创新驱动的束缚和约束还比较多

美国创新史表明，大众创新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沃土。美国创新的主角是由无数怀有远大抱负的大众化的创新推进者组成，他们包括卡车司机、肖像画家、修鞋匠、海员、磨坊主、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小职员等，这才是主导美国卓越背后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国目前缺乏激励大众创新和草根创新的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以及包容失败、平等宽容的社会氛围。主要体现在：应试型教育方式和僵化的教育体制很难培养出适应大众创新需要的人才；科技资源配置过度行政化，过于分散，企业拥有的创新资源有限，难以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科技与经济结合度低，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研发成果转化利用率低；科技成果评价和保护制度不健全，科技研发中急功近利现象比较普遍；部分地方重视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不重视创新和实业，带来创新活力与竞争力下降等。为此，必须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创新的根基。

三、当前我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创新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考察相关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根据前文的创新驱动五大因素分析，我们尝试构建一个较为全面分析我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模型，并应用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主要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根据前文的分析框架，我们构建一个较为全面分析我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模型，主要包括工业化发展阶段、创新要素投入、创新成果、市场需求、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各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来自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也来自对我国转型背景下特定的技术、产业和经济等多重因素的现实考察。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ln pro = C + \alpha_1 \ln gdpp + \alpha_2 \ln rd + \alpha_3 \ln per + \alpha_4 \ln pat + \alpha_5 \ln mark + \alpha_6 \ln cons + \alpha_7 ref + \varepsilon$$

其中， $\ln pro$ 是被解释变量，用来反映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情况，包括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总体情况，使用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其余为解释变量，包括五

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工业化发展水平，以人均 GDP ($\ln gdp$) 来反映；二是创新要素投入，以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 ($\ln rd$) 和科技活动人员数 ($\ln per$) 来反映；三是创新成果情况，以发明专利授权量 ($\ln pat$) 来反映；四是市场需求和成果转化情况，以技术市场成交额 ($\ln mark$)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ln cons$) 来反映；五是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环境，以虚拟变量体制改革 (ref) 来反映。由于体制改革的效果通常会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在实际变量定义中采取滞后一期的方式体现，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具体研究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如表 5 所示。

表 5 变量选取与定义

变量类别	符号	变量名称	变量单位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i>Pro</i>	全员劳动生产率	元 / 人	工业增加值 / 全部从业人数
解释变量	<i>Gdpp</i>	人均 GDP	元 / 人	国内生产总值 / 人数
	<i>Rd</i>	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	%	R&D 投入 / 国内生产总值
	<i>Per</i>	科技活动人员数	万人, 年	基础研究人员、试验发展人员和应用研究人员全时当量之和
	<i>Pat</i>	发明专利授权量	项	发明专利授权量
	<i>Mark</i>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技术市场成交额
	<i>cons</i>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虚拟变量	<i>ref</i>	体制改革		若当年有重大科技体制改革，则滞后一年取 1, 否则取 0

数据来源：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研究对象为中国 1990 年—2013 年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构造时间序列进行计量分析。

(二) 计量结果与结论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回归结果如下：

$$\ln pro = 3.63 + 1.99 \ln gdp + 0.39 \ln rd + 0.03 \ln per + 0.29 \ln pat - 0.02 \ln mark - 1.24 \ln cons + 0.03 ref$$

$$t = 2.38 \quad 3.23 \quad 1.17 \quad 0.15 \quad 4.05 \quad -1.24 \quad -2.04 \quad 0.59$$

F 统计量为 514.35 (P=0.0000)，表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方程的多元线性关系成立。调整后的值为 0.9936，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很高，模型解释力强。进一步通过模型设定 Ramsey 检验判断模型是否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Ramsey 检验 F 统计量为 3.31 ($p > F = 0.0543$)，接受 H_0 ，即模型没有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模型设定是合理的。通过怀特异方差检验，发现卡方统计量为 24.00 ($p > \chi^2 = 0.0543$)，接受 H_0 ，表明模型回归残差

不存在异方差性，原拟合方程不需要修正。经检验，模型设定合理，不存在异方差性，因而模型拟合比较完善。

从回归结果看，实证分析的结论较好地吻合了理论分析的观点，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进、创新要素投入的增加、创新成果的涌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改善都会提升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而带来产业转型升级的绩效改善，但市场需求增加和成果转化数量的扩大并未能相应提升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从具体数值看，人均 GDP 提升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提升作用效果最大，甚至高于其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素的影响因子之和，表明工业化发展阶段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既为发达国家创新驱动的历程所证明，也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的生动写照，应把握好我国工业化由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的关键机遇，把创新驱动的驱动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和发明专利数的增长对于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比较显著，影响因子分别为 0.39 和 0.29，表明创新要素投入和成果增加两方面因素对于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强有力的研发投入和大量的发明专利等成果不断涌现仍是创新驱动的重要标志。但从反映市场需求和成果转化指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指标来看，模型拟合结果与研究假设正好相反，市场需求的扩张不但没有促进产业升级的效果，反而呈负向相关关系。这一方面是可能限于数据可得性，在指标选取上不如成果转化率等指标理想，也有可能是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的产业升级促进效应主要被国外产品或外资企业所俘获，而对国内产业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需要进一步研究探求。从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环境看，当前我国相关体制机制环境对创新驱动的束缚和约束还比较多。1985 年、1992 年和 2012 年我国分别出台了三个对科技创新有较大意义的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分别为 1985 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科技体制改革和 2012 年《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等，都激发了社会和科技的巨大活力。但由于 1985 年不在本文研究范围时间区段，2012 年科技体制改革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导致变量对于提升产业升级效果的作用还不显著，仅为 0.03，还需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释放巨大的创新潜力。

四、促进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若干政策建议

产业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政府政策的着力点也应发生相应变化，最关键的是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退回来，专心做好“裁判员”“监管者”“制度设计者”和“环境营造者”，加快实现由政府主导下的“倾斜型产业政策”向市场机制主导下的“竞争型产业政策”转变，把精力放到创新驱动因素培育上，而非直接参与

市场主体竞争。

（一）适应工业化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大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期后，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情景和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将发生重大变化，产业升级面临前后夹击的局面。在中高端技术领域，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在低端技术领域，由于低成本优势减弱，又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追赶竞争。这就要求我国产业升级战略和方向必须从追随型向领先型转变，促使产业结构从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的高加工度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整体素质。主要方向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综合运输体系、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

（二）加大创新要素投入，努力提高我国创新要素投入整体水平

创新要素培育包括创新资金的投入和创新人才的培育，其中，人力资源的培育是关键。要通过改革教育方式、加大教育培训等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培育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形成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为我国产业向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支撑。同时，抓紧建立市场导向的创新激励机制，突出创新人才的市场价值，积极推进国企薪酬改革，对创新人才实施现金奖励以及期权、技术入股、股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实现以人为本，最大限度激发创新要素的活力和创造力。在资金投入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继续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投入，努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 R&D 投入格局，加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大科学工程、重大公共技术平台等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展更广泛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应用。

（三）夯实创新基础，促进一大批创新成果涌现

一是促进发明专利、技术、标准、论文等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通过自主创新或引进吸收再创新等多种方式，结合自身或联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技术创新，获取尽可能多的基本专利、技术和标准等创新成果，进而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主导与控制，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形态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渡。二是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将今后一个时期政策支持的重点放在增强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竞争力提升上，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机遇，推动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把支持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支持关键领域和行业创新，以创新驱动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

（四） 培育营销与市场优势，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市场容量不断扩大的优势，鼓励更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一是通过示范应用、军事采购、政府采购等多种措施，加大对处于市场培育期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支持。二是发展风险投资、信息服务、技术交易、人才服务、并购融资等创新服务业，以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发挥产业联盟和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作用，形成创新产业链、协同链和价值链。三是着力培育创新型行业领先企业，要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快速成长，形成重大技术研发、技术集成和推进产业化的优势。

（五） 完善创新的体制机制和生态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但由于部分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导致创新成果缺乏有效保护，“创新速度赶不上剽窃速度”，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执法相对滞后，全社会崇尚创新的气氛有待进一步培育。为此，必须把创新驱动放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加快完善创新的体制机制和环境，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并采取切实措施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改进政府服务创新的方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多方征求企业意见，加强国家科研课题和重点项目与企业的对接。改变目前国家支持创新政策和资源项目分散的状况，以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整合各部门政策资源。加快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顶层设计，协调理顺经济管理部门和科技支撑部门的关系，加快推进科技、产业、教育、人才等多部门多领域协同改革，支持和引导创新资源与要素向最需要创新、也最能激发创新活力的行业和企业集聚，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活力和创新实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参考文献：

1. Jacob Schmookler, *Patents, Inven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Data and Selected Essay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08.
2. Mowery D., Rosenberg N., The Influence of Market Demand upon Innovation: A Crucial Review of Some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Research Policy*, 1979 (8): 102-153.
3.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对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4. 安同良等：《中国制造企业 R&D 行为模式观测与实证》，《经济研究》2006 年第 2 期。
5. 陈佳贵、黄群慧：《工业现代化的标志、衡量指标及对中国工业的初步评价》，《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3 期。
6. 付宏、毛蕴诗、宋来胜：《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 2000 年—2011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中国工业经济》2003 年第 9 期。

7. 国家发改委经济所：《以创新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3 年增 43 期。
8. 柯立平：《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系列谈（之一至之五）》，《科技日报》2012 年 12 月 25 日至 12 月 29 日。
9. 王昌林等：《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研究》，国家发改委 2013 年内部研究报告。
10. 王忠宏：《全球技术创新现状、趋势及对中国的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3 年内部研究报告。
11. 吴丰华、刘瑞明：《产业升级与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 年第 5 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 73 页）

类情况。寄望于政策宽松和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尤其是土地财政的高速增长更不可能。

2. 开征房地产税有利于增加地方税收

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唯一来源就是开征房产持有税。大量的住房投机和垄断购买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涨，它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表现，解决问题的出路也在于加大持有第三套住房以上的税收成本和负担，降低房地产价格，增加产业利润，从而增加产业税收，才能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偿还压力。

3. 化解债务负担的根本出路在于淡化城镇化建设的冲动

要根据城市的财政和偿还能力举债，没有能力和条件的城市，放慢城镇化的脚步，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试图在几十年内完成数百年的任务，那样的城镇化质量很差，城市高楼的使用寿命很短。因此，不应过度增加新债务，更不要举借高利债来搞城镇化，要提高城市建设的质量，着力改善住宅的质量和安安全，做好城镇化的长远设计，要留给后人更大的城镇化发展空间。

4. 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

在成熟的工业化国家，货币政策一直注意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保持国债发行利率相对较低，否则，支付债务负担重，增加税赋，企业困难，就业压力就大。我国目前地方政府举债利率太高，一旦经济下行，税收下降更快，政府债务压力就更大。因此，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央行要引导市场利率和存款贷款利率下行。短期内，由于利率市场化，降低利率不容易，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需要一个时间过程。

责任编辑：刘英奎

应对老龄化社会 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

杨玉英 张天悦

摘要：人口老龄化是 21 世纪亟需面对的重要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老龄产业，特别是养老服务业成为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这就必须从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的实际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高度，坚持运用社会化和产业化机制，全面推动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服务业 养老体系 老年市场

作者简介：杨玉英，国家发改委国防动员研究发展中心研究员；
张天悦，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博士生。

老龄化是当今世界人口结构变化的客观趋势之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老年人口逐步成为世界各国人口构成中的重要群体。近年来，我国的老龄工作得以全面加强，老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始终面临着保障社会民生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

本文所称养老服务业，是指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根据市场需求专门针对老年人提供的服务的统称，但不包括政府和慈善组织举办的公共养老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养老服务业基本特征表现为：从发展动力看，以赢利为目的，根据市场需求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多层次、有偿的市场化服务，相对于公共服务的普遍性、基本性，养老服务业是个性化产品和服务的体现。从人员构成看，包括老年服务的生产者、经营者、组织者、参与者。有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也有个人，凡是为老年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而进行的一切有偿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都是养老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从投入来源看，主要是企业、社会组织 and 个人的投入，是上述主体的自主决策，不是政府和慈善机构的投入，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体现。从政府定位看，国家必须根据老龄化趋势加剧的国情，对产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老年群体的物质文化需求迅速增长，如果完全靠市场调节，将会引发社会问题，因此，需要政府通过财政、税收、投资、金融、土地、人才等各方面政策的扶持。从运行机制看，社会 and 市场需求是牵引，政府政策支持是保障，企业和社会组织及个人的产业化经营是载体。

推动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需要，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目前，养老服务业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养老服务水平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与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总体要求仍然不相适应。因此，必须以人口老龄化为契机，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坚持运用社会化和产业化机制，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全面推动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养老服务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时期，我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带来的问题将更具复杂性、挑战性和长期性，承担社会建设的任务也将更加艰巨。虽然养老服务业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但在老年潜在需求、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形势

1. 人口老龄化为产业发展提出客观要求

未来一定时期，我国老年人口仍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在2011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中，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

分点，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 8.87%。目前，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 3300 万人，占总体老年人口的 19%。据全国老龄委预测，“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 岁以上老年人将由 1.78 亿增加到 2.21 亿，预计到 2050 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 4.3 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 30%。^①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带来深刻影响，尤其在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需求压力也越来越大。目前，我国老年人机构照料和护理服务的发展还相当薄弱，老年人在日常生活、照料、看病、出行、购物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也远远不能得到满足，这使得养老服务业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

2. 老年消费需求为产业发展提供增长动力

人口老龄化在给社会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的同时，也在孕育着一个潜力无穷的消费市场。据全国老龄委预测，到 2020 年，老年人口消费规模将接近 4.3 万亿元，到 2030 年将达到 13 万亿元。老年人口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由 2000 年的 9.67% 上升到 2020 年的 15.43%，以及 2050 年的 28.29%。^②随着个人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规模的不断扩大，养老服务将成为未来最有潜力的消费领域之一。特别是随着新一代老年群体经济实力增强，消费理念更新，消费能力提高，将带动我国养老服务业增长潜力的释放和长足发展。此外，子女对老年人的扶助与赡养的支出，也将极大提高老年人的购买能力。养老服务业涉及看护护理、医疗康复、金融理财、文体娱乐、教育咨询等多个行业，并对上下游产业有明显的带动效应，因此，这个作为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朝阳产业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

3. 养老体系建设为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养老服务业发展离不开老龄事业的有力支撑。近年来，我国的老龄事业取得长足发展，逐步建立了养老、医疗服务等社会保障制度，并形成了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老龄工作体制。但目前，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家庭小型化引发的老年疾病护理、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问题日益显现；老年人渴望共享发展成果、提高生活和生命质量的诉求日益强烈；传统养老功能的弱化和社会福利供给的不足，又与老年人对养老服务市场的消费需求构成突出矛盾。^③党的“十八大”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旨在解决老龄化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真正实现“学有

①《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1 年。

②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6 年。

③肖明智：《开辟老龄产业发展新天地》，《经济日报》2012 年 02 月 10 日。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这要求政府不断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社会养老体系，同时依靠政策扶持与平台支持，实现全社会的有效动员，为养老服务业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

4. 配套政策扶持为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决策，实施了一系列加强老龄工作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十八大、国家“十二五”规划、《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以及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都对老龄产业发展进行了专门部署，提出了要求，民政部、财政部、发改委等部门也出台了许多实施意见和规定。例如，民政部出台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的实施意见》（民发〔2012〕129号），旨在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实现养老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此外，各地政府也先后颁布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规划等多项优惠措施，为民间投资养老服务业创建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老龄人口的增长，养老服务业得到广泛关注。但总体来看，养老服务发展仍旧比较落后，集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瓶颈。

1. 产业政策效力亟待加强

一是我国目前关于养老服务业的政策规定主要为规范性文件或部门规章，尚未上升到法律层面，使产业发展缺乏法律权威性和强制性。二是政策多属于原则性规定，虽然都提出要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业，并给予相应的税费优惠，但以何种方式进入、退出机制如何设计、权益如何保障、行政问责如何体现等方面均没有涉及，导致可操作性不强，进而弱化政策效力。三是政府职能的边界不够明确，特别是政府在养老服务业发展中的定位、政府与社会力量的职能分工以及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等方面缺少硬性约束。四是社会力量的投资主体地位尚未明确，包括参与渠道、参与形式、能否营利以及营利方式等，这些关系到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业的动力和信心。因此，如何完善相关政策规定，提升政策实施效果，这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亟须重点解决的问题。

2. 行业标准体系尚未建立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产业化、市场化运作，需要有统一和完善的行业标准与规范。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业还面临着服务操作无标准，服务质量管理不完善，服务合同不规范等诸多问题，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行业规范和标准，这也成为阻碍社会力量参与产业

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由于缺乏对相关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在法律或产业政策上的保护与监管，致使难以对其所提供的服务质量进行检测和监督，迫使产业发展仍处于无序状态。无权威行业标准、无专业行业分类与知名品牌、无规模化生产基地、无专业交易市场、无成型商业渠道成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薄弱环节，直接或间接制约和阻碍着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①

3. 养老服务供需矛盾突出

据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②显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主要集中在老年设施、护理服务、医疗服务、文化娱乐设施、日常生活用品和生活照料的需求方面。全国约有 17.5% 的老年人希望入住养老机构，并能够在养老服务设施中养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发展，需要养老服务设施的高龄老人占比还有较大上升空间。而我国目前的养老服务设施总床位仅占老年人口的 0.8%，大大低于经济发达国家 5% 的水平。养老机构的床位数与市场需求距离相差甚远，供需矛盾将在未来时期进一步激化。

4. 养老服务地区分布不均

目前，许多城市出现城区养老服务设施匮乏，远郊区发展不足，近、远郊区又高度集中的局面。由于相关民政部门尚未把民办社会养老服务机构的发展纳入到整体规划中，因此，对这些机构及设施的布局、规模、服务结构、法律咨询没有形成有效引导，在服务质量、服务水平等方面也难以评估。这种不合理分布，不仅导致城区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设施难，想入住收费较低、条件好、交通方便的政府办养老设施更难，还使得那些由社会资金主导的郊区养老服务设施数量高度集中。这直接影响着养老服务设施的使用率，进而降低政府和社会投入的有效回报率，养老服务的投入效益得不到实现。

5. 管理机制体制有待创新

各级政府在养老服务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措施、法规、组织机构建设业务指导上明显滞后，对养老服务设施的审批、管理尚未实现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的管理模式。很多公办养老服务机构的体制、经营模式、收费标准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福利事业旧模式，养老服务机构无独立经营权，管理体制与服务性质相矛盾，经营权与经营责任、利益与责任相分离，养老服务设施内部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缺少活力和创新意识。因此，发展养老服务业，迫切需要进行机制和体制的改革，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①台恩普、陶立群：《促进老龄产业发展的机制和政策》，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3 年版。

二、发展养老服务业要做到“四个坚持”

（一）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和生命质量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在于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发展老龄产业目的在于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要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准确把握老年人的群体特征，认真分析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紧密围绕老年人方便化、保健化、舒适化的消费要求，坚持老龄产品制造和老龄服务提供并重，逐步扩大适于老年人衣、食、住、行、医、娱等各方面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规模，不断提升老年人生活水平，努力使老年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

（二）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经营、社会参与

养老服务业是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新兴产业，需要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广泛参与。发展养老服务业，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民间投资为主，多渠道、多领域筹措老龄产业资金，鼓励市场化投资、社会化服务、商业化运作。政府要加强对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规划指导、政策扶持、市场培育、职业准入和监督管理，加强道德宣传，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形成政府宏观管理、企业自主经营、社会广泛参与的产业发展格局。

（三）坚持统筹发展、因地制宜，着力解决关系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

养老服务业综合性强、涉及面广，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要根据老年人的普遍需求，兼顾当前和长远，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产业发展。基于消费多样性和差异化特征，积极开发适合不同老年人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针对服务类型不丰富、行业秩序不规范、养老服务机构供给不足等突出矛盾，强化政策扶持，破解发展瓶颈，推进养老服务业快速健康发展。根据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和优势条件，实现养老服务业在区域上的差异化、个性化发展。

（四）坚持服务模式创新、引导消费，以老年人消费需求带动产业发展

我国养老服务业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供给不足、消费不旺，市场有待开发。发展养老服务业，要坚持创新引领，开发适合老年人消费的多元化产品和服务。创新养老模式，建立健全适应我国国情的综合性养老服务体系。注重产品营销，根据老年人消费习惯制定和实施价格策略、渠道策略和宣传策略。加强消费市场培育，挖掘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的潜在消费市场，以消费需求带动产业发展。强化市场规范，重视提升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有效保障老年人的消费权益。

三、我国养老服务业发展重点领域

为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消费需求提供优质、全面、高效的养老服务，推动养老服务体系的社会化、产业化建设，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老龄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以机构为支撑，着眼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打造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优质、全面、高效的养老服务。

（一）老年医护康体服务

加快老年医疗护理服务体系建设。按照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要求，二级和三级综合医院可以根据需求和技术能力配备老年病科，有条件的地区可配备老年病医院，所有地级市至少应规划建设一家护理院。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扩大老年病医院和提供康复、护理、临终关怀服务的医疗机构规模。落实如床位补贴、用地、无息或低息贷款等相关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服务于老年人的医疗机构建设，扶持社会力量投身老龄产业发展。

健全规范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资源，提高老年病诊疗能力。合理协调老年医疗服务业与老年保险业的相互关系，积极采用“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灵活多变的运营策略，建立和完善社区老年人群医疗救助体系，从设施、管理体系与人力资源等多个方面整合、共享社区医疗机构和日常护理机构资源，专门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人性化、专业化的卫生健康服务和居家护理服务，进一步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满足老年人的全方位医护需求。

实行精细化、专业化的老年医疗护理服务。加强各类研究机构、特色医院、综合医院、中医医院、医疗康体服务机构和专业体检机构对常见老年疾病和老年基本用药的研究与临床应用，保障常见老年疾病基本用药的供应与质量安全。探索建立针对老年病、慢性病、临终关怀患者的长期医疗护理康复服务模式。特别是提高对肿瘤、老年痴呆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常见老年慢性病的服务水平。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作用，提高老年中医医疗护理服务水平。进一步发挥社区和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基础作用，做好以高血压为代表的老年慢性病规范化控制管理，广泛开展老年疾病防治知识宣传，促进老年疾病早发现、早治疗。

（二）老年生活照料服务

建立以社区照顾为基础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借鉴发达国家应对社会老龄化的经验，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社区照顾为主，多层次、多主体、多模式综合的老年照料服务体系。针对老年人的生活作息和行动特点，建立包括个人照料服务、膳食服务、生活起居服务、养生保健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在内的老年看护照料服务体系，方便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加大力度完善社区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和服务站的设施建设。完善和加快社会养老服务设施规划建设，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的服务设施和网点。

加强专业化老年照护机构和设施服务。针对不同自理程度的老年人，积极创建提供养老、老年护理和康复服务的品牌机构和综合养老示范社区，统筹发展机构老年服务，积极拓展居家养老服务领域，实现从基本生活照料向医疗保健、康复护理、辅具配置、精神慰藉、法律服务、紧急救援等方面延伸。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加大财政投入和社会筹资力度，推进供养型、养护型、医护型养老机构建设。积极推进养老机构运营机制改革与完善，探索多元化、社会化的投资建设和管理模式。

（三）老年保险理财服务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险体系。大力完善新型农村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保障城乡老年居民基本生活。加快推进城乡居民社会保险制度一体化建设，研究制定城乡居民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衔接办法。切实加强老年医疗保险工作，建立合理的老年人医疗保险费用筹措机制，加大对社区医疗机构的扶持力度。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积极促进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鼓励商业保险机构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丰富养老保险产品类型，拓展分红功能、最低保障收益、设立投资账户等功能，作为社会养老保险的有益补充。

全面开发老年金融理财服务产品。开展老年消费市场调研，开发一系列满足老年人风险、收益及资金流动等需要的储蓄产品，将金融机构的储蓄产品与家庭财产的损失联系起来，满足老年人应付病险意外的需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开展面向老年人的投资理财产品开发及其指导说明。以“保本、稳健”为产品开发理念，优先发展保本型结构性理财产品，降低老年人的投资风险。鼓励基金管理公司积极开发个税递延养老基金产品，通过专家理财促进养老资金的保值增值。

（四）专业养老地产服务

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复合型老年住区。针对养老地产市场的需求特征，灵活采用适宜的养老住区开发模式，建立适应于我国老龄市场的复合型老年住区。对老年住区开发市场的客户与服务类型进行细分，考虑老年人对护理照料的要求变化，形成复合的老年

居住群体。在养老住区中配套必要的养老设施、专业的护理服务人员，实现居住功能复合。同一住区中提供老少户、老人专用户等不同户型，针对住区内不同的居住人群，提供不同产品形态。在老年人从健康老人向半护理、全护理老人转变过程中，优化住宅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实现居住空间的可变性，满足老年人不同身体状况下的居住需求。完善产权销售、会员制等现有方式，创新其他养老地产盈利模式，降低企业的开发风险。

加强专业化老年颐养机构和设施服务。针对不同自理程度的老年人，积极创建各类老年护理院、康复院、养老院、疗养院、托老所、老年公寓、退休村、老年服务中心等品牌养老机构和综合养老示范社区，统筹发展机构养老服务。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加大财政投入和社会筹资力度，推进养老机构运营机制改革与完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

（五）老年文体娱乐服务

加快老年文化体育设施及项目建设。探索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和壮大符合老年人特点、满足老年人需求的老年文体行业。开辟和增加室外老年活动场所，并适当设置适合老年人的活动器材。充分利用老年人活动场所，开展丰富多彩的老年文体活动。加快涉老出版社、报社等老年人文化及品牌服务机构建设，推广涉及老年人文化产品和老年人主题的音像、报刊、书画和文化演出品牌项目。积极开展创建老年文体活动示范点活动，推动基层老年文体活动的深入开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强身健体需求。充分发挥各级老年体育协会在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中的作用。

构建老年旅游服务体系。积极建立一个结构合理、管理规范、运转良好的老年旅游服务体系。积极培育老年旅游市场，引进各种投资主体，探索老年旅游业的经营发展模式。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和需求，选择适合老年人消费心理的营销渠道，加大专列游、自驾游、季节游、探亲游等老年旅游产品、项目的开发、设计和推广，制定和落实对老年人在门票等方面的旅游优惠政策和措施，创建老年旅游绿色通道。制定完善有关的旅游服务质量标准和实施细则，规范行业服务行为，提高行业服务质量。完善老年旅游服务评价体系建设。

健全老年休闲娱乐服务市场体系。加大对老年休闲娱乐市场的培育，针对老年人消费行为的多元化、个性化特点，开展一系列的棋牌、体育、书画、垂钓、摄影、舞蹈、唱歌、戏曲、古玩收藏等活动，满足老年人的休闲娱乐需求。加快老年休闲娱乐产品的开发与应用，根据老年人生理、心理特征，设计和开发老年智力玩具、电子产品、网络游戏产品及娱乐性书籍、刊物等。鼓励创办多种多样的老年文体娱乐社会组织或机构，提供专业的老年休闲娱乐服务。

（六）老年教育咨询服务

推进老年继续教育服务。重视保障老年人受教育的权利，满足老年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和社会交往的需求，扶持并推动老年继续教育行业迅速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创办一批示范性老年大学、老年职业培训机构，主要依托社区教育体系和开放大学等发展老年教育，重点开展各类知识讲座，鼓励老年人参加学历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活动。充分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开办面向老年人的电视和网络学校，扩大老年教育覆盖面。

加强老年综合咨询服务。积极推动专业化老年综合咨询服务的发展，帮助老年人解决各种疑难问题，获取包括法律、心理、医疗、护理、康复、教育、服务信息等方面的信息咨询。加大针对老年人的咨询服务机构、法律咨询机构、权益保障机构、婚介服务机构、康复门诊、健康咨询机构等咨询机构建设，制定推出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的咨询业务和指导服务。

四、为养老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

营造适老助老社会氛围，是推动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除了明确养老服务业的重点领域，还必须加强“硬”设施和“软”制度建设。

（一）创建无障碍老龄生活环境

出行设施上，应在主要公共场合配有各类电动代步车、电动轮椅、老年专用车辆及设施、升降设备、无障碍电梯及其它助走器材，方便老年人搭乘使用和紧急施救。室外坡道、台阶的设计应保障老年人自由行动的方便安全，并在老年人经常活动的如坡道、走廊两侧设置连续扶手或护栏。民用航空器、客运列车、客运船舶、公共汽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公共交通工具应逐步达到无障碍设施要求。

居住空间设施上，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强化老年居住空间的无障碍设计和使用安全，配置必要的附属功能用房，满足老年人的穿衣、吃饭、如厕、洗澡、室内外活动等日常生活需求。提供舒适、健康、充足的居住空间以及相应家具设施和辅助设备，确保老年人有较高的居住质量。配置方便安全的卫浴设备，并在照明、通风、电气、采暖、安全等方面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居住要求，保障老年人起居生活的安全卫生。推动和扶持老年人家庭无障碍改造，为老年人创造无障碍居住环境。

社区服务设施上，逐步完善社区内的无障碍服务功能，为老年人参与社区生活提供便利。加强报警、医疗急救等紧急呼叫系统建设，方便老年人报警、呼救。划设机动车辆禁行和禁止鸣笛的区域。加快社区医疗保健用房与设施、健身休闲、文化娱乐、教育

咨询等公共活动用房与设施、养老管理用房与设施以及小型超市、餐饮、邮电等商业服务设施的建设，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引导、支持老年宜居住宅的开发，推动老年友好型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建设。

公共场所设施上，对于城镇新建、改建、扩建道路、公共建筑，应当符合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优先推进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改造。加快对特殊教育、康复、社会福利等机构、国家机关、文化、体育、医疗卫生等单位以及交通运输、金融、邮政、商业、旅游等公共服务场所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推进宜居环境建设，为老年人日常生活和参与社会提供安全、便利和舒适的环境。

（二）加快适老氛围与制度建设

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意识，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广泛宣传国家关于养老服务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健康文明的观念对待老龄消费市场的兴起和发展，把握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树立市场信誉和品牌意识，积极培育老年消费市场，努力提高养老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养老体制市场化改革，在规划指导、市场培育、投资带动和示范引导等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扶持和引导企业开发、生产、经营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相关服务。地方政府应当按照老年人口比例及分布情况，将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统筹安排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地及所需物资。鼓励通过整合、置换或转变用途等方式，将闲置的企事业单位的设施资源改造用于养老服务业。

推进全民参与。通过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加快形成全社会重视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舆论氛围，建立健全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力量兴办、企业或机构市场化运作的体制机制，实现养老服务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发挥老龄产业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积极作用，使其成为养老服务业的行为组织者、经营者和政府的推手，成为联系养老服务机构、服务对象的重要环节。鼓励慈善组织和志愿者为老年人服务。完善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和服务方式，促进志愿服务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加强行业监管。规范养老服务业标准和准入机制，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老龄服务长效监管体系。以行业标准为依托，逐步建立以国家标准为主体，其他标准相互配套，重点突出、结构合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养老服务业国家标准体系。完善养老服务业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监管有法可依，规范执法程序，实行查审分离，制衡、约束行政权力。

责任编辑：刘英奎

选好突破口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李 锋

摘要：党中央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战略构想，并对“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行了总体部署。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选好突破口：一是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二是发展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三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四是建立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五是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突破口 混合所有制

作者简介：李 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战略构想，2014 年中央 1 号文件围绕“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行了总体部署。我国空间广袤，经济社会和农业发展的区域差异之大，不同政策措施短期影响和长期作用之不同，进一步增加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复杂性，需要面向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要求，就如何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行大胆的探索。

* 本研究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写作过程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聂振邦副理事长给予了精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一、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意义

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与基础，对建设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

当前，我国农业已进入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需要加快从依靠大量消耗资源的传统方式，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现代方式上来。现有的农业经营方式面临诸多挑战，经营规模小、经营方式粗放、劳动力老龄化、组织化程度低、服务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十分突出。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全国从事农作物种植业的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不足10亩，90%左右的农户养肉牛数量在2头以下、养猪数量在10头以下；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51~60岁占21.3%，60岁以上占11.2%，女性占53.2%。同时，农业和农民对农业科技的依赖性和关联度明显增强，农业科技应用已由某种技术措施的单项实施转变为多项技术组装配套实施。面对现有农业发展方式存在的弊端及农业和农民应用农业科技方式和对农业科技需求的重大变化，需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提高农业科技应用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国际经验表明，现代农业需要相适应的发展方式，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是现代农业对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规模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能够使农业发展方式更好地体现集约化、规模化、组织化、社会化的要求，有利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传统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经营转变，实现家庭分散经营向统一联合经营转变，加快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推动农业更好更快实现现代化。

（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确保粮食生产安全的客观需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放在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充分体现了中央对粮食生产的高度重视。民以食为天，对于我国这样的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意义更为重大。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利于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把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粮食生产的骨干力量，进而实现粮食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确保“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顺利实施，保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同时，粮食增产的潜力在科技，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立全方位、一条龙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有利于搞好技术服务，直接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技术培训与指导，不断提高每亩土地的粮食产量，为确保粮食生产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此外，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有利于节约劳动力，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确保粮食生产安全。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使农业面临“谁来种地”的问题日渐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2012 年底，我国农村有 26261 万劳动力转向了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占当年农村从业人员总数的 48.76%。尽管目前在农业中从业的劳动力还有 2.7 亿多人，但中老年人和妇女占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农业未来的兴衰，特别是粮食生产安全，这也是加快构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原因。

（三）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持续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

目前，农民纯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比重正在明显下降，种植业已成为相当多农户收入增长中的“副业”，因此，“地怎么种”的问题已难以回避。我国人多地少，绝大多数农户承包经营的耕地规模小且高度分散，生产效率不高，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强。为了增加收入，多数农户不得不让主要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或就地从事非农业生产，导致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不断下降。据统计，2012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7917 元，其中来自耕地经营的收入为 2107 元，仅占 26.6%。种地对于多数农户而言，正在变成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经营结构中的“兼业”。因此，必须加快探索如何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提高农业效率的有效形式。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适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形势、增加农民收入的必然选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有利于克服农户分散经营的局限性，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提升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水平，有效解决农户小生产与农业大市场的矛盾，化解农户面临的自然、市场和质量安全三重风险。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还有利于建立农户间、农户与合作社间、农户与龙头企业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引领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因此，现阶段在农业劳动力逐步转移的大背景下，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使农业成为有效率的产业、使农民成为能致富的职业的有效途径。

（四）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重要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焕

发了农村的生机与活力，实现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但是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制度在经历了 30 多年的大发展之后，也带来了农村发展活力不足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户兼业化倾向明显、撂荒现象多发频发。同时，农村集体经济比较薄弱，公益性服务机制不健全，经营性服务组织发育不充分，普遍缺乏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能力，难以满足农民多样化的生产经营服务需求，“一家一户”搞生产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因此，增强农村发展活力，迫切需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大力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家庭经营向集约化、规模化和专业化转变，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适度规模化经营水平；迫切需要克服和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改革红利，形成促进农村发展的新动力。

二、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和让农民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当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

（一）传统农业经营体系的阻力日益凸显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传统农业经营体系面临的问题日趋突出，对于发展现代农业、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特别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制约日益凸显。一是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进城，以“小而全、小而散”为主的农户家庭经营，致使部分农业成为农村的兼业和副业，加剧了农业的粗放经营，导致农业科学技术不能及时有效地普及应用，有些地方撂荒现象也比较严重，弱化了农户推进农业集约化和专业化的动力，增加了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难度。二是农户积极主动作为意识不强、依赖思想重，导致农业难以实现资源利用、科技应用、市场拓展和抵御风险等方面的规模经济，妨碍了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三是当前农户的农产品经营优势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加大了农户家庭经营与现代农业产业链对接的难度，容易将农户推向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边缘地位，有些农户对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认识不一致，对农业经营体系改革的积极性不高。

（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而不种粮食带来的粮食安全隐忧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农地向工商企业流转的速度加快，很多耕地以农业名义流转后转为非农业用地，成为危及粮食安全的隐忧。据农业部初步统计，截至 2012 年底，全国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面积已达 2.7 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合同）总面积的 21.5%，而全国流入工商企业的耕地面积已达 2800 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流转总面积的 10%。

取得耕地流转权的农业经营公司不愿意种植利润率较低的粮食作物，大多种植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

当前，在我国支持工商企业大面积投资经营农业，可能会在短期内取得较为明显的经济效益，但也容易影响本地食物的有效供给，加剧农产品供求矛盾，打压局部地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甚至可能损害国家的粮食安全。这种现象在沿海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反映突出。同时，工商企业大面积投资经营农业还容易加剧农村的权力集中，导致农户进入市场的机会减少、风险增加，形成对小规模农户的盘剥，不仅不利于解决农村地区的贫困和就业问题，还会形成对农村文化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甚至引发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墨西哥支持外资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墨西哥在降低农产品关税、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同时，推动农业市场化改革，鼓励外资和商业资本对农业用地进行投资，不仅导致墨西哥农业生产结构转向以面向出口的经济作物为主，更导致农民只能获得农业产业链条中生产环节的小部分利润，甚至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被迫进入城市贫民窟。

（三）农户家庭经营在发展现代农业中的不可替代性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通过农村改革在我国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我国农户家庭经营“小而全”“小而散”的格局。目前，我国农业仍以家庭经营为主，农户家庭经营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据有关部门统计，2012 年底，我国农村承包集体耕地的农民家庭约 2.3 亿户，其中，有约 4440 万户发生了流转出承包耕地的行为（占承包农户总数的 19.32%）；目前仍在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民家庭约 1.9 亿户，他们经营的耕地面积（包括流转来的耕地），占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总面积的 92.5%。这表明，农民家庭仍是我国农业中最主要的生产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难以避开如何对待“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的问题，以及农户家庭经营能否通过转型提升转化为发展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问题。由于农业劳动监督和计量的先天性困难，以及生产过程的季节性，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生产过程的规模经济往往较为有限。所以，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经营、使用家庭内劳动力，具有较低的组织成本和交易费用。

农业的生产特点决定了农户家庭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经营制度，必须长期坚持，这种经营制度已被发达国家经济实践证明是有效的经营形式。世界银行 2008 年的分析报告提出，许多国家认为小农耕作效率低、落后、反对变革，力图倡导大农场，结果往往并不如意，甚至给农业生产带来毁灭性打击，缺乏可持续性。同时，以家庭作为农

业生产的基本单元，在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传承农村文化、消除农村贫困、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作物多样性等方面，具有特殊作用。因此，尽管“小而全、小而散”的农户家庭经营对于发展现代农业存在局限性，但在粮、油、棉等大宗农产品供给关系密切的领域，发展现代农业不宜大面积利用企业经营替代农户家庭经营。

三、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主要突破口

成功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需要选好突破口，有效破解面临的主要问题，形成农业经营主体协同发展的合力。

（一）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形成农户致富的有效模式

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进城，许多地方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其他专业农户、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经营。随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推进，一些农户愿意转入他人土地扩大农业规模经营；也有更多的企业或社会投资者愿意通过租地经营、雇工农场等方式进行农业规模经营。面对这种经营形式的变化，应积极引导，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户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扶持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通过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使农户年纯收入达到或高于外出务工收入水平，提高农户种粮的积极性，解决种粮难的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12年底，全国经营耕地面积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已达287.5万户；其中，家庭农场87.7万户，经营土地面积1.76亿亩，户均经营耕地200.2亩，年收益18.47万元，明显高于普通承包农户。

在鼓励适度规模经营的过程中，还要通过政策倾斜优先鼓励“以粮为主”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或农民合作社加快发展，为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提供经营主体保障。同时，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加快建立严格的农业准入制度和监管措施，对规划的粮食生产用地，不论是否实现土地流转，也不论流转对象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还是农业龙头企业，都不得改变粮食生产用途，保证粮食种植面积的稳定，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二）发展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至关重要，关系到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成败。应通过深化改革和政策创新，在农业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与农户之间构建利益联结机制，调动广大农户的积极性，为农民更好地分享发展现代农业的增值收益创造条件。

目前，可鼓励发展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城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投资主体共同投资设立混合所有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探索农户以承包地入股混合所有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有效模式，确保农户每年能有稳定的土地租金收益，经营好的话还能有利润分成，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

（三）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打造支撑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人才队伍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时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正从单一农户、手工劳动为主，向主体多元、领域拓宽、广泛采用农业机械和现代科技转变，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而且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让十几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得安全放心，最根本的还得依靠农民，特别是要依靠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只有加快培养一代新型职业农民，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农业问题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粮食安全才能得到有效保障。要积极探索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路径，进一步扩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范围，构建形式多样的职业农民教育机构和培训组织体系，建立专业技术人员与新型职业农民结对帮扶制度，组织农业科技人员开展一对一、面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培育一批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的新型职业农民。

同时，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企业家）则是关键中的关键。在一个价值链和全球化规则日益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里，无论哪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的素质都是决定其活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高素质的领办人能够促进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发育，密切与农户利益联结关系，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新的载体和带动力量。因此，扶持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把培养领办人放在突出位置，积极营造有利于领办人成长的环境，建立健全领办人教育培训体系和帮助扶持体系，加快培养一批有文化、懂市场、善经营、会管理、爱奉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办人。

（四）建立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整体竞争力

在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问题和局限性也会日趋凸显起来。较为突出的共性问题组织规模小、层次低、功能弱、服务能力差，甚至同质性强。随着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竞争国际化的发展，面对横向一体化或纵向一体化程度较高的跨国公司，增强我国农业产业组织的整体竞争力更为紧迫，加快形成分工协作、优势互补、链接高效的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就成为构建新型农业产业体系的

重要突破口。因此，要推动各类农业产业化组织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由单个带动向集群发展转变，由松散型利益关系向紧密型联结关系转变，增强整体竞争力。

要根据“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产业组织模式的各自优点和不足，结合农业不同领域的生产特点及环境条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选择适合的产业组织模式。目前，全国已发展起农民专业合作社68.9万个，入社成员5300多万户；各类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30余万个，带动的农户约1.18亿户。例如，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街头镇后岸村依托景点资源优势，集体成立了“农家乐”协会和寒山旅游公司，采取“统分结合、公司化合作”的运营新机制，采用以“公司+农户+客户”的运作模式，统一宣传营销、统一分配客源、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内部管理，大力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全村成为了集漂流、登山、垂钓、观光、采摘、餐饮、住宿及商务接待于一体的综合性休闲度假村，实现了从“采石矿”向“搞旅游”的绿色经济转型。2012年，全村共接待游客5.5万人次，村集体收入60万元，比2011年增长5倍，人均收入15000元，是2011年的2.5倍。同时，要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注重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联合，逐渐发展成为农民综合合作社，克服专业合作社自身规模小、层次低和功能弱的局限性。要健全农业行业协会、农业产业化联盟、农民专业协会等中介组织，提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五）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造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链

从国际经验来看，面向农业产业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日益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引擎，更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保障。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可以更好地拓展农业发展与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产权市场的对接通道，形成农业组织结构创新、新型经营主体发育、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创新联动的发展机制，促进农产品市场空间的不断拓展和农业要素结构的优化升级，打造完整的农业产业链，更好地抢占现代农业发展的制高点。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借助城乡服务业的有机联系和城市高端服务业密集的优势，更好地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增强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引领作用，通过促进现代服务业在农业产业链的融合发展，支撑农业更好地引进高级或专业性生产要素，为农业产业链不同环节更好地分享价值链升级的成果创造条件。

具体来讲，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造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链，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一要稳定农业公共服务机构，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直接为农民提供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农产品供求信息、公共卫生防疫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免费

服务。二要完善补贴、贴息、保险和政府购买等财政支持体系，鼓励企业、合作组织和社会单位参与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全方位、一条龙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产前的生产资料（种子、化肥、农药、薄膜和农机具等）供应服务，产中的技术培训与指导和机械化作业服务，产后的收储销售、运输和加工服务。三要加强营销服务，积极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建立农产品网上交易平台，促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四要完善金融服务，积极引导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到乡村设点，加快发展村镇银行和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为打造现代农业产业链提供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 1.曹利群：《墨西哥农业利用外资教训惨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9期。
- 2.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中国合作经济》2014年第1期。
- 3.韩长赋：《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应研究把握的三个问题》，《农村工作通讯》2013年第15期。
- 4.黄胜忠、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行机制分析》，《商业研究》2009年第10期。
- 5.姜长云：《关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如何实现中国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的转型升级》，《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期。
- 6.姜长云：《农户家庭经营与发展现代农业》，《江淮论坛》2013年第6期。
- 7.姜长云：《农业产业化组织创新的路径与逻辑》，《改革》2013年第8期。
- 8.李铜山、刘清娟：《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研究评述》，《中州学刊》2013年第3期。
- 9.刘志成：《湖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湖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 10.钱视忠、张彦荣、韩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开辟农民增收新渠道》，《江苏农村经济》2012年第11期。
- 11.桑士达、徐金才、罗进荣：《家庭农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力量》，《政策瞭望》2014年第2期。
- 12.王忠林：《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创新农村经营体制》，《山东经济战略研究》2013年第7期。
- 13.赵海：《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涵义及其构建》，《中国乡村发现》2013年第1期。
- 14.魏国强：《关于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思考》，《种业导刊》2013年第6期。
- 15.尹成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国农民合作社》2014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人民币国际化在澳大利亚发展情况的 考察与思考*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赴澳调研报告

陆 婷

摘要：近两年，人民币国际化在澳大利亚发展态势良好，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的广泛关注。中澳两国政府也在政策框架上积极合作，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以便利人民币在澳大利亚的跨境使用。为了解澳大利亚人民币业务发展状况以及整体政策环境，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一行赴澳与金融主管部门、金融业界相关人士进行了交流与沟通。调研组在考察评估的基础上，对目前澳大利亚人民币相关业务的发展状况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思考，并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澳使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 离岸市场 澳大利亚

作者简介：陆 婷，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长期以来，中国与澳大利亚有着良好而密切的贸易投资关系，促进人民币与澳元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不仅有利于加强两国金融合作，支持中澳之间不断发展的经济金融关系，更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计价和结算职能的发挥，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奠

* 本报告是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赴澳大利亚调研成果之一，也是世经政所课题“基于大宗商品计价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调研组由张宇燕所长领队，成员包括高海红、孙杰、肖立晟、陆婷，报告执笔人为陆婷。

定坚实的基础。

为此，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一行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2 日赴澳大利亚，就人民币在中澳两国的跨境使用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调研。调研组与澳大利亚财政部人员、澳大利亚智库和悉尼大学相关研究人员等分别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加深了对人民币国际化在澳洲进展情况的认识，并据此提出进一步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一、澳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整体态度

了解澳大利亚方面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整体态度，是推动人民币在澳跨境使用的起点。此次调研过程中，调研组既与澳大利亚私人部门进行了交流，也拜访了澳大利亚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感受到二者对人民币国际化态度之间微妙的差异。相比之下，前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更为乐观和热情，并已有部分企业和机构开始着手为拓展人民币相关业务进行准备；后者则相对中立，尽管乐意与中国政府在政策层面积极合作，为人民币在澳国际化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但对人民币是否能在澳洲大范围地得到使用关切度不高。

（一）私人部门

澳大利亚的私人部门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较高的关注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围绕人民币国际化开展的相关研究数量众多，不少民间智库、金融企业和学术机构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进行了分析，显示出他们意图抓住人民币国际地位上升所带来商业契机的心态。在他们看来，中澳两国贸易联系紧密，理应拥有同样密切的金融联系。然而，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尚未发展成熟，资本流动也受到较为严格的管制，目前中澳两国之间的金融联系还相对薄弱。但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以及政府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这一局面将发生改变，未来中国的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开放，并最终成为为全球提供流动性、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力量。澳大利亚如果能够抓住这一机会，在此进程中深化其与中国在金融层面的联系，则对澳大利亚金融服务出口、银行业务发展等方面都有益处。

在诸多澳方私人机构对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的研究中，澳大利亚国际金融与监管中心（CIFR）的研究报告颇具代表性。通过针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展开的情景分析，他们认为，在不出现重大经济、市场或政治阻碍的情况下，中国将在未来 10 年内取得人民币国际化一系列实质性的进展，包括取消绝大部分或全部资本管制、利率汇率市场化、人民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等。其中，又以资本项目开放最为重要，它将是国际资本流动

方向、数量、类型以及其他金融市场活动的关键影响因子。

倘若这一进程顺利实现，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会出现三方面变化：一是人民币逐渐成为主要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这意味着与人民币贸易相关的外汇交易日益频繁，以及人民币避险产品、人民币贸易融资的增加；二是作为资本市场深化的结果，中国的股票与债券市场规模将跻身于世界前列；三是进出中国的国际资本规模将会有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其增长主要来源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中国金融地位的提升将使它变成国际资产管理机构进行资产配置时的一个重要基准指标；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中国私人 and 官方资产都需要分散化投资以降低风险，这两方面原因将导致中国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增长。

考虑到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以及它在基金管理方面的经验，若辅以适当的金融架构（financial architecture），这一情景意味着澳大利亚将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获益良多，尤其是贸易相关的银行业务以及基金管理业务。正是由于抱有这样的愿景，澳大利亚的金融机构始终对人民币国际化进展保持着高度关注与热情，并积极着手筹备人民币相关业务，以期能够在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中抢占先机。

私人部门对人民币国际化高关注度的另一体现，则是澳大利亚的进出口企业对人民币计价结算动向的关切。CIFR 在 2013 年下半年对中澳双边贸易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98%的澳大利亚企业意识到人民币结算这一方式的存在，49%预期交易对方会鼓励使用人民币结算，更有 63%的企业表示，愿意在未来增加对人民币的使用，表明澳大利亚进出口企业对在跨境交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已有较为充分的心理准备。不少大型资源出口公司也对 CIFR 表示，虽然目前大宗商品市场上以美元主导计价的情况还将维持一段时间，他们预期人民币在长期终会成为交易的计价结算货币。

（二）政府部门

澳大利亚政府部门对人民币国际化总体抱积极支持但不过度干涉的态度。澳大利亚财政部人员表示，他们十分乐于见到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并最终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他们看来，多元化的货币体系能够有效约束载体货币发行国的政策行为，有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希望澳大利亚能够成为人民币在大洋洲的离岸中心，认为这将为中澳两国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他们指出，近两年随着中澳贸易投资关系的不断深化，澳大利亚政府已在政策框架上积极与中方合作，出台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以便利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澳的发展。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已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并开始使用人民币作为部分储备货币，澳元与人民币也于去年实现了直接兑换。未来他们将进一步在政策层面为人民币国际化

以及两国的金融合作铺平道路，争取在澳大利亚设立人民币结算中心。

但澳大利亚财政部人员同时也强调，人民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在跨境交易中被广泛接受，最终取决于市场的力量，应当由企业和民众自行决定，政府在这方面无权予以干涉。政府所能做的，仅仅是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创造条件，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的人民币交易结算意识等。他们提出，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可能是市场参与者选择是否使用人民币的重要先决条件，它们能够有效地树立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增强民众持有人民币的意愿。人民币在未来想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中国政府需对这些问题认真布局和规划。

二、人民币在澳跨境使用的现状与问题

（一）人民币在澳跨境使用的政策支持

目前，中澳两国政府为促进两国之间的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人民币和澳元在贸易投资结算中的使用，满足经济主体降低汇兑成本的需要，已形成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框架，包括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对澳元直接交易以及澳大利亚人民币清算平台的搭建等，这些无疑都增强了人民币贸易和投资参与者的信心，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在澳的步伐。然而，根据 CIFR 的调查报告，受到一些微观因素的影响，部分政策并未达到其预期的目标，澳大利亚若想建设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还需在政策层面对这些差距多加关注。

1. 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

2012 年 3 月，澳大利亚与中国官方签署了总额度为 2000 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澳大利亚官方声称，这份协议的签署提升了市场参与者在澳大利亚获得人民币流动性的信心，而这种信心进一步为人民币市场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使货币互换协议更具实际应用价值，目前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正在积极制定使用该协议所需满足的条件细则，以便市场人士在申请时有明确的指引。

从理论上来说，货币互换协议仅适用于市场面临压力的情况，它的功效是在极端情形下为市场注入流动性，以维持市场稳定。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下，货币互换协议并不具备任何实际使用价值，也无法提供隐性担保。尽管如此，中澳两国的货币互换协议仍不失为一个帮助参与人民币交易企业树立信心的重要因素。由于目前人民币尚不可自由兑换，不少企业担忧若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在市场压力情况下可能无法以较低成本获得人民币，这种不确定性阻碍了企业使用人民币的意愿。货币互换协议的存在缓解了这种忧虑，提升了企业对人民币的信心。鉴于市场流动性往往与市场信心相关性较强，货币互换协议的签署在实际意义上成功促进了澳大利亚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活跃。

2. 直接兑换的开展

人民币与澳元的直接兑换起始于 2013 年 4 月，自此澳元成为继美元、日元之后第三种可以与人民币直接兑换的货币。理论上，这一措施应当能够增加澳元 / 人民币的换手率，减少买卖价差，从而提升外汇市场流动性。然而事实上，尽管澳元 / 人民币的即期换手率在直兑开启之后显著增加，从之前的月均 1.14 亿美元增长到之后的月均 27 亿美元左右，但买卖价差并未随之缩小。这主要是由于做市商在向人民银行提供澳元 / 人民币的每日报价时，仍然采用美元 / 人民币汇率作为参考基准。根据 CIFR 与做市商的访谈，直兑后相关业务增量主要形成于银行间市场，多数交易金额较小，且被用来投机或对冲风险。除某些特别具有议价权的企业外，在银行间市场形成的价差基本无法传递给一般企业客户，这就制约了人民币在当地影响的扩大。

但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与澳元直接兑换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一方面，它反映了官方层面中国与澳大利亚开展金融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它也允许了包括澳大利亚银行在内的更多银行参与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中去，这在未来将有助于澳元 / 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化。不仅如此，随着澳元 / 人民币交易量的持续增长，以及企业参与度的提高，外汇市场上的买卖价差终将逐渐得到改善。

3. 人民币清算结算机制的建立

目前，澳大利亚尚没有像中银香港那样的官方指定人民币清算行，但在市场驱动下，中国银行和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于 2014 年 2 月签署了《人民币清算协议》。自此中行将作为一级清算银行在澳大利亚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而人民币也成为第一个利用澳交所清算平台进行清算的外国货币。

CIFR 判断，官方指定人民币清算行的缺席对于澳大利亚人民币结算业务影响并不大。相比非官方途径，官方指定清算行的优势在于它可直接对接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以提供实时清算，而非官方途径只能提供近实时清算（near real time clearing）。依照目前澳大利亚人民币的业务量，该差异对人民币业务并没有显著影响，不值得特别关注。而且，人民银行目前正在积极建设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该系统能够连接境内外直接参与者，处理人民币贸易类、投资类等跨境支付业务。未来一旦 CIPS 投入使用，当地指定清算行基本处于冗余状态，离岸银行可以直接、简便地与国内银行进行清算。

然而，如果考虑到 CIPS 建成时间的不确定性，以及澳大利亚人民币相关交易在下一阶段的增长，官方指定清算行的设立在短期内还是有意义的，中澳两国政府对此应尽早予以规划。

（二）人民币在澳跨境使用的微观现状

1. 人民币计价结算情况

在微观层面，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澳双边贸易中的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它不仅能够助推人民币计价结算功能的发挥，也有助于银行开发和推出相应的人民币产品和服务。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目前澳大利亚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比例仍较低，以 2012 年第二季度为例，澳大利亚出口额中不到 0.3% 是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而进口额中的比例则约为 2%。澳大利亚统计局认为，出口份额中人民币结算比例低的原因，主要在于澳大利亚对中出口以资源性产品为主，而这些产品普遍都以美元定价和结算。

为进一步了解企业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的状况，CIFR 对从事双边贸易的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澳大利亚企业认为，结算过程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他们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困难程度。许多反馈方表示，早期他们还遭遇过支付延迟等情况，但近期人民币结算程序的效率已经有所提高，这与中国政府从 2013 年中开始强调提升跨境结算效率、减少过程中的文书工作有很大关系。

在被问及采用人民币结算的益处时，澳大利亚企业表示，相关收益主要体现在价格方面，他们可以获得更为优惠的定价，并且较为容易和中方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中国企业则认为，最主要的收益在于去除了汇率风险，这反映出在中国对冲汇率风险的成本较高（对冲产品较少，企业风险管理能力不足），因此，希望能将该项风险转嫁给澳大利亚企业。

人民币结算障碍方面，澳大利亚对中贸易企业认为，使用人民币结算最为不利的是对以美元计价合约的偏离，这将增加他们的交易成本；而中国企业则更为担心人民币的升贬值问题（因为交易日和款项交割日之间通常会隔上几天），以及交易对方是否愿意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令人意外的是，中国企业对于人民币结算的意识普遍较低，仅有 69% 的中国受访企业知道有人民币结算这一方式的存在，这其中又以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居多，许多中小企业都不知道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相比之下，澳大利亚企业则有 98% 具有人民币结算的概念，且大型企业与小型企业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

不仅如此，调查还发现，相比澳大利亚企业，中方企业事实上更不愿意接受人民币贸易结算。这可归结为三方面原因：一是中国的银行不愿意放弃高利润的外汇交易，因此，部分大陆银行据传会对用人民币结算的企业加收费用或延迟结算；二是如果出口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企业较难提出证实交易真实性的证明，出口退税较难落实；三是中国出口商有时倾向于用美元结算，因为它更容易兑换成其他货币。这些障碍大多属于操作性的，中国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政策调整予以改善，从而促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

2. 离岸市场流动性与人民币产品情况

在目前中国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流动性主要来源于贸易项下的人民币结算。考虑到中澳双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规模，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的潜在人民币供给并不充足，无法像香港、台湾甚至新加坡那样，动辄拥有千亿级的人民币资产池。而在人民币需求方面，由于人民币计价产品种类的匮乏、在澳上市中国公司较少等原因，其相应需求也十分有限。因此，在整体上，澳大利亚人民币资产池无论是规模还是流动性，都远不能跟既有的其他人民币离岸市场相比。

尽管如此，本地人民币资产池流动性的缺乏，并未为在澳大利亚发展人民币相关交易业务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有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存在，银行间市场交易能够让澳大利亚随时从其他人民币离岸中心进行流动性的调度，从而无需自身拥有大规模的人民币资产池。这种从其他离岸中心调度流动性的做法对于澳大利亚银行来说并不陌生，除人民币外的许多其他外币在澳大利亚都是如此操作的。因此，不少澳大利亚本地银行对人民币业务的态度还是较为热情的，已经在积极开展人民币相关业务，并提供相应的人民币产品。虽然整体规模还不显著，但未来随着人民币跨境使用数量和频率的提升，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其发展前景还是乐观的。

3. 基金管理行业人民币业务情况

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基金管理行业都以平台完善、专业水准高而在区域内享有盛名。因此，在他们看来，有足够的经验和优势抓住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所带来的金融服务业商机。他们认为，未来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中澳两国的双向资本流动将日益频繁：一方面，中国投资人希望能够分散自身持有资金的风险，参与到澳洲能源、农业等成长性较好的投资项目中去，获得增长性收益；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基金管理机构也希望能借助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在中国为自己旗下所管理的资金寻找到较好的投资机会。然而，他们同时也承认，双向资本流动要得到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还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磨合期，以消除两国资本流动的微观壁垒。

目前，澳大利亚基金管理公司获得 QFII 牌照的仅有三家，其对于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态度也较为冷淡。根据 CIFR 的调查，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基金经理认为，他们所熟悉的投资领域主要为大宗商品行业，而中国的大宗商品行业与澳大利亚相关性极高，因此，如果投资于中国相关行业，实际上等于增加了对澳大利亚投资的权重，不利于风险分散；二是由于香港证券市场国际化程度较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优异，对于海外基金管理机构来说，投资中国的最佳途径实际上是投资于香港 H 股市场，而非 A 股市场；三是他们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状况了解程度不够，也缺乏熟悉中国 A 股市场操作的专业人才，因此，不愿意轻易投资于中国市场。CIFR 的调查还显示，相对于 QFII 而言，澳

大利亚的基金管理公司对 RQFII 更感兴趣，因为 QFII 是为鼓励长期战略性投资而设的，其投资范围和短期资金进出都受到较为严格的规定，而 RQFII 的投资范围和投资策略则更加灵活，同时也有助于人民币资金的回流。目前，澳大利亚基金管理公司正密切跟踪中国政府关于 RQFII 制度的相关政策，以寻求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投资机会。

在澳大利亚接收人民币流入资金方面，除中国资本项目开放问题外，最大的障碍在于澳大利亚的税收结构。CIFR 担心，税收问题将会阻碍澳大利亚基金管理行业从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获益，使得澳大利亚向外出口金融服务的相对优势无法得以发挥。但这一部分问题完全取决于澳大利亚政府，中方没有可插手的余地。

三、思考与建议

综上，人民币国际化在澳大利亚起步以来，发展势态良好，引起了市场参与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一致认为，人民币在长期将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因此，希望能借助其国际地位上升的势头，寻找到相应的商机。两国政府在政策方向上的合作与支持，很大程度上为人民币国际化在澳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也赋予了澳洲企业和机构在实际业务中使用人民币的信心，促使他们对人民币国际化前景抱有热切的期待。但是，操作层面所存在的一些技术性障碍妨碍了人民币在澳影响的进一步发挥。许多澳大利亚进出口贸易相关企业虽然认为长期来看人民币会成为双边贸易的计价结算货币，却迟迟没有展开与此相关的风险管理及其他配套性工作的原因也主要在此。与此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金融市场深度不足问题都制约着澳大利亚企业和机构对人民币的信心，尤其为人民币投资货币功能的发挥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此类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需要与中国国内结构性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进程相配合，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下一阶段，中国若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澳大利亚以至在全球的发展，除逐步深化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外，还可考虑从以下三方面推动人民币在中澳跨境使用中职能的发挥。

一是不断完善中澳两国便利人民币和澳元跨境使用的宏观政策框架，增强市场参与者对人民币相关业务的信心，提升私人企业对人民币的接受度。目前，中澳两国政府在加强金融合作问题上形成了共识，近两年所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也初步显现出成效，澳大利亚私人部门使用人民币的意识逐步增强，对其长期发展趋势也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然而，为确保宏观政策能够得以有效落实，中澳两国官方应当对既有政策框架保持关注，定期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审视其落实状况，及时了解实施过程中障碍和问题所在并予以调整。同时，由于中国对外开放进程正日渐提速，政策对于整体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也有必要作出前瞻性考虑，以适应市场的发展情况。

二是理顺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机制，确保人民币结算安排简便高效。开展企业教育，增进国内进出口企业对人民币贸易计价和结算的了解，同时，鼓励发展与人民币计价结算相关的风险管理产品。从调研结果来看，中澳两国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这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如基础设施的完善、企业对人民币结算意识不足以及出口退税等问题，政府都有作为的空间。现阶段，中国政府既然将人民币跨境贸易计价与结算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目标之一，就有必要在微观层面上采取更多的配合措施，加大宣传力度，推动相关避险工具的丰富，为企业提供便利，以鼓励中国进出口企业在贸易中以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

三是推动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健全市场运行机制，完善监管体系，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同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对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披露，提升人民币金融资产的国际需求。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要被全球的投资者所接受，市场效率高、流动性好的国内资本市场是一个重要支撑。目前，国际上的机构投资者不愿参与到内地资本市场中去，除受市场准入、资本项目管制的制约外，也与市场监管与制度环境不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较低等问题相关。如果开放过程中这些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在岸人民币金融资产将始终处于吸引力较低的状态，既不利于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职能的发挥，也无益于双向资本流动的活跃，有损于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的长期竞争力。因此，在国内金融改革推行过程中，应重视国内资本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争取在市场制度上、法律监管上、稽查执法上等多方尽快符合国际通行标准。同时，增强市场透明度，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Regul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RMB Report*, <http://www.cifr.edu.au/>, 2014.
2. 周武英、傅云威：《从中澳货币直兑看人民币国际化》，《经济参考报》2013年4月18日。
3. 李景卫：《货币直兑推动中澳双币国际化》，《人民日报》2013年4月9日。

责任编辑：刘英奎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4 年 6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将逐渐加速

世界银行 6 月 10 日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4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小幅下调，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令人失望，高收入经济体将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报告预测，2014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2.8%，低于世界银行一月预测的 3.2%，但高于 2013 年 2.4% 的增速。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增速将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回升至 3.4% 和 3.5%。

报告还预测，2014 年发达国家经济将增长 1.9%，低于 1 月报告中 2.2% 的预测值，增速将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升至 2.4% 和 2.5%。其中，美国 2014 年的经济增速预计为 2.1%，低于此前预测的 2.8%；欧元区经济增速达 1.1%。世界银行把对发展中国家的预测从 2014 年初的 5.3% 下调至 4.8%，明后两年会逐渐回升至 5.4% 和 5.5%。美国的恶劣天气、乌克兰的危机、中国的再平衡、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政治纷争、结构改革的进展缓慢和产能限制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发展中国家整体连续第三年经济增速低于 5%。综合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将在 2014 年早些时候逐渐加速。

（二）全球经济复苏增强但风险犹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埃斯华·普拉萨德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增强，但风险犹存。

一是全球经济渐出谷底逐步回稳，稳定持久复苏仍需各国实质性结构性改革。英国《金融时报》“全球经济复苏追踪指标”（TIGER）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正逐步恢复增

长势头，新兴经济体近期金融市场动荡导致经济增势回落。

二是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消费者信心指数和商业信心先行回暖，但信贷增长依旧迟缓或抑制经济增长。美国经济继续向好，私营部门就业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失业率下降，商业和消费者信心回升，个人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复苏的主要因素，出口和投资也有所增加。欧元区经济“起死回生”，核心国家温和增长，周边国家大多停止萎缩，但个别国家持续高失业率预示未来经济和社会仍不稳定。日本结构性改革虽步伐有限，但经济增长势头较猛。

三是新兴经济体市场动荡持续数月终趋缓和，但多国经济停滞亟需大刀阔斧改革，推动经济重回增长轨道。印度新一届改革派政府上台将提振市场信心，但新政府必须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解决通胀高企和增长乏力等棘手问题。巴西、南非等其他新兴经济体，外需下降影响国内经济形势、政治不稳阻碍改革进程、低增长高通胀等因素加大了短期宏观调控难度。此外，美联储紧缩政策的影响正逐渐减弱，资金开始回流新兴市场，缓解了当地货币贬值压力。

四是大多经济体有能力从防御性向更可持续性政策方向转型。当前，各国面对的主要挑战是，既要执行刺激经济长期增长的结构改革，又要有利于弥补公共财政不足。许多发达经济体改革重点在财政和劳动力市场领域，新兴经济体需改革范围更广（包括体制改革）。

普拉萨德认为，世界经济虽已回到平稳发展轨道，但仍后劲乏力。值得乐观的是，目前尚无影响世界经济增长走势的重大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并出现了有利于决策者进行艰巨改革解决经济问题的转机。

（三）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提速

瑞银财富管理6月23日公布2014年全球及亚洲投资策略展望报告。报告认为，主要得益于美国、欧洲复苏迹象明显，及结构性改革为亚洲新兴市场带来动力，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提速，不过各国经济将迎来不同步的周期。

报告认为，美国就业市场持续改善，美联储或将在2015年中前后升息。2014年以来，美国就业市场整体保持复苏态势，但美国劳工工资增长缓慢，远慢于企业利润增长。而美国劳动力市场情况会直接影响美联储决定何时收紧货币。欧洲经济2014年将从负增长转向正增长。近年来，欧元区采取一系列措施改善经济，欧洲央行“开闸放水”，政府缩减支出，平衡财政，恢复出口竞争，经常账户实现顺差。与亚洲很多国家一样，日本也在推进结构性改革，如建立经济特区、为企业减税等。瑞银预计，除减税外，日本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可能还会考虑引进外籍劳工等措施。就目前来看，市场认为日本推进改革的过程过于缓慢。关于亚洲新兴市场，报告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也许会

因美联储的升息而受到影响，但结构性改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这种冲击。

（四）全球经济在通缩与增速放缓间寻找平衡

花旗银行 6 月 24 日发布一份研究报告称，发达国家受通缩困扰严重，而新兴市场经济面临增长减速的挑战，各国经济增长仍以政策支持及政府投资为主，自主恢复能力仍旧较弱。花旗银行预计，2014 年全球经济增长 3% 左右，2015 年将加快至 3.5% 左右。总体而言，欧洲和日本央行将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英国 2014 年有加息的可能，美国 2015 年货币政策收紧的可能性相对较大，新兴市场增长放慢带来的通缩压力可能上升。

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向好，量宽政策缩减步步为营。花旗银行认为，到 2014 年底美国失业率或降至 6%，量化宽松政策逐步削减之后，美联储将于 2015 年三季度开始加息，控制通胀低于 2% 的目标。欧元区将加大量化宽松的力度，缓解通缩压力。欧洲央行 6 月份开启了存款负利率时代。花旗银行认为，经济复苏乏力、私营部门信贷增长缓慢以及持续低通胀和强势欧元，将促使欧洲央行进一步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直至 2014 年四季度实现全方位的量化宽松。日本经济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复苏有阻力。对于安倍政府最新提出的削减公司税，花旗银行认为，日本政府似乎只打算降低税率，而实际上税改只有在放松管制、劳动力市场改革等配套措施帮助下，才能提升对日本经济增长的信心，改变国内外公司的投资行为。新兴市场经济主要受三大因素影响：首先，受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影响，新兴市场存在大规模资本流失风险；其次，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将对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高度敏感；最后，新兴市场经济出口表现不尽如人意。

（五）全球经济尚未摆脱危机阴影

国际清算银行（BIS）6 月 29 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复苏中的全球经济仍未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而发达经济体延迟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将给市场带来巨大风险。

BIS 行长卡鲁阿纳指出，7 年之后，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依旧投射在世界经济之上。向好的是，全球经济正在逐渐痊愈。更多发达经济体开始复苏，欧元区最终摆脱了衰退，新兴经济体遭遇到的减速之痛也有所缓解。糟糕的是，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依旧严峻，新的风险正在出现。到目前为止，本轮复苏令人失望，但这并非出人意料。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全球消费者、企业和银行，还在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并竭尽全力应对债务负担，全球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还在增加。

BIS 认为，为了推动世界经济彻底走出本轮金融危机的阴影，各国必须拿出新的政策指南针，各方不仅需要调整自己的现行政策框架，还需要积极进行政策协调。就政策前景而言，BIS 在报告中指出，继续保持宽松政策将面临一系列严峻的挑战：首先，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必须设法继续刺激经济，但宽松政策的效力持续递减；其次，新兴市场国家以及一些规模较小的发达国家，必须应对市场波动和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外

溢效应；再次，一些国家要面对通货膨胀持续走低的难题；最后，如何规划宽松政策的时间并掌握好行动步调，也是难度系数颇大的挑战。

（六）全球经济增长将逐步复苏

评级机构惠誉在6月30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受主要发达经济体复苏的提振，全球经济增长将在今明两年逐步提速，预计2014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7%，2015年达到3.1%。不过惠誉同时指出，全球经济增长还面临一些下行风险，主要包括欧元区的通缩，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导致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全球贸易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油价上涨将损害大多数地区的增长等。

惠誉预计美国经济会在2014年一季度的大幅下降后实现反弹，预计全年增长2.0%，这一预期低于该机构3月预计的2.8%。惠誉指出，美国经济复苏具备广泛基础，在家庭收入、财富净值和就业市场改善的条件下，私人消费增长得到巩固，而企业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和房地产市场复苏提振了投资。此外，美联储货币政策仍具备高度适应性，且来自财政政策方面的拖累显著低于2013年。

惠誉认为，欧元区复苏仍然脆弱，近期主要成员国的经济数据表现参差不齐。预计，2014年欧元区经济增速为1.1%，2015年为1.5%。未来几个季度，德国和西班牙的表现会好于法国和意大利。此外，预计欧元区将面临低通胀周期，2014年通胀率可能仅为0.9%，2015年为1.3%，2016年升至1.5%，显著低于欧洲央行预期。不过由于产出增长以及欧洲央行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持续的通缩将不会出现。

惠誉预计，2014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从2013年的4.7%放缓至4.3%，2015年回升至4.8%。基建瓶颈、投资环境限制以及失衡的增长模式，使一些国家的中期经济增长潜力下降，其他的阻碍还包括融资环境的波动、非石油类大宗商品价格的疲软、全球贸易增长的下滑以及政治变动等。

（七）未来世界经济增速将放缓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7月2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此后的几十年，世界经济将面临增速放缓、全球化更深入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挑战。50年后世界经济增速将显著放缓，增幅从现在的3.6%（2010年—2020年）降至2.4%（2050年—2060年），但世界经济产能将在半个世纪内翻两番。全球化下技术快速发展及人口老龄化加剧，将使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为应对挑战，OECD呼吁各国要加深合作，特别是要在基础研究、环境和竞争政策方面协调一致，避免过度竞争；还要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促进收入再分配和教育投资；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改变当前生产效率低下的现状。

（八）2015年全球经济将加速复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主席拉加德7月6日表示，全球经济将会在2015年加速

复苏。拉加德称，由于全球风险尚存，全球经济 2014 年加速将稍弱于预期。目前，主要不确定性包括：欧元区低通胀威胁、美联储削减量化宽松政策（QE）、公共债务和失业率高企。拉加德表示，主要央行宽松政策对需求的影响有其局限性，因此，各国也应当在债务状况仍可持续的情况下，特别加大对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投资。此前，拉加德曾表示，全球经济格局在经历了 2007 年—2009 年的深刻危机之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旧格局现已一去不复返。她同时强调，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改革在许多领域都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仍有许多改革工作尚亟待完成。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IMF 下调中国 2015 年增长预期至 7%

IMF 6 月 5 日将其对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从 7.3% 下调至 7% 或更低。目前，人们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放缓和信贷累积感到担忧。IMF 表示，中国房地产价格正在下跌，但长期前景仍然良好。前段时间中国房地产有一些过热，未售出住房、未售出楼面以及闲置住房的存量有所上升。这很可能是一个周期性的阶段，市场从过热水平回调。IMF 认为，不断累积的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影子银行部门的债务负担越来越沉重，是中国经济面对的最大风险。

（二）投资疲软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据彭博新闻社网站 6 月 22 日报道，根据设在纽约的《中国褐皮书》国际研究公司发布的季度报告调查结果，仅 50% 的企业表示投资有所增长，这是自 10 个季度前启动这一调查以来，比例最小、降幅最大的一次。报告认为，经济增速放慢对租赁和工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影子借贷机构收取的利率已低于银行利率水平。报道称，报告进一步印证了中国经济增速放慢的趋势，这可能会促使中国为实现 2014 年经济增长 7.5% 的目标而采取刺激举措。

根据彭博社 5 月份调查结果的中值，中国经济 2014 年二季度将同比增长 7.4%，与一季度增幅持平，而 2014 年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是六个季度以来最疲弱的。自 2012 年开始《中国褐皮书》的调查以来，第一次出现与前一个季度相比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有向好迹象的情况。运输、采矿和零售行业放缓，而服务业的疲弱勢头更为明显。调查显示，房地产行业的不同领域存在天壤之别，商业和住宅房地产都受到重创，而建筑业则形势大好。没有几家商业和住宅房地产公司表示收入出现增长，房地产的价格也处于持平或下降状态，而商业建筑则保持着价量均稳步提升的势头。

（三）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相当快速的增长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在 6 月 30 日出版的《人民日

报》刊文中提出，随着中国经济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型，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降低。不过，如果中国政府确定的经济改革得到真正推行，中国经济将能够保持相当快速的增长，在中长期内增长率非常有可能继续保持在7%左右。

尼古拉斯·拉迪在文中说，当前，一些人对中国经济前景发出了一种悲观主义论调，夸大了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却忽视了中国政府改革计划的潜能。文章分析指出，中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较低。首先，中国所有的信贷都来自于国内，意味着中国不会受到外国融资条件变化的影响。其次，中国的金融体系几乎没有贷款或其他资产的证券化。再次，中国国民储蓄率很高使得大规模信贷积累成为可能。最后，中国持有大量外汇储备，受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所致的资本外流冲击较小。文章还特别提到，中国央行长期以来规定了储蓄利率的上限，如果逐步放开存款利率，将导致利率水平显著上升，这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

（四）中国经济正在边刺激边改革

7月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称，作为最新推出的微刺激措施，中国监管机构调整了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试图在进行金融业改革的同时对银行系统注入更多信贷。存贷比是一项宽泛的审慎措施，按规定，中资银行不能将超过75%的存款用于放贷。基本上看，中国这次调整了存款和贷款的定义，使银行获得了更多可用于放贷的资金。按照新规定，某些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由债券提供融资的贷款和外币贷款将不再计入存贷比的分子。另外，一些新类型的存款将计入存贷比分母。上述部分举措推动银行系统朝着改革目标迈进，比如将新信贷从生产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引导至小型民营企业，以及发展目前尚不成熟的债券市场。

美银美林认为，刺激措施的影响不会太大。但调整存贷比计算方法的举措，会与最近央行公布的一些其他举措共同产生作用，例如，央行降低了某些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领域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央行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中国经济需要一些刺激举措，特别是在房地产价格下滑的局面下。但大开信贷闸门，将破坏中国政府再三提及的让中国经济摆脱过度举债和过度投资的目标。用贷款改革来微刺激更容易得到各方的认可。

（五）中国经济不会大幅减速

IMF主席拉加德7月7日称，IMF预期中国经济增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拉加德表示，观察一下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我们就不再有疑虑，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中国经济增速只是稍微下降而已。这一情况已经变得更加可持续。预计2014年中国经济增速在7%和7.5%之间。

责任编辑：李蕊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2012 年—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单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4 年 7 月)				
世界	3.5	3.2	3.4	4.0
发达国家	1.4	1.3	1.8	2.4
美国	2.8	1.9	1.7	3.0
欧元区	-0.7	-0.4	1.1	1.5
日本	1.4	1.5	1.6	1.1
发展中国家	5.1	4.7	4.6	5.2
印度	4.7	5.0	5.4	6.4
俄罗斯	3.4	1.3	0.2	1.0
巴西	1.0	2.5	1.3	2.0
世界银行(WB, 2014 年 6 月)				
世界	2.5	2.4	2.8	3.4
发达国家	1.5	1.3	1.9	2.4
发展中国家	4.8	4.8	4.8	5.4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 2014 年 7 月)				
世界	2.4	2.5	2.6	3.2
美国	2.8	1.9	1.6	3.0
欧元区	-0.7	-0.5	1.1	1.6
日本	1.4	1.5	1.5	1.3
印度	4.8	4.6	5.4	6.2

注:IMF 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

表 2 2012 年—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单位:%				
世界	2.8	3.1	4.0	5.3
发达国家				
出口	2.1	2.3		
进口	1.1	1.4	3.5	4.6
发展中国家				
出口	4.2	4.4		
进口	5.8	5.6	4.7	6.4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 年 7 月。

表 3 2012 年—2015 年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预测值	2015 年 预测值
单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4 年 7 月)				
发达国家	2.0	1.4	1.6	1.7
发展中国家	6.1	5.9	5.4	5.3
英国共识公司(Consensus Forecasts, 2014 年 7 月)				
世界	3.0	2.7	3.1	3.1
美国	2.1	1.5	2.0	2.1
欧元区	2.5	1.4	0.7	1.2
日本	0.0	0.4	2.7	1.8
印度	9.4	9.8	8.0	6.9

注: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

表4 2013年6月—2014年6月消费者价格同比

上涨率(上年=100)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3年		3.3	1.6	5.8
	6月	3.6	1.8	7.6
	7月	3.8	1.9	7.7
	8月	3.6	1.7	7.6
	9月	3.5	1.5	7.8
	10月	3.4	1.2	7.9
	11月	3.6	1.5	8.0
	12月	3.5	1.6	7.7
2014年				
	1月	3.5	1.6	7.6
	2月	3.3	1.4	7.3
	3月	3.5	1.6	7.5
	4月	3.8	2.0	7.5
	5月	3.9	2.1	7.8
	6月	3.8	2.0	7.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5 2013年6月—2014年6月工业生产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3年		2.7	0.0	5.9			
	6月	2.0	-0.8	4.9	50.6	51.4	51.5
	7月	4.0	1.8	6.2	50.8	51.5	51.6
	8月	2.0	-0.7	5.7	51.6	52.3	53.2
	9月	4.1	3.2	5.7	51.8	53.1	52.8
	10月	3.3	2.8	5.1	52.1	52.9	53.3
	11月	3.3	1.8	4.8	53.1	55.2	54.8
	12月	4.7	4.5	5.3	53.0	54.9	54.4
2014年							
	1月	3.3	2.7	4.6	53.0	54.6	54.4
	2月	4.6	4.2	5.1	53.2	54.6	54.6
	3月	4.7	5.0	5.1	52.4	53.5	53.3
	4月	3.2	1.9	4.2	51.9	52.9	52.6
	5月	3.3	1.8	5.2	52.1	53.4	53.1
	6月				52.7	54.1	54.1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

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50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6 2012年—201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年		2.8	2.2	-1.0
	1季度	3.7	2.9	-1.4
	2季度	1.2	1.9	0.3
	3季度	2.8	1.7	3.5
	4季度	0.1	1.7	-6.5
2013年		1.9	2.0	-2.2
	1季度	1.1	2.3	-4.2
	2季度	2.5	1.8	-0.4
	3季度	4.1	2.0	0.4
	4季度	2.6	3.3	-5.2
2014年				
	1季度	-2.9	1.0	-0.8

表7 2012年—201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2年		8.3	3.5	2.2
	1季度	8.6	4.2	0.7
	2季度	4.7	3.8	2.5
	3季度	2.7	0.4	0.5
	4季度	11.6	1.1	-3.1
2013年		4.5	2.7	1.4
	1季度	-1.5	-1.3	0.6
	2季度	6.5	8.0	6.9
	3季度	5.9	3.9	2.4
	4季度	2.8	9.5	1.5
2014年				
	1季度	-1.8	-8.9	1.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6、表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6、表7)。

表8 2012年—201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2年		2.8	2.2	-1.0
	1季度	3.3	2.2	-1.7
	2季度	2.8	2.3	-1.3
	3季度	3.1	2.2	0.2
	4季度	2.0	2.0	-1.1
2013年		1.9	2.0	-2.2
	1季度	1.3	1.9	-1.8
	2季度	1.6	1.9	-2.0
	3季度	2.0	1.9	-2.7
	4季度	2.6	2.3	-2.4
2014年				
	1季度	1.5	2.0	-1.5

表 9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2 年		8.3	3.5	2.2
	1 季度	10.5	4.7	3.0
	2 季度	9.5	4.4	3.4
	3 季度	6.5	2.8	2.4
	4 季度	6.8	2.4	0.1
2013 年		4.5	2.7	1.4
	1 季度	4.3	1.0	0.1
	2 季度	4.7	2.0	1.2
	3 季度	5.5	2.9	1.6
	4 季度	3.4	4.9	2.8
2014 年				
	1 季度	3.3	2.8	3.1

注:季度数据经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0 2013 年 6 月—2014 年 6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3 年			0.5	7.4	219.1
	6 月	1.8	0.1	7.5	20.1
	7 月			7.3	14.9
	8 月			7.2	20.2
	9 月	3.5	0.5	7.2	16.4
	10 月			7.2	23.7
	11 月			7.0	27.4
	12 月	2.3	1.4	6.7	8.4
2014 年					
	1 月			6.6	14.4
	2 月			6.7	22.2
	3 月	-1.7	1.4	6.7	20.3
	4 月			6.3	30.4
	5 月			6.3	22.4
	6 月			6.1	28.8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1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3 年		22801.9		2.9	27565.9		0.1	-4763.9
	5 月	1872.1	-0.3	1.6	2320.4	1.7	0.2	-448.3
	6 月	1903.7	1.7	2.7	2269.2	-2.2	-0.7	-365.5
	7 月	1899.0	-0.2	3.4	2293.2	1.1	0.8	-394.2
	8 月	1906.1	0.4	4.2	2301.2	0.3	1.2	-395.2
	9 月	1902.5	-0.2	0.8	2325.1	1.0	1.6	-422.6
	10 月	1939.7	2.0	5.7	2330.5	0.2	3.2	-390.8
	11 月	1949.2	0.5	4.6	2308.9	-0.9	-0.9	-359.7
	12 月	1928.0	-1.1	1.6	2301.9	-0.3	1.2	-373.9
2014 年								
	1 月	1921.8	-0.3	2.5	2322.4	0.9	1.1	-400.5
	2 月	1881.5	-2.1	0.1	2307.4	-0.6	0.4	-425.9
	3 月	1936.6	2.9	3.6	2378.3	3.1	6.2	-441.8
	4 月	1935.1	-0.1	3.1	2405.4	1.1	5.4	-470.4
	5 月	1954.6	1.0	4.4	2398.5	-0.3	3.4	-443.9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2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度	季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2 年		1696.8	3113.5	-1416.7
	1 季度	292.5	1045.6	-753.0
	2 季度	523.1	704.1	-181.1
	3 季度	449.3	915.9	-466.7
	4 季度	432.0	447.8	-15.9
2013 年		2307.7	3283.4	-975.8
	1 季度	433.1	812.1	-379.1
	2 季度	604.6	1011.3	-406.8
	3 季度	559.9	914.2	-354.4
	4 季度	710.2	545.7	164.4
2014 年				
	1 季度	-1173.3	583.5	-1756.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1	-0.3	-0.3
2 季度		-0.3	-0.5	-0.3
3 季度		-0.2	-0.1	-0.2
4 季度		-0.5	-0.5	0.0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0.2	-0.2	0.2
2 季度		0.3	0.2	0.0
3 季度		0.1	0.1	0.2
4 季度		0.3	0.0	-0.4
2014 年				
1 季度		0.2	0.1	0.3

表 14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1.1	0.8	0.0
2 季度		-1.8	0.9	-0.2
3 季度		-0.6	0.7	0.3
4 季度		-1.3	-0.6	-0.9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1.6	-0.8	-0.8
2 季度		0.2	2.4	1.6
3 季度		0.5	0.0	0.9
4 季度		0.9	1.4	0.7
2014 年				
1 季度		0.3	0.3	0.8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3 年			0.41	-125.4	12.0
	5 月				12.0
	6 月	0.39	0.42	-9.1	12.0
	7 月				11.9
	8 月				12.0
	9 月	0.13	0.51	0.5	12.0
	10 月				11.9
	11 月				11.9
	12 月	0.14	0.89	16.4	11.8
2014 年					
	1 月				11.8
	2 月				11.7
	3 月	0.11	0.77	11.2	11.7
	4 月				11.6
	5 月				11.6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
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2 年		-0.7	-1.4	-0.5
1 季度		-0.2	-1.3	-0.3
2 季度		-0.5	-1.3	-0.6
3 季度		-0.7	-1.6	-0.6
4 季度		-1.0	-1.5	-0.7
2013 年		-0.5	-0.7	0.2
1 季度		-1.2	-1.4	-0.2
2 季度		-0.6	-0.7	0.0
3 季度		-0.3	-0.5	0.5
4 季度		0.5	0.1	0.1
2014 年				
1 季度		0.9	0.4	0.2

表 17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
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口	进口
2012 年		-4.1	2.5	-0.9
1 季度		-2.7	2.8	-0.7
2 季度		-3.9	3.3	-0.8
3 季度		-4.1	2.8	-1.0
4 季度		-4.8	1.9	-0.8
2013 年		-3.0	1.3	0.1
1 季度		-5.2	0.2	-1.7
2 季度		-3.4	1.7	0.1
3 季度		-2.4	1.0	0.7
4 季度		-0.1	2.9	2.5
2014 年				
1 季度		1.9	4.1	4.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年份	月份	出口额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增长%	增长%	
2013 年							
	5 月	18960		0.9	17372	-3.4	1588
	6 月	1562	-2.5	-0.2	1424	-2.1	-5.6
	7 月	1587	1.6	-2.9	1462	2.7	-5.0
	8 月	1558	-1.8	3.2	1454	-0.6	0.5
	9 月	1577	1.3	-5.6	1451	-0.1	-7.2
	10 月	1589	0.7	3.0	1459	0.5	1.4
	11 月	1584	-0.3	1.4	1454	-0.3	-2.9
	12 月	1589	0.3	-1.9	1431	-1.6	-4.8
	1 月	1571	-1.1	4.1	1423	-0.5	1.4
2014 年							
	1 月	1587	1.1	1.2	1453	2.1	-2.7
	2 月	1607	1.2	3.3	1457	0.3	0.2
	3 月	1599	-0.5	-0.7	1450	-0.5	2.9
	4 月	1596	-0.2	-1.5	1444	-0.4	-2.5
	5 月	1605	0.6	0.2	1452	0.5	-0.3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8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2013年5月—2014年5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3年		851	1914	-1063
	5月	566	128	437
	6月	188	331	-143
	7月	133	64	69
	8月	287	291	-4
	9月	-44	149	-193
	10月	1750	1571	179
	11月	58	290	-232
	12月	-89	23	-111
2014年				
	1月	291	383	-92
	2月	-195	-190	-5
	3月	-366	-220	-146
	4月	-33	154	-187
	5月	281	160	12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18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2012年—201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2年		1.4	2.0	1.7
	1季度	1.0	0.4	1.5
	2季度	-0.6	0.4	-0.6
	3季度	-0.8	-0.5	0.4
	4季度	0.0	0.5	0.7
2013年		1.5	2.0	2.0
	1季度	1.3	1.0	0.9
	2季度	0.7	0.7	0.4
	3季度	0.3	0.2	0.2
	4季度	0.1	0.4	0.2
2014年				
	1季度	1.6	2.2	0.1

表 21 2012年—201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2012年		3.4	-0.1	5.3
	1季度	-0.3	2.8	2.0
	2季度	0.3	-0.5	1.4
	3季度	-1.3	-4.0	-0.4
	4季度	0.1	-3.0	-1.9
2013年		2.6	1.7	3.4
	1季度	-0.2	4.3	1.1
	2季度	2.1	2.9	1.8
	3季度	2.6	-0.7	2.4
	4季度	1.9	0.5	3.7
2014年				
	1季度	4.5	6.0	6.3

表 22 2012年—201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2年		1.4	2.0	1.7
	1季度	3.2	3.7	2.2
	2季度	3.2	3.0	1.3
	3季度	-0.2	0.9	1.5
	4季度	-0.3	0.7	2.0
2013年		1.5	2.0	2.0
	1季度	0.1	1.5	1.4
	2季度	1.2	1.8	2.5
	3季度	2.3	2.4	2.2
	4季度	2.5	2.3	1.8
2014年				
	1季度	3.0	3.7	0.9

表 23 2012年—2014年1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口	进口
2012年		3.4	-0.1	5.3
	1季度	5.5	1.0	6.7
	2季度	6.3	9.2	9.0
	3季度	2.9	-4.8	5.0
	4季度	-0.7	-5.0	1.0
2013年		2.6	1.7	3.4
	1季度	-1.2	-3.3	0.3
	2季度	0.6	0.0	0.8
	3季度	4.3	3.2	3.2
	4季度	7.2	7.0	9.2
2014年				
	1季度	11.5	8.9	14.9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20—表23)。

表 24 2013年6月—2014年6月劳动力市场相关指数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3年		1.1	1.46	4.0
	6月	-2.0	1.48	3.9
	7月	3.1	1.46	3.9
	8月	0.3	1.48	4.1
	9月	6.3	1.51	4.0
	10月	6.3	1.57	4.0
	11月	5.6	1.55	3.9
	12月	6.9	1.61	3.7
2014年				
	1月	6.9	1.63	3.7
	2月	7.1	1.67	3.6
	3月	6.1	1.66	3.6
	4月	5.0	1.64	3.6
	5月		1.64	3.5
	6月		1.67	3.7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2013 年 6 月—2014 年 6 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3 年	697742		9.5	812425		14.9	-114684
6 月	59019	0.2	7.4	66075	-1.1	11.7	-7056
7 月	58473	-0.9	12.2	68223	3.3	19.7	-9750
8 月	59396	1.6	14.6	68352	0.2	16.2	-8955
9 月	59163	-0.4	11.4	70471	3.1	16.7	-11308
10 月	59863	1.2	18.6	71896	2.0	26.3	-12034
11 月	60001	0.2	18.4	73174	1.8	21.2	-13172
12 月	60793	1.3	15.3	72690	-0.7	24.8	-11897
2014 年							
1 月	58949	-3.0	9.5	76147	4.8	25.1	-17198
2 月	60192	2.1	9.8	71662	-5.9	9.0	-11470
3 月	58539	-2.7	1.8	74735	4.3	18.1	-16196
4 月	58677	0.2	5.1	67445	-9.8	3.4	-8768
5 月	57824	-1.5	-2.7	66437	-1.5	-3.6	-8613
6 月	58921	1.9	-2.0	69729	5.0	8.4	-10808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2013 年 5 月—2014 年 5 月外国直接投资相关指数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入	流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3624	133860	-130236
	5 月	567	9173	-8606
	6 月	997	9620	-8623
	7 月	453	36886	-36433
	8 月	355	5552	-5197
	9 月	797	6183	-5386
	10 月	-1152	7887	-9039
	11 月	848	5135	-4287
	12 月	489	18470	-17981
2014 年				
	1 月	1420	12604	-11184
	2 月	-1984	6528	-8512
	3 月	4231	7239	-3008
	4 月	-1386	6096	-7482
	5 月	426	7356	-6930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2012 年—2014 年 1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2 年		1.4	0.1	2.5	1.0	4.8	3.5
	1 季度	0.8	0.6	2.7	0.8	6.0	4.8
	2 季度	1.6	0.0	2.9	0.6	4.5	4.3
	3 季度	0.8	0.2	2.2	1.0	4.6	3.0
	4 季度	0.9	0.2	2.1	1.8	4.4	2.0
2013 年		2.7	1.8	1.9	2.3	4.6	1.3
	1 季度	3.0	0.6	1.6	1.9	4.4	0.8
	2 季度	1.9	1.8	2.3	3.5	4.7	1.0
	3 季度	3.0	1.9	1.7	2.4	5.2	1.3
	4 季度	2.7	2.7	2.0	2.2	4.6	2.0
2014 年							
	1 季度	1.2	3.1	1.6	1.9	4.6	0.9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2012 年—2014 年 2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2012 年		2.3	3.9	1.5	1.5	5.6	6.2
	1 季度	2.8	4.8	0.7	0.5	5.1	6.3
	2 季度	2.4	4.4	0.9	0.1	5.6	6.4
	3 季度	2.1	3.2	1.6	1.4	5.3	6.2
	4 季度	2.1	3.4	2.9	3.8	6.5	6.1
2013 年		3.0	1.1	2.9	2.1	4.7	5.8
	1 季度	2.1	0.6	2.9	1.4	4.2	6.1
	2 季度	2.7	1.6	3.1	2.7	4.5	5.8
	3 季度	3.4	1.4	2.8	1.3	5.0	5.6
	4 季度	3.7	0.7	3.0	2.9	5.1	5.7
2014 年							
	1 季度	3.9	1.8	3.0	3.1	6.2	5.2
	2 季度	3.6					

表 29 2013 年 6 月—2014 年 6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3 年		7.1	7.7	5.5	5.5	24.7
	6 月	7.1	7.8	6.0	5.4	25.3
	7 月	7.2	7.7	5.6	5.3	
	8 月	7.1	7.7	5.3	5.2	
	9 月	6.9	7.6	5.4	5.3	24.5
	10 月	7.0	7.4	5.2	5.5	
	11 月	6.9	7.1	4.6	5.4	
	12 月	7.2	7.2	4.3	5.6	24.1
2014 年						
	1 月	7.0	7.2	4.8	5.6	
	2 月	7.0	6.9	5.1	5.6	
	3 月	6.9	6.8	5.0	5.4	25.2
	4 月	6.9	6.6	4.9	5.3	
	5 月	7.0	6.5		4.9	
	6 月	7.1			4.9	

表 30 2013 年 6 月—2014 年 6 月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相关指数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3 年		3.1	4.9	3.4	4.2	3.1
	6 月	3.2	5.0	3.3	4.2	2.7
	7 月	3.2	5.1	3.3	4.3	3.0
	8 月	3.1	5.2	3.3	4.3	3.1
	9 月	3.0	5.3	3.3	4.2	3.1
	10 月	3.0	5.0	3.3	4.2	3.3
	11 月	3.0	4.5	3.3	4.2	3.4
	12 月	3.1	4.3	3.2	4.1	3.0
2014 年						
	1 月	3.2	5.1	3.1	4.0	3.3
	2 月	3.9	4.6	3.1	4.2	3.2
	3 月	3.5	4.8	3.1	4.2	3.0
	4 月	3.7	4.8	3.1	3.9	2.9
	5 月	3.7	4.9	3.1	3.9	2.9
	6 月	3.6	4.8	3.2	3.9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表 31 2013年5月—2014年5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年	4588.6	4618.5	-29.9	5414.8	6545.3	-1130.5
5月	398.5	395.5	3.0	556.4	521.6	34.8
6月	378.2	386.3	-8.1	471.5	543.0	-71.5
7月	359.0	376.0	-17.0	468.8	545.6	-76.8
8月	373.6	393.2	-19.6	416.2	511.5	-95.3
9月	387.3	390.8	-3.5	433.8	577.7	-143.9
10月	405.9	408.5	-2.6	455.2	606.5	-151.3
11月	379.7	384.3	-4.6	425.1	598.2	-173.1
12月	374.3	360.0	14.3	428.7	519.0	-90.3
2014年						
1月	368.3	346.0	22.3	437.1	566.5	-129.4
2月	356.5	347.4	9.1	431.0	528.6	-97.6
3月	409.3	388.9	20.4	446.8	575.7	-128.9
4月	386.4	395.4	-9.0	388.5	565.1	-176.6
5月	413.0	408.8	4.2	417.4	564.3	-146.9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2 2013年6月—2014年6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年	959.9	1035.0	-75.1	2421.8	2504.5	-82.7
6月	76.7	78.1	-1.4	211.3	196.8	14.5
7月	87.6	93.3	-5.7	208.1	236.6	-28.5
8月	80.2	90.9	-10.7	214.2	211.1	3.1
9月	76.9	88.1	-11.2	210.0	197.0	13.0
10月	85.0	95.1	-10.1	228.2	240.3	-12.1
11月	84.2	84.3	-0.1	208.6	200.0	8.6
12月	74.2	72.2	2.0	208.5	190.4	18.1
2014年						
1月	71.6	87.0	-15.4	160.3	210.2	-49.9
2月	75.4	74.8	0.6	159.3	188.9	-29.6
3月	73.8	85.0	-11.2	176.3	183.6	-7.3
4月	73.9	85.6	-11.7	197.2	201.1	-3.9
5月	75.3	81.6	-6.3	207.5	209.5	-2.0
6月				204.7	189.2	15.5

表 33 2013年6月—2014年6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 罗斯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年	3125.5	4658.0	-1532.5	5232.9	3429.8	1803.1
6月	237.2	258.8	-21.6	418.4	282.5	135.9
7月	255.4	380.2	-124.8	437.1	302.6	134.5
8月	262.5	368.5	-106.0	425.3	283.6	141.7
9月	278.6	342.2	-63.6	448.1	287.1	161.0
10月	272.8	379.2	-106.4	434.6	306.7	127.9
11月	239.3	336.6	-97.3	468.0	298.1	169.9
12月	261.5	364.8	-103.3	495.3	324.9	170.4
2014年						
1月	268.1	363.1	-95.0	396.5	209.8	186.7
2月	253.0	334.9	-81.9	364.6	240.3	124.3
3月	290.8	395.4	-104.6	470.6	274.3	196.3
4月	256.3	357.9	-101.6	474.5	276.2	198.3
5月	280.0	392.3	-112.3	442.8	260.0	182.8
6月	264.8	382.4	-117.6			

表 34 2013年6月—2014年6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年	5596.3	5155.8	440.5	3801.9	3909.7	-107.8
6月	466.9	407.2	59.7	310.9	309.4	1.5
7月	458.3	433.8	24.5	322.5	345.1	-22.6
8月	463.1	415.9	47.2	326.8	337.6	-10.8
9月	446.5	410.6	35.9	313.8	315.1	-1.3
10月	504.8	456.1	48.7	350.8	361.2	-10.4
11月	479.1	431.1	48.0	316.8	321.5	-4.7
12月	479.8	443.5	36.3	320.7	312.1	8.6
2014年						
1月	455.7	447.5	8.2	270.5	311.0	-40.5
2月	429.2	420.6	8.6	304.6	304.2	0.4
3月	490.8	455.4	35.4	332.4	332.2	0.2
4月	502.9	458.5	44.4	340.7	345.7	-5.0
5月	476.1	425.2	50.9	343.8	352.8	-9.0
6月	478.5	424.0	54.5			

表 35 2013年6月—2014年6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年	5355.5	6222.8	-867.3	3054.4	2699.0	355.4
6月	415.3	508.8	-93.5	264.9	231.8	33.1
7月	454.1	528.0	-73.9	253.0	220.6	32.4
8月	461.6	573.4	-111.8	256.4	210.4	46.0
9月	466.7	537.9	-71.2	252.4	229.0	23.4
10月	485.0	540.4	-55.4	267.1	225.9	41.2
11月	471.9	551.5	-79.6	257.3	213.8	43.5
12月	455.3	535.6	-80.3	263.8	241.6	22.2
2014年						
1月	437.1	505.8	-68.7	242.9	213.4	29.5
2月	328.7	414.3	-85.6	212.8	197.2	15.6
3月	439.3	514.6	-75.3	277.4	258.0	19.4
4月	408.1	483.5	-75.4	266.0	240.6	25.4
5月	428.1	486.4	-58.3	266.7	213.8	52.9
6月				268.0	249.1	18.9

表 36 2013年5月—2014年5月进出口贸易相关指数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3年	2282.8	2060.1	222.7	1835.5	1873.7	-38.2
5月	184.9	175.4	9.5	157.6	166.2	-8.6
6月	180.2	166.5	13.7	148.5	157.8	-9.3
7月	190.3	181.4	8.9	154.0	177.4	-23.4
8月	191.7	170.0	21.7	135.3	132.4	2.9
9月	194.7	168.0	26.7	152.3	154.4	-2.1
10月	211.1	185.2	25.9	157.9	158.2	-0.3
11月	194.5	164.1	30.4	157.3	151.2	6.1
12月	202.3	172.8	29.5	168.9	152.0	16.9
2014年						
1月	193.6	174.4	19.2	143.9	152.1	-8.2
2月	178.1	146.5	31.6	147.1	139.0	8.1
3月	197.9	168.9	29.0	153.1	140.5	12.6
4月	203.3	176.5	26.8	142.5	165.8	-23.3
5月	201.1	183.3	17.8	149.4	150.3	-0.9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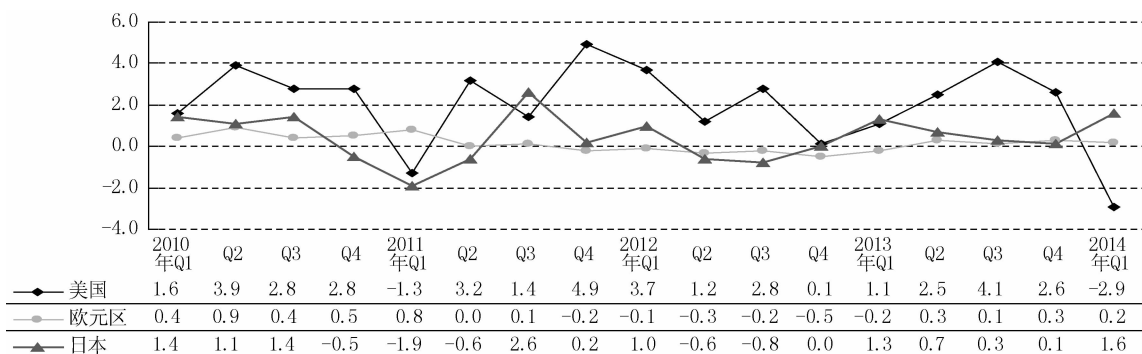


图1 2010年—2014年1季度三大经济体GDP环比增长率(%)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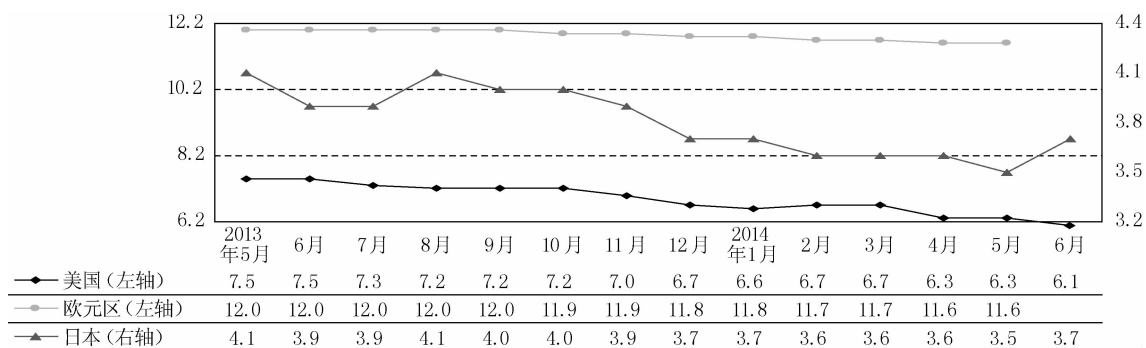


图2 2013年5月—2014年6月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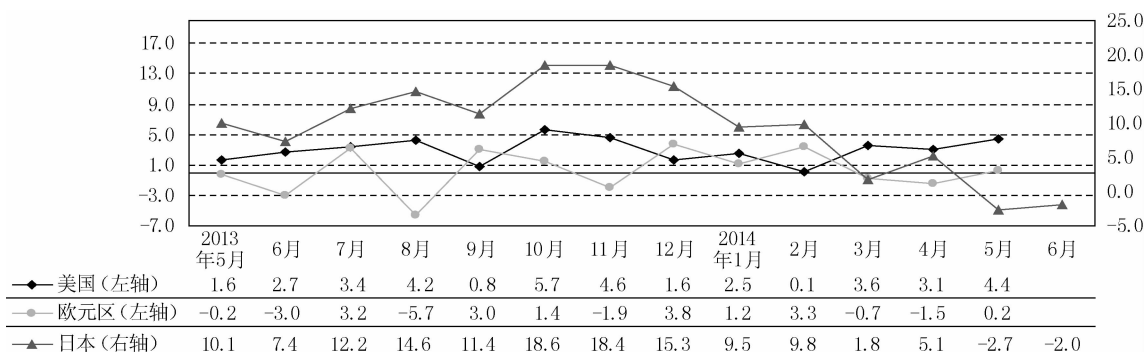


图3 2013年5月—2014年6月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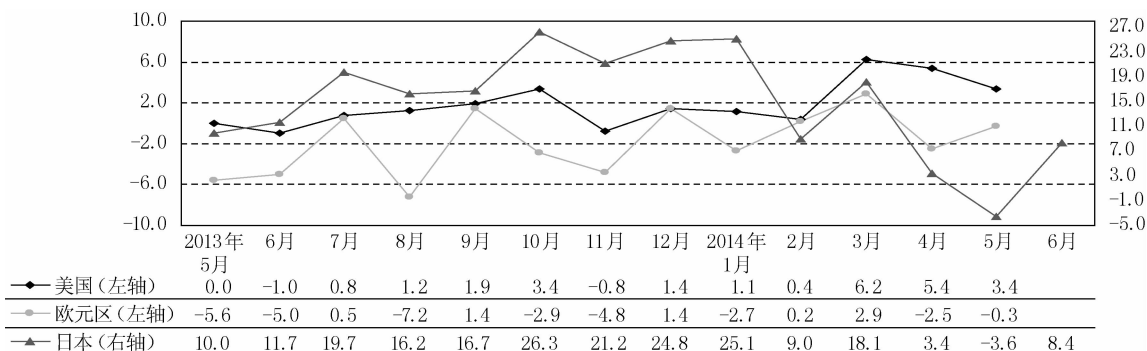


图4 2013年5月—2014年6月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图1—图4)。

ABSTRACTS

(1)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Golden Waterway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to Strongly Sustain Yangtze Economic Belt

Yang Chuantang

To develop Yangtze economic belt to promote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long the golden waterway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a major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following the current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effectively expand domestic demand, promote economic steady growth, adjust regional structure and achieve China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based on integrated transport corridor program along the Yangtze economic belt, is doubling its efforts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golden waterway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strengthen the transshipment and distribution system, improve transport capacity, expand the scale of traffic network, optimize the traffic structure, and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integrated transport corridor,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impetus in building China's new economic support belt.

(2) Establishing an International Reserve Currency System with Multiple Checks and Balances

Zheng Xinli

At the age of financial industries highly developed, financial products rely on the immoderate supply ability from sovereign credits are the cause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replace the single reserve currency with multiple reserve currencies. This will force the governments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domestic currency stability when issuing their currencies, as a role of the gold standard. With this mechanism, governments can focus on their own interests,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of financial industries, and avoid the overflow of currencies and financial derivative products; therefore, not only demand for monetary liquidity will be met, but also the excessive release of currencies will be prevented, so that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will be maintained.

(3) Situation Analysis and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Peripheral Diplomacy

Cao Wenlian, Chi Hongtao and Sheng Sixin

Peripheral relationship is the priority of China's diplomacy. In recent years, the situations of peripheral area became more complicated, serious issues happened all the time, sea power conflicts increased, and some countries increasingly doubt about China due to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But most of our neighboring countries

are friendly to us, and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us. Now, China's overall strategy should be, firstly, be friends to our neighbors, and bravely take responsibilities; secondly, put economy at priority to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thirdly, control the disparities as a whole; lastly, be strong at both civil and martial virtues, but never seek hegemony. Our medium to long term goal should be construct the "Asian Alliance" aimed to secure and stabilize Asia's economic prosperity.

(4)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Military Products Trade

Ren Haiping and Xu Changchun

In recent years, there was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block trade in military products globally. Although the overall size has a negative growth during a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the actual volume has reached the peak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ilitary powerful nations are the monopoly of military products suppliers, while the major demands com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Asian-Pacific countries. The global military products trades now focus more on economic benefits and high-tech weapons, and are more flexible and diverse, creating an institutionalized, well-organized, transparent and harmless way of trade.

(5) Enhanced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Matched with China's Strength

Zhang Monan

"Discourse power" is the reflection of a nation's soft power, so it is the core of the strategy to establish a discourse system that matches our strength and status to defend our nation's interests. However, at this time, the "Chinese Voice" still seriously lags behind the "Chinese Practice", and still does not match the "Chinese Power". Therefore, China needs to clearly and deeply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and effectively develop a solution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strategy, public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latform, system construction, theory innovation and so on.

(6) Thinking on the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Bai Zhongyao

The new-type of urbanization is the socialist urba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are human-centered, nurturing agriculture by industry, leading rural area by urban area,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eco-friendly, and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n all around way. When constructing the new urbanization, the main issues we should focus on are economy servicizing, cultural popularizat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

(7)The Estate Market is Slowing Down

Chen Bingcai

There are many arguments for the outlook of Chinese real estate market, the real estate market is entering a downward phase, necessary demands for house is fading, and the residents' housing has been largely resolved. The bank has sufficient capacity for the falling of the real estate prices, which is benefit for structural adjustment. Government should be fair and just,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governance capacity, complete the rule of law, lower the rate of interest.

(8) Factor Analysis of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heng Chaoxun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driven by five elements: the development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innovative factors, innovative products, market demand, and innovation ecosystem. Such upgrading should be adapted to the requirement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China is transiting from a middle-high income country to a high income country; furthermore, it also should increase investment on innovation factors, promote innovative products, pay attention to foster market demand, create a good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finally enhance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driven industry.

(9) The Development of Elderly Service in Aging China

Yang Yuying and Zhang Tianyue

Ag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hallenges that we face in 21st century. 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 developing aging industry, especially elderly service, is the requirement of achiev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armony, s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o accomplish this, we must realize that the intensified aging trend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use the socialized and industrialized mechanism, and promote a sustaine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lderly service industry.

(10) Selecting Good Breakthroughs to Construct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Li Feng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forward the strategic concept of speed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overall deployment around how to solve the farming of ground oriente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agriculture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ng 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needs to select good breakthroughs: firs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moderate scale of operations; second, developing rural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third, training new farmers and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ubject leaders; fourth, establishing a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ystem; fifth, improving the agricultural social service system.

(11)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Situation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Australia: A Research Report from IWEP

Lu Ting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Australia have gone well and aroused market participants' wide attention. The a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generated a series of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he cross-border usage of RMB in Australia.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MB business in Australia and the policy environment towards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WEP team conducted a field study with Australian Financial authorities as well as financial institutes. Based on the review of Australian RMB business, we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oposed several policy suggestions for expanding the usage of RMB in Australia.

Editor: Lu Liu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2014年度)评奖公告

根据《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章程》规定,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2014年度)评奖工作将于2014年底开始进行。

此次评奖对象是,1979年至2014年7月底(以近两年为主)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公开出版的论著。评选范围包括:理论经济学研究、国民经济综合问题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与发展实践中紧迫问题的理论研究。评奖旨在传承老一辈经济学家精神,坚持开放、公开、公平的原则,特别注重发现中青年的优秀作品,准确把握时代脉动,鼓励获奖作品在研究探索中的创新精神,在学术成果上的引领功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建设,为繁荣和发展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作出贡献。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评奖委员会,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聘请的29位经济学家组成。评奖工作的程序是:2014年11月底前,孙冶方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等21个单位各推荐一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初选小组。初选小组将于2015年第一季度集中评审参选作品,并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提出入选作品的建议名单,供评奖委员会评审。2015年夏,评奖委员会委员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获奖作品。之后,获奖名单将在孙冶方基金会网站公示一个月,如无异议,即报孙冶方基金会理事会批准。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奖的奖金标准为:著作奖每本20万元,论文奖每篇10万元。孙冶方基金会将于2015年秋季向获奖者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

申请评奖的个人或课题组,请于2014年11月底前报送参选作品(著作类婉拒论文集和教科书),并附相关材料,内容包括:作品名称、作者、单位、发表时间、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E-mail、推荐单位或推荐人(限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的推荐书(约500字)等。参选作品请寄送3份(恕不退还)。参选的外文论著,请同时附中文译稿。推荐表格可在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的网站上下载。

申请评奖不收取任何费用。

评奖工作由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办公室具体实施。参选作品和其他材料请邮寄至“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办公室”。

联系人:王迎新 周小和

联系电话:6802 4467

E-mail:sunyefangjjh@sina.com

通讯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西华饭店329室

邮政编码:100045

网址:<http://sunyefang.cass.cn/>

为促进中国金融学科建设,提高金融研究水平,促进金融学术进步,孙冶方经济科学基

金会今年特别设立“孙冶方金融创新奖”。其评奖公告可在孙冶方基金会网站查阅,敬请关注。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奖委员会初选小组成员单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六届评奖委员会委员名单:(按拼音排序)

白重恩 陈东琪 陈锡文 陈雨露 樊 纲 高世楫 郭克莎 韩 俊

胡家勇 李 扬 李 周 李剑阁 厉以宁 刘 伟 刘世锦 刘树成

隆国强 冒天启 钱颖一 田国强 汪丁丁 王 江 王一江 吴敬琏

肖 梦 许成钢 张卓元 郑红亮 周其仁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

2014年7月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 征稿通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深切缅怀新四军革命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砥柱中流，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伟大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昭展丹青名家并推书画新秀；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等 8 家单位发起“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活动，参展作品将在全国范围征集，经活动艺委会评选后的 320 幅优秀作品于 2015 年 5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展，之后在相关省市巡展并筹台海联展。同时活动中的部分甄选作品将捐由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永世纪念、教育后人。我们诚邀全国画坛诸位艺术家与各界贤达加盟本次展览。

一、组织机构

（一）组委会

主任：欧阳淞 蔡 武 陈昊苏

副主任：李忠杰 杨志今 左中一 王占生 邓淮生 薛德堂 毋瞩远 黄如军

委员：张永新 张光东 韩铁成 桂建平 叶小楠 何光耀 乔泰阳 张淮流

刘延淮 周善平 赵黎明 邓小燕 张末生 彭 华 吴长江 赵长青

葛 华 颜 宁 张士明

（二）主办单位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四师淮北分会

中海外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美协及新四军研究会

（五）军史专家委员会

寿小松 黄如军 耿成宽 徐维国 王传厚 张学忠 徐君华

（六）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大为

主任：吴长江 副主任：徐里 杜军 秘书长：丁杰

二、展出日期、地点

2015 年 5 月（拟定），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展出规模

本次展览展出美术、书法作品 320 余幅，其中特邀美术名家名作百余幅，全国征稿入选优秀作品 100 件，同书法作品共同展出。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作者待遇

1. 该展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具备申请加入中国美协会会员的一次条件。
2. 优秀作品 100 件（税前收藏费：中国画作品 50 件；15000 元 / 件。油画作品 50 件；25000 元 / 件）。
3. 画展将出版画册，每位参展作者均可获赠一本。
4. 组委会向参展作者颁发证书。

五、参展要求

1. 参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照片 1 张（10 寸以上）参加初评，照片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初评入围者接到电话通知后邮寄原作（送原件地址另行通知），同时通过邮局汇寄 150 元评选费进行终评，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终评落选作品退件。

2. 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检测后发现作者使用高仿作品参评，中国美术家协会将在三年内拒绝此作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任何展览活动。

3. 初评投递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如反复多次投递，中国美术家协会将视为无效稿件取消参评资格。

4. 送件要求：中国画幅尺寸不小于 6 尺整张，横竖不限；油画画芯尺寸：不小于 1 米×1 米。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写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寸（高×宽 CM）、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送件须妥善包装并挂号或特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

5. 收作品照片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6. 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 32 号楼 A 座 710，邮编：100083；收件人：张英财；联系电话：（010）59759683。画展信息可登录 www.caanet.org.cn（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站）查看。

六、特别声明

1.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2. 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 年 12 月